

# 炎黄春秋

第 **7** 期  
2007年

**邓小平的政治体制改革蓝图及其实践**

**阎明复：忆老朋友阿尔希波夫**

**田纪云：国务院大院的记忆**

**我从副处级一步跨进省委常委**

**北欧四国社会模式的见闻与思考**



## 目 录

### 亲历记

- 1 国务院大院的记忆……………田纪云  
3 忆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阿尔希波夫……………阎明复  
6 我从副处级一步跨进省委常委……………白石

### 一家言

- 12 我看社会主义……………何方  
18 坚持基本路线必须澄清错误思潮  
——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与杨承训的对话 ……刘国光 杨承训

### 求实篇

- 25 邓小平的政治体制改革蓝图及其实践……………吴敏  
30 马恩确实是“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首倡者……………阎长贵

### 人物志

- 33 萧克将军谈“三次站错队”……………郭其侨  
35 胡耀邦在湄潭的惊人之语……………洪星  
36 中国大百科全书奠基人姜椿芳……………杜明明 摘编  
42 华尔街上的中共大亨……………伊里

### 往事录

- 47 我的极左经历……………吴思  
56 我是怎样被“补”成右派的……………季音  
61 骇人听闻的云南沙甸惨案……………周康  
64 情系国殇墓园……………秦伯益  
67 三代人的宿命……………王宏任

### 怀人篇

- 70 父亲梁霭然的地下工作经历……………梁福申

### 海外事

- 76 北欧四国社会模式的见闻与思考……………关山

### 顾 问:

杜润生 李 昌 于光远 李 锐  
特邀编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俊义 冯 征 冯 健 冯其庸  
曲润海 朱厚泽 李 普 李一鑫  
李冰封 李维民 杨天石 吴 象  
宋木文 苏双碧 张岂之 张文彬  
张荣华 何 方 范敬宜 金冲及  
钟沛璋 袁 鹰 凌 云 龚育之  
萧蔚彬 曾彦修 彭 迪 韩 钢  
雷 颐 魏久明

社 长 (法人代表): 杜导正  
副 社 长: 方 实 徐 孔 (常务)  
杨继绳 吴 思

执行主编: 李 晨 徐庆全  
社长助理兼编辑室主任: 赵友慈  
社长助理兼办公室主任: 胡竞成

理 事 长: 杜导正  
副 理 事 长: 莊其環 李 琼  
理 事 员: 白建钢  
秘 书 长: 徐 孔  
副 秘 书 长: 杜明明

主管、主办单位: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  
本刊常年法律顾问:

张思之 (吴栾赵阎律师事务所 010-68083211)

步凌云 (北京市华一律师事务所 010-85869163)

国内统一刊号: CN11-2817/K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刊号: ISSN1003-1170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 编: 100045

电 话: (010)68522852 (办公室)

(010)68534879 (编辑室)

(010)68523512 (编辑室)

(010)68532048 (发行部)

传 真: (010)68532569

印 刷: 唐山市润丰印务有限公司

国内总发行: 北京报刊发行局

国内邮发代号: 82-507

订 购 处: 全国各地邮局 (所)

国外总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北京399信箱)

国外发行代号: 1274M

网络电子版全球总代理: 龙源期刊网

网 址: www.dragonsource.com

www.qikan.com

本刊电子信箱 (E-mail) 地址:

Yanhcq@sina.com

出 版 日 期: 每月4日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西工商广字0296号

定 价: 5.80元

# 国务院大院的记忆

田纪云



田纪云在工作（1990年）

我12岁就参加了八路军，一直没有机会受正规高等教育，我又无政治背景，且长期在边远的地方工作，于我，中南海挺遥远的。但是，历史的大潮却把我涌入了中南海。

从秘书长到副总理，我在中南海红墙里度过了十二个春秋，这十二年给我留下的记忆太多太深刻了，很多事使我终生难忘。在这里，我讲讲当年国务院机关的风气。

国务院办公厅在周总理的长期熏陶下，有着许多优良传统。使我感受最深的是以下四点：

第一，办公厅的工作人员来自四面八方，他们不欺生，不排外，没有这帮那伙，同志关系比较融洽，能够很好的合作共事。在内部，包括行文，从总理到一般工作人员都以同志相称，从不叫官衔。我刚到国务院时，真是有点像《红楼梦》里的

刘姥姥初进大观园，不知东西南北。对于办公厅机构设置、工作运转、行文程序、各方面的关系等，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面对这种情况，我给自己立下三大任务：首先是尽快熟悉情况。我衷心感谢国务院办公厅特别是秘书局的同志们给予我的热情帮助。当时秘书局有一位副局长叫刘冰清（女同志，回族，她的爱人给华国锋同志当秘书，直至辞世），她从周总理时代就在办公厅工

作，几朝元老了，对国务院情况非常熟悉。她一有空就到我的办公室坐坐，同我聊天，介绍情况，有时也带我在大院转转，到各局处坐坐，让我熟悉情况，使我受益匪浅。二是把好文件关。因为一到国务院就分管经济方面的工作，文件比较多。我的任务是控制数量，提高质量，不能有半点差错。对于重要文件，我的办法是把有关负责人和撰稿人找在一起，集体作业，咬文嚼字，认真推敲。先后当过秘书局副局长的侯颖、周锁洪、李树文、张克智、安成信等人，经常与我在一起抠文件。这种办法也使我向工作人员学到不少知识。八十年代国务院文件的质量还是比较高的。三是与群众打成一片，不搞特殊化。对此，在战争年代过来的我，有点优势，很容易做到。有段时间我的家属还没来北京，我与大家一起在大食堂吃饭，和大家





田纪云陪同国务院领导在河南考察工作（1985年12月）

当时其他会议室没有再更换会议桌。赵紫阳一贯倡导节俭，反对铺张浪费，讲排场。为了制止公费请客，曾明确规定，公费请客只限“四菜一汤”。虽然执行中有阻力，未能坚持下去，但对当时不良风气起到一定遏制作用。他严格要求干部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自己首先身体力行，在位期间，从未对自己的住宅、办公室大兴土木或购置

一样排队买饭，唯一的特殊是秘书长们有个固定的饭桌，不要端着碗到处找位子。这一下子就拉近了与工作人员的距离。我很快结识了一大批工作人员，他们与我说古道今，谈天说地。这些，都帮助我很快进入角色，对我后来的工作帮助极大。

第二，任人唯贤、五湖四海。在我任副总理第一任期还兼任国务院秘书长和机关党组书记，是管干部的，但从来没有人到我这里来跑官要官的，我主持研究提拔了那么多局、部级干部，也从来没有人请我吃过一顿饭，或者送点什么礼品，所谓“红包”，那时还没有这个名词。而且至今也没听说那时提起来的干部，有哪个因腐败而落马的。

第三，艰苦朴素的作风。国务院机关是很节俭的。比如，从周总理时代就有一个规矩，在国务院会议室开会喝茶收费。八十年代初，与会人员喝一杯茶要放一毛钱，后来物价涨了，放两毛，喝白开水不收钱。有几年，上午开会到十二点时可以吃一顿饭，但要收八毛钱，喝酒一杯收四毛。国务院北门与院子不对称，一九八五年有人建议修正一下，但基于节约的考虑，始终未下决心。一九八六年，秘书长们商量，把国务院常务会议室桌子换成了比较时尚的椭圆形会议桌，第一次使用时赵紫阳就批评说，国务院不要带这个头。所以，

贵重高档用品，一切从俭，不浪费国家一分钱。

第四，领导外出轻车简从，作风深入，求真务实。我在国务院副总理的第一任期内，多次陪同国务院主要领导去外地调研。那时，领导同志出去要求很严格，到各地调研，轻车简从，与陪同人员同坐一辆面包车，谈笑风生，边走边谈。经常途中停车，到群众家里、到工地现场、到车间班组看望群众，了解情况，获得第一手材料。所到各地，不清道，不戒严，不搞花架子，不搞假现场，不要地方当局事先导演。

在机关工作作风上，要求工作人员高度负责、一丝不苟，善于同各方面协商办事。国务院工作涉及到上下左右方方面面，协调任务很重。有些难度大、涉及面广的问题，往往要到下面去，了解情况，研究办法。比如有一次为解决好一个省大批下放人员安置问题，我根据总理的指示精神带领有关人员去现场办公，参加省委会议，统一认识，研究可行办法，得到了妥善解决，并对当时存在类似问题的省市，提供了思路和解决的办法，起到了举一反三的作用。

在我从工作岗位上退下之后，我仍念念不忘八十年代国务院机关的风气，不忘曾经给予我真诚帮助的同志们。有时我自费与他们聚一聚，一起吃顿饭，聊聊天。（作者系国务院原副总理）

（责任编辑 杜晋）

# 忆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阿尔希波夫

阎明复

今年是中国人民的真诚朋友伊万·瓦西里耶维奇·阿尔希波夫同志诞辰一百周年。上个世纪五十年代,阿老作为苏联政府派驻中国的总经济顾问,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为中苏(俄)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做出了巨大贡献。

我和阿老第一次接触是五十年前的事。1956年6月,我作为俄文翻译跟随李富春副总理率领的中国政府代表团访苏,同苏联政府商谈中国的第二个五年计划草案。代表团的整个活动都是由阿尔希波夫同志负责安排的,他每天都到宾馆来,都要来看望富春同志。这是我第一次接触阿尔希波夫同志,当时觉得他很友好、热情、认真负责,后来在工作中接触多了对他才有更多的了解,我们之间结下了深厚的友情。

阿尔希波夫是斯大林于1950年亲自选派到中国来担任经济总顾问的,一直工作到1958年。据师哲老回忆,1950年1月在毛泽东主席访问苏联期间,毛主席向斯大林提出希望苏联派出总顾问的问题。斯大林说,我们将向你们派出熟练的专家。

于是,斯大林特意为中国选派了一位“年富力强,精力充沛,有造就、有经验、非常能干、积极,为人正直,认真负责,行政管理能力、组织能力都很强,对经济建设有经验、有思想(师哲评语)的阿尔希波夫。实践证明,斯大林没有看错人。

在中国工作期间,阿老处处为中国着想,日夜操劳,做了大量工作。在中国政府聘请苏联专家方面,他主动帮助我们考虑,聘请什么领域、什么专业的人才对中国的经济建设最为需要,而在物色援华的专家、顾问方面,他也是想方设法保证来华的专家都有真才实学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在工作中他十分尊重中国同志,他也要求在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尊重一起共事的中国同事,平等待人,决不能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阿老为了保证苏联援华项目的顺利实施,同中苏两国专家一起跑遍了我国的大江南北,视察过很多工矿企业和重大

工程,亲自过问,具体指导。阿老对工作的高度责任心和无私奉献精神博得了中国人民的信任。

在中国工作期间,阿尔希波夫同周恩来、陈云、李富春、薄一波、姚依林等国务院领导人,联系密切,精诚合作,结下了兄弟般的友情。

1995年夏天我在莫斯科逗留期间,曾多次拜访阿老,畅谈阿老同我们熟悉的中国老一代领导人的亲如兄弟的友情,回忆起当年中国各地热火朝天的建设情景,也谈到中苏关系演变的种种原因和事件。阿老专门回忆了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苏联专家在中国工作的情况。他说,苏联专家对于新中国的建设发挥了巨大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每个部委都有苏联顾问组,由总顾问领导。派去担任总顾问的通常是在苏联最有权威的人,往往是副部长或苏联有关部门的部务会议成员。在工厂里,仿照我们的做法,都建立了工程师室和研究所,其中也有苏联专家工作。

苏联专家受到中国人的充分信任。苏联专家手中的小红本(工作证),实际上成为去任何单位(甚至最保密的单位)的通行证。有一次发生了一件类似笑话的事就可以说明这一点。几个年轻的苏联专家(记得他们是从鞍钢来的)到了北京,在城市中心游逛。他们出示小红本后就进了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所在地——中南海。他们问清毛泽东的住处后,向警卫人员出示了小红本,说他们想同毛泽东聊一聊。毛最后接见了他们。事后阿尔希波夫从中国同志那里知道此事。当他找到这些专家谈话时,他们回答说:“怎么也未料到毛亲自见了我们”,“在谈话中,我们只是想知道他生活如何。”

阿老说,还可以举出另一个例子来说明当时彼此间的信任程度。1950年,根据中国同志的提议,他有时出席中国政府的会议。1951年,他奉召回莫斯科,向斯大林汇报苏中合作协议的执行情况。在谈话中,斯大林对他说:看来,您不必参加中国政府的会议,因为“这会使人难堪,一个受过压迫的民族对这类事是非常



1996年，阿尔希波夫（右三）访华，与老朋友阎明复（右二）会面

敏感的”。回到北京以后，他再未出席中国政府的会议，但中国人还是继续发给他政府会议的文件。

苏中双方对于执行各自承担义务都非常严肃认真。例如，1951年苏方企业向中国供货严重拖欠。阿尔希波夫将此报告给了斯大林本人。因此，采取了严厉措施，撤了十来名部长和副部长的职。由此以后严格执行对中国的供货协议，便成了不可违反的法律。

阿老说：中方对于履行自己的义务也是持这种态度。这可用下述一个例子来说明。五十年代，苏联缺少可兑换的外币。因此，我们请求中国用外币来支付一部分我们供应的货物。中国人每年向我们提供1~1.2亿美金现钞，这笔钱主要来自国外的侨汇。1959至1960年中国侨汇情况严重复杂化了，他们便向我们供应黄金，由我们拿到国际市场上去出售，从而弥补了我方外币之不足。

这些事实都证明，双方合作是如何密切，它对双方而言又是何等重要。

阿老也经历了中苏关系乌云密布的年代。阿老回忆说，对双方关系产生消极影响的事件之一，就是撤退苏联专家。

阿老说，一些苏联作者写文章说，1960年撤退专家是由于给专家创造的工作条件令人不能容忍，又根本不听取他们意见引起的。这种看法有一点对，但并不是全对。

苏联专家工作中的困难是从1958年中国人采取“三面红旗”的方针开始的。在这一方针的影响下，中国建设现代化企业的速度大大放慢，决定使用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传统工艺。这方面的例子就是“小土群”炼钢法。违反经济规律和技术规程，无疑给苏联专家造成

了困难的处境。

在“大跃进”时期抛开了一切经济规律，认为生产发展的主要动力不是物质利益原则，而是人民群众的热情，苏联专家在这种情况下工作，当然是十分困难的。此外，中国人还取消了一长制原则，实行党委第一书记领导制。企业经理、厂长是党委成员，必须服从第一书记

的决定。

阿老说，在这种情况下，苏联专家的唯一出路就是寻找对中国人施加影响的新途径。说中国人是尽量有意识地为我们的专家制造令人无法忍受的困难，未必是妥当的。

阿老说，撤退苏联专家是我们方面施加的压力，是对中国人桀骜不驯的一种惩罚。撤退专家是苏共中央首先提出的，也是它下令撤退专家的。

赫鲁晓夫要求一周内撤完专家。为此，成立了由下述人员组成的特别委员会：外交部副部长普希金、国家经济联络委员会第一副主席阿尔希波夫、铁道部长和航空部长等。当时，在华专家大约1300人，加上他们的家属，将近5000人，他们分散在中国各地。撤退专家用了一个月。

这种“火速”撤专家的做法，遭到世界社会舆论的消极评论，当然，尤其受到中国人方面的非常不好的反应。我们撤退专家的主要理由是说我们当时国内自己迫切需要这些专家。中国人说，他们理解我们的问题，但他们请求推迟撤退。例如，周恩来就曾要求推迟一年、一年半或两三年撤退专家。然而，我们未予同意。

阿老回忆说，1960年夏，阿老奉命到中国安排撤走苏联专家的事宜过程中，在北京周恩来同志会见了，周总理建议推迟一年、一年半或两三年撤退专家。在成都，陈云同志会见了。两位老友相见，心情都很沉重，谈话坦率、真诚。陈云同志说，为了两国人民的利益，无论如何不能让事态进一步恶化。苏联应当采取一切可能的步骤来防止决裂，要修补好两国关系上已经出现的裂痕尚为时不晚。阿尔希波夫指出，问题不只在苏方，必须双方做出努力。



阿老说，关于同周恩来、陈云的谈话，当时毫不拖延地用密电报给了莫斯科。回国后，在他的请求下苏共中央主席团听取了他关于中国之行的报告。他讲完后无一人发言，无一人表态。他也曾想单独同赫鲁晓夫本人谈谈，向他转达陈云、周恩来谈话时的真情实意，以及他们不想使事情发展到决裂地步的诚意。为此，他曾请赫鲁晓夫的助手安排这个会见。几天后，赫鲁晓夫的助手转告阿尔希波夫说：赫鲁晓夫得知阿的请求后，他调阅了由中国发来的所有密码电报，看完电报后问道，阿尔希波夫想要作哪些补充汇报。阿尔希波夫说，他想汇报他认为很重要的一些个人感受。过了几天后助手打来电话说：赫鲁晓夫又重新看了从中国发来的密码电报，一切他都清楚了，他已无任何问题需要补充了解，他认为没有必要谈了。

阿老在苏中关系面临严重危机的时刻，挺身而出，力挽狂澜，虽然无法阻止苏中关系的进一步恶化，但是他为了苏中团结的大局，不顾个人仕途的安危而坦诚直言，阿老的无私无畏的精神值得我们中国同志永远牢记。

阿老接着说，撤退专家还只是个局部问题，我们采取的其他一些措施要比这严重得多了。1959年，我们提议中国重新审定同我们签订的全部经济协议。1958年贸易总额为1.8亿卢布（按当时的兑换价计算，如按当前兑换价则为40亿卢布）。重新审定协议的结果，1959年贸易额降低35%。我们停止了向那些在建工厂提供设备。1960年，由阿尔希波夫和外贸部副部长库梅金组成的代表团赴华。他们访华的目的是撤销同中国人已经签订的合同。这样，我们就采取了国际惯例上没有先例的行动，因为只有遇到特殊情况，如爆发战争，才能中止国家间签署的协议。1961年，我方主动撤销了先前商定了的合作项目。此后，我们只是向一些尚未建成的项目补足了设备，其总量不超过原定水平的10~20%。

原则上讲，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满可以向我们提出巨额索赔，向国际仲裁法庭提起诉讼。但是，他们并没有这样做。1961年，周恩来在谈话中讲：“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让我们大家都不要打官司，不要索赔，不要向仲裁法庭告状。”

在中国实际上同外部世界完全没有接触的情况下，中国同苏联间的联系大大缩小，当然给中国的经济带来沉重的打击。

阿老说，总的来说，可以同意中国人的说法：是我们苏联人最先把意识形态的分歧扩大到了国家间的关

系上。在中断同中国的联系上，赫鲁晓夫的逻辑是与中断同阿尔巴尼亚联系的逻辑一模一样的。

在后来苏中关系恶化期间，阿老没有讲过一句不利中国的话，没有做过一件不利中国的事。他多次向苏共领导人安德罗波夫、雷日科夫、戈尔巴乔夫等建议，采取措施改善同中国的关系。

80年代初，阿尔希波夫同志终于克服重重阻力，以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的身份率领苏联政府代表团访问中国，受到了陈云、彭真、薄一波等老朋友的亲切会见，并同他的老朋友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签署了中苏两国的贸易协定，为改善苏中关系迈出了可喜的一步。关于这次访问，阿老对我说，当时苏联方面就阿尔希波夫作为苏联大使馆的客人来中国访问征求中国方面的意见。中国外交部答复说，阿尔希波夫作为苏联大使馆的客人来中国访问我们不欢迎；我们欢迎他作为中国政府的客人来中国访问。阿老说完这个故事爽朗地大笑起来。我当时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正陪同二十几位人大代表在四川、湖北视察，在途中两次被召回北京，一次是陈云同志，另一次是彭真同志，两位老领导都要会见20多年未见的老朋友阿尔希波夫，都要我介绍阿老的近况。彭真委员长会见阿老时，我有幸在场，两位老战友久别重逢，相互紧紧地握手，热烈地拥抱，催人泪下的动人场面至今记忆犹新。

80年代末，阿老受苏联领导人的委托组织苏联专家学者研究了苏中关系恶化的原因和过程，并提出了改善同中国关系的政策建议，为戈尔巴乔夫先生访华同邓小平先生就恢复两党关系进行会谈做了准备。

在90年代，阿尔希波夫以俄罗斯国家杜马代表团成员和民间团体领导人的身份多次访华，受到中国同志们的亲人般的欢迎和接待。为表彰他五十多年始终如一致力于维护苏中两国人民的友谊，为感谢他对中国的建设所做的贡献，在庆祝他80华诞的时刻，中国对外友协授予他“人民友好使节”的荣誉称号。1998年阿老走了，怀着对中国人民的永恒的友情，怀着“英特纳雄耐尔”一定要实现的坚定信念，永远地离开了我们。阿老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今天，在胡锦涛主席和普京总统的领导下，中俄关系进入了空前的全面合作的历史阶段。让我们以阿老为榜样，为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中俄人民的世代友谊竭尽全力！

（作者系中央统战部原部长）

（责任编辑 李晨）

# 我从副处级一步跨进省委常委

白 石



1983年初，白石在省委办公室工作

要说清这个问题，还得简单说说我的历史。我这一生颇多磨难，又富有传奇色彩。18岁在大学生时，国民党就曾怀疑我为共产党的地下领导人，全城戒严，将我逮捕，多次审讯无结果，便被不明不白地关进大狱。解放后刚过几年好日子，1955年反胡风反革命集团时，又怀疑我为胡风集团成员，被长期看押，因无任何证据不得不将我“解放”。恢复工作不久夫妻双双又打成右派。我因为不承认任何错误、不写检查被从严惩处，开除党籍公职，劳改12年后又押送回老家交“群众专政”。又历经10年才得到“改正”。按中央规定平反后应由原单位重新安排工作，但当时单位说省委有规定一律不准回城，就地安置。我当时在妻子工作的河北省滦南县。县里说一落实政策，县里需要安置的几百人，往哪儿安排？外地来的一个也不要，哪儿来的回哪儿去。想不到落实政策以后我倒成了一个不受欢迎没人理睬的人。中央规定由原单位安排，那就找团省委吧！他们无奈收下了，让我先上组织部，但仍然没人理睬，也没人正式谈工作。看来实际是挤兑着让我走，我也就只好自己想法

去另找工作了。

我以前终究在省里呆了十几年，青年时代那些同事和领导，现在许多人都是大大小小的领导干部。经过走动，包括很富裕条件很好的单位都同意接受。但我却选了一个新建的穷单位——中国科学院农业现代化研究所。办公在郊区农村租了一座小楼，住房基本上是一家一间筒子楼，没有厨房，大家都在楼道里做饭，蜂窝煤、劈柴、炊具等等也都堆在楼道里。做饭时烟熏火燎拥挤过个人都很困难。

我们一家就在这里开始了新生活。既然有很富裕的有油水的单位接受，为什么选择这样一个单位呢？多年来我生活在农村，深知农民的贫困和苦难。以前我相信过集体化的道路，还曾写教材向农民宣传。以后集体化又发展到公社化，说什么公社是金桥，是通向共产主义的天梯，我在农村十几年实际的体验这是一条死路。把农民死死捆在每人一二亩的土地上，而且只允许农民种地甚至是只允许种粮棉油等作物，生产的东西又必须低价卖给国家，是走不出贫困的，只能是荒村依旧，富裕空谈。

出路何在呢？农村的希望在哪里？这一直是困扰着我的一个大问题。现在好了，中科院——我心目中的科学圣殿、中国的最高科研机构，设个所专门研究这类问题，里面一定有很多大专家，能有幸参加这样的研究，这不正是自己的向往吗？我是多么急于解决多年心中的困扰啊！穷点苦点怕什么？只图在有生之年，做点有益的工作。

我是带着很大希望来这个所的，在这里那些困惑一定会得到答案。同时我也知道自己才疏学浅，多年在劳改队和农村，孤陋寡闻，自己只有很好向人家学习，多向专家请教。越想虚心请教，越是暴露了自己的浅薄无知，人们越觉得奇怪，所里怎么来了这么一个人？很快人们又都知道我二十



多年一直在农村劳动(人们还不知道劳改十几年),有些人竟鄙视地说:“没搞过科研,不用说专业了,连一些科研常识都不懂,二十多年在农村劳动纯粹是个老社员,竟也上中科院来,真是怪事。”甚至有人说:“这种人也进中科院,简直有损中科院的声誉,连我们都跟着他丢人。”

不过农村经济研究室的几个人对我还好,室领导介绍了室里的课题,研究公社的分配制度由小队向大队过渡,还有关于1980年全国如何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的研究。他们还热情地让我参加他们那个课题组。

我一听大失所望,深知这两项都是根本行不通的。公社核算由小队向大队过渡是“穷过渡”,只能是越整越穷。1980年全国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这不是睁着眼睛说梦话吗?初次见面,面对的又是自己的领导,我没敢把心里想法说出来,只是婉转地说:“这些根本不可能实现吧?”

“哎?”领导惊讶,然后又小声凑到我耳旁说:“老白同志!你怎么能这样说呢?这可都是华主席提出来的,列入了国家计划的。在这儿说说不要紧,到外边可不能瞎说呀!外人一听中科院的人和党中央唱反调,那不好啊!”我虽不同意,但也无可奈何。是啊!当时文革刚刚结束,多年来对领袖的指示不准越雷池一步。现在虽不批斗了,但人们还心有余悸,只要是以党的指示出现的,只能是奉命行事。我理解主任的心情和好意,可是我不能奉命行事,那样的课题不能实现也解决不了农民的贫困。不能公开反对,便说我新来乍到,容我熟悉一下情况,再确定课题好不好?领导说科研人员不参加课题没经费,什么事也干不了。我说我出去考察路费总可以报销吧?领导说你先了解下情况,路费出差费可以报,可是不能时间太长啊!

正好这时国家农委、中科院等单位,决定在全国选10个县进行农村基本情况的全面调查,最后每县的报告要写成一本书。这十个县就有所里的试验县——栾城县,这可是硬任务。中科院让所里和栾城县承担这个任务,这正是农经室的任务,我没有课题负担,便派我去参加,使我不但对一个县的方方面面进行长时间的深入研究,还可以到上海、江苏、四川、湖南、湖北等地的先进县去考察。考察的结果,看到广大农村都处于贫困之中,即便南方的粮棉高产地区,粮食亩产千斤以

上,亩产皮棉百斤,在那个年代,产量算十分高了,但除去成本除去征购也难得富裕。

一些富裕社队主要是依靠工副业,当时叫做“以工补农”。从全国有名的富裕社队我得到了启示:只靠种植粮棉油,农民再艰苦奋斗也摆脱不了贫困,其实道理很明显,农民人均一二亩地,国家拿走一部分征购,购的部分都是低价。还要养社、队一批干部,除去生产成本,农民剩下的还有多少,不仅不能富裕,许多地方,农民辛苦一年,一家老小还填不饱肚子啊!

根本出路是必须把一部分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允许他们务工经商才能摆脱困境。我看到南方一些富裕社队,都是这样。虽然有些做法和现行政策抵触,但当地领导多是睁只眼闭只眼,有些地方已经是半公开了。所以我决定进行“建立农工商综合经营的农村经济体制”的研究。在全国十个重点县调查的总结汇报时,我详细谈了自己的看法,得到了国家农委领导的赞同。我向所里详细汇报以后,就以这个题目作为我的课题,得到了所里的批准。

这样就必须摆脱“以粮为纲,一切砍光”的束缚,冲破政策上的许多条条框框,转变一提农业就是种植业,一提农民就是种地的传统观念和认识。可是当时还是人民公社体制,议论“以粮为纲”仍然是一个禁区。让农民搞商业,更是国家政策不允许的。虽然当时已开始允许少数社队搞集体企业,但当时政策却只允许三就地:就地取材,就地加工,就地销售。不管是原材料还是产品,从外地采购或是运到外地销售,就是犯投机倒把罪,有人就是因为把自己加工的粉条运到东北去卖被判了刑。所以这种主张、这种研究是要担很大风险的。

我对这一系列的规定十分反感,搞商品经济要人尽其才,物畅其流,怎么能把人和物资都捆在当地不准流通?不仅搞工副业如此,就是农业生产也是把农民捆得死死的。

所里让我带一些科技人员到基地县一个公社搞综合试点,种什么、什么时候种、什么时候收,连什么时候浇水,什么时候施肥,都是县里统一指挥。稍有不同意见,公社、大队干部便要受处罚,扣奖金,不准评先进,气得农民们说全县只有县委书记一个人会种地。在点上的这种切身感受,又加上在全国各地的考察研究,逐渐感觉到农民长期贫

困的根源，正是这种人民公社制度下的种种政策和规定，剥夺了农民和基层干部的自主权，把农民死死捆在土地上，再艰苦奋斗也摆脱不了贫困。

1979年底所里举行关于农业现代化道路问题的学术报告会。当时在社会上这也是个热门话题，争论十分激烈，最后大体上分两大派，一派主张走“机械技术现代化道路”，简称美国或西德模式。另一派主张走“生物技术现代化道路”，简称日本模式。我第一个作了学术报告，针锋相对地反驳了这两种模式，认为这两种模式目前都远离了中国国情，农民处于贫困状态国家又没有经济实力根本行不通。我讲的题目是“借鉴国外经验，走中国自己的道路”。在如何实现农业现代化，中国农村怎样才能富起来的问题上，把与有名专家、高级领导人的不同意见都讲了，实质上已把公社那一套否定了，只是没敢明确反对公社制度问题。因为当时人民公社还是公认的社会主义模式，是通往共产主义的桥梁，公开反对那还了得？出路何在？我认为中心问题是突破现行体制、政策的束缚，给农民自主权。调整农业结构和农村经济结构，大力发展畜牧业和允许农民办企业。不仅允许农民办工业，而且允许农民办商业，进入流通领域，建立农工商综合经营的农业经济体制。这些话现在已毫无新奇之处，在当时却无疑是一颗炸弹，震动了所有的人。但是也招来一些人的反对，说我一是反省委的以粮为纲，二是反中科院有的领导的现代化主张。

可是全国形势发展很快，上上下下许多人的思想都在解放。1979年我确立这个课题时，国家对农民还管得很死，除深山的孤门独户以外一律不允许包产到户。1980年中央就开了一个小口，规定边远山区和贫困地区可以包产到户。1981年中央文件便认为困难地区实行包产到户稳定几年大有好处了。1982年中央又明确包产到户、包干到户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包产到户总算报上户口了。1983年包产到户不仅允许生存，而是农民的伟大创举了。有人说中央这几年关于农村的文件，是步步为营，节节败退。这也说明冲破多年来的束缚是艰难的，思想解放有个逐步发展的过程。步履艰难但不能说节节败退，而是步步前进的。不仅在包产到户的问题上如此，其他各项农村政策也都是如此。

在这种形势下，我的处境大大改观。如果说前二年还有人把我的报告作为反省委反中科院的罪证，而且这种认识还有市场时，那么现在许多人已对那种见解认为是一种先见之明了。我的“建立农工商综合经营的农村经济体制”的课题在1980年便名正言顺地列入了国家农委的课题，得到了国家的资助。1980年秋烟台全国农业经济学术研讨会上，我作为大会的第一个主讲人进行了宣讲，深入论述了建立新的农工商综合经营的农业经济体制方面的种种问题，反响强烈，获得许多专家、学者和一些领导人的认同。

这一年多的时间里，不仅课题研究取得了显著成果，课题论文以国家农委课题组名义，收入了《中国农业年鉴》（1980）。我在报刊上发表了不止几篇文章，还与人合作编写了将近百万字的《农业技术经济手册》，这是一部新的学科的大型工具书，很受欢迎，出版不久又再版。仅仅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所里许多人对我印象变了，一年多以前刚到所里的时候，不少人看不起，这时都觉得这人行，有头脑，想不到还真有两下子。

这个研究所虽然是个新建单位，但建立时正赶上平反多年的各种冤假错案，文革中被打倒的大批领导干部也得到了解放，许多老干部急待安排。研究所初建，也需要一些有威望的老领导来处理方方面面的关系打开局面，所以一开始就组建了一个年龄老化的班子。主要领导人包括有的处级领导都是六七十岁的老人。当时班子老化是十分普遍的现象，在许多党政单位，由于多年七斗八斗，新派性加上老派性，矛盾重重，问题更为严重。

邓小平同志认为这种班子老化、机构臃肿，许多人不称职，工作不负责任，不讲效率等种种情况，已经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要求精简机构。明确提出了要实现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说这场革命不搞，让老人、病人挡住比较年轻、有干劲、有能力的人的路，不只是四个现代化没有希望，要涉及到亡党亡国的问题。他说目前主要任务是善于发现、大胆破格提拔中青年优秀干部，强调特别优秀的要给他们搭个轻便的梯子，使他们越级上来。这也是针对当时特殊情况下提出的，因为多年来干部工作重视家庭出身、排斥知识分子，使得知识分子干部能进入省、地、县领导班子的是少而又少。要强调年轻化、知识化不采



取特殊政策是不行的。

中央提出机构改革和干部“四化”以后，所领导都知道很快就要退下来，更影响了积极性，老班子的改建已迫在眉睫。中科院在1982年就根据中央机构改革要求作了具体部署，开始物色新班子人选。人们看清了这种形势，上上下下也自然都紧张活动了起来。所领导各自在挑选自己中意的人，想进领导班子的人也在领导中寻求支持。研究所里绝大多数都是大学生，许多人都符合“四化”条件中的知识化、专业化的硬指标。由于是新建所，许多人都属于中青年范围，符合年轻化的条件。有人由于职务的重要，和所领导接触频繁，感情融洽。有人善于交际，和许多人都是自来熟，有很好的群众基础。更有有心人整天围着领导转，以寻求支持。

我只是个研究室副主任，向来不善交际，只是整天如饥似渴地埋头读书、收集资料、潜心思考问题，和所领导没什么接触，和群众也很少联系，所以对所里即将来临的人事大变动，很不敏感，也不愿操心，自己觉得没这个条件，更确切地说也没这个兴趣。落实政策中是那样的艰难曲折，落实政策以后，省里县里谁也不要。这种情景，仍历历在目，刚刚稳定下来能干点事情，哪里有心思去争取当什么所领导？

谁也想不到，到了1982年所里正式酝酿接班人的时候，几经比较，几经周折，我竟成为唯一的一个被领导班子成员和多数群众所接受的所党委书记的提名人，上报中科院以后，很快得到了批准。不少人想得到这个职位都落空了，我对这个职务想都没有想过，结果却落到了自己的头上。真是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行了。

研究所是中科院直接领导，但主要领导的任命须征得省委同意。一般讲中科院同意了，省里也只是走个手续而已。可是谁也想不到，这个手续就是走不下来。中科院催促，所里党委书记去催促，半年过去了，仍然没有消息，这不是工作效率低的问题，也不是人们常说的拖拉作风所致。其中必有



白石在美国考察（1990年）

缘故，可是为什么呢？谁也想不清楚。

老书记很着急，他到省里找了多次也不给个明确答复，便决定带着我去找省委组织部，要求省委很快下文。我说这样的事我去不好吧！哪有人要求组织对自己的任命快批的？您去就行啦！老书记说我已经跑了多少趟了，他们光应付。有你去我要让他们当面说清楚，中科院批了半年了，省里为什么老是拖着？有什么问题让他们当面说清楚。我十分为难：这话我不好说。一定让我去，我可不说话。

组织部常务副部长王部长立即接见了我们。他也已经70左右了，人很和气。老书记发了一通脾气以后，他不仅没生气，还和蔼地笑着说，中科院批准了，省里决不会阻拦的。但是任命嘛！还得等一等。几个月都等了，不会再让你们等几个月，快了，再等一等。老书记生气地说，我真不明白，中科院早批了，省里还有什么犹豫的？有什么意见明说，没理由又拖着不办，省委办事怎么能这么拖拖拉拉？部长说你误会了，不是省委办事拖拉，近一个时期省级机构改革，实在太忙啊！

老书记火了，再忙也不差我们所这一个人嘛！省级机构改革要紧，中科院机构改革就不要紧？而且省里各个摊子都在照常运转，我们那里可是火烧眉毛啊！现在连党组会也开不成。中科院那么重要一个所，一大摊子人都是从全国四面八方调来，新凑在一起，急需一个强有力的班子领导啊！现在整天只要我一个老头子，我实在受不了啦！

部长还是笑笑安慰说,没多长时间了,再坚持一下吧!老书记还是不依不饶说,白石同志今天也来了,我向省委说明,他已经正式主持全所工作了,这可是名不正言不顺,对工作对他本人都是十分不利的。省委到底为什么长期不批?如果对他还有什么疑问、怀疑,也希望说明。他虽然在场,可是他是经得住磕碰的,当面谈也没啥关系。

部长连忙否认:不,不,省委对白石同志绝没有不信任或是怀疑的地方。老书记说那我就不明白了,为什么长期不批?忙绝不是理由,这期间省委任免了多少干部,难道就差这一个人吗?王部长有些无可奈何,神秘地笑了笑,显然他已被老书记逼到了墙角,再想含糊推脱不行了,只好透露点实情,吞吞吐吐地说:“是这样,省委对白石同志的使用,有点想法,……不过,这一切还在考虑中,没有定。”

省委有点想法,什么想法并没有说。我经过长期劳改和群众专政,受到的怀疑和不信任太多了,在这方面十分敏感。觉得自己只是个副处,也没有在县、地党政领导机关当过领导,虽说邓小平同志多次讲过我们不能老守着台阶的旧观念,干部的提升,不能只限于现行党政干部中区、县、地一类台阶,这才能大胆破格提拔。可是实际工作中有些人又往往重视一个资历,重视个台阶。省委有点想法,是不是觉得我从副处越过正处、副厅长一下到正厅,这格也破的太大了。说是没怀疑,对我这样一个多年劳改的人,是不是还有什么不信任?

倒是老书记当领导多年,一听省委有点想法,便立刻意识到可能是调到省里哪个厅局,因为一提出领导干部“四化”,学历这一条就把人们限制住了,哪里选人都很难。省里各部门很着急,都在物色接班人。很可能是省委觉得研究所大学生多,选人容易,要把白石调走。所以老书记马上着急地说:哎呀!刚才我已经说了,我们那里是火烧眉毛,好容易选了一个合适的人选,要拿到别处去,我们可绝对不能同意。部长心里明白,到时候你想挡也挡不住,而且你也不会挡了。不过这话不能说出来,只好笑笑说,好吧!我一定向省委反映你的意见。

省委的那点想法是什么?我和老书记都没猜对。

找省委以后没几天,我正在厨房和面准备蒸

馒头。以前这些家务事都是妻子冯以平做的,自从去年她当上报社总编辑以后,百事缠身,下班总是回来很晚。我们早已搬到所里新建的大院上班,宿舍也在院里。研究人员又不是严格的坐班制,时间灵活,这做饭的家务事儿,便大部分成了我的事儿。正巧这天冯以平下班早,进家一看我穿着一个大花围裙,两手是面便急了,风风火火地说:“哎呀!你怎么这个样儿啦!快洗手去。”我莫名其妙。

“哎呀!你还愣着干啥?省委解峰书记找你,快!”妻子十分着急。“解书记?咱也不认识,他找我干啥?”我十分纳闷儿。她说:“我也奇怪呢!他找你干啥呢!”说到这儿她也有点犯思索。但看到我还站着不动又急了:“你快洗手走人啊!车在下头等着你哪!”这回我也急了:“来车了?你早说呀!”她这才有些抱歉地说:“你看这一慌我倒忘了说了。”她说一回来正好碰上一个人问你住哪儿呢!我问他是谁,他说是省委解峰书记的秘书,解书记请白石同志马上去一趟,就赶紧跑上楼来也没说清楚。

坐到车里,我问秘书:“您贵姓?”秘书客气地欠了欠身:“我姓杨。”我说:“啊!杨秘书。”秘书十分不自在地笑了笑,好像承受不起这秘书的称呼:“啊!以后您就叫我小杨好了。”我觉得也没叫错呀!现在不是都这么叫吗?况且省委书记们的秘书顶小也得是个处级,和自己一样,有的还是副厅长,自己怎么好不称官衔呢!我想了想,这个小杨还是叫不出口,便说:“杨秘书……”不!不!“我一张口,杨秘书马上打断了我,连说了几个不字,然后十分爽快地说,“您就叫小杨,或者小杨子。”我一看对方态度十分真诚,绝不是客气,虽不明个中情由,只好免了这个开头语,试探地说:“知道解书记找我有啥事吗?”杨秘书从前座上扭过头来好像十分抱歉地说:“啊!不清楚。”

我和解书记没见过面,更没私人交往,什么事呢?竟然连秘书也不知道。是真不知道?还是不愿意告诉我?不管是真不知道还是保密都没法再问了。极又不善于交际,向来也不会那种自来熟,只好沉默了。可是我的心里却是七上八下地一个劲儿地翻腾。事先不打招呼,又搞得这么神秘,这是什么事呢?

终于到了,不是省委机关而是解书记的家里。一进入客厅,解书记便笑着迎过来,热情地紧紧地



握住我的手说：“你就是白石同志？坐坐。”许多年来没单独见过这么大的官了，我心中充满了惶惑，虽然书记一个劲儿让我坐，但我还是拘拘束束地立在那里。可是书记却执意让坐也就只好坐下了。书记给我倒了一杯茶，他才坐下来：“今天把你找来，是通知你经中共中央批准，你进省委领导班子，任省委常委。”

“我？任省委常委？”书记的话虽然听清了，可是又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恐怕弄错，所以还是惊愕地问了一句。书记笑笑：“是啊！你任省委常委。”

“我能行吗？”我有些惶惑。书记仍然慢声慢语地解释说：“省委经过多次考察研究，根据你在各个历史时期的表现，尤其是在反右运动中，顶住巨大的压力，没有的事情，错误的批判，一概不接受，决不说违心话，那是很不容易的。虽然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几乎葬送了自己的一生。但是重新工作以后，仍然一如既往，顶住巨大压力，冒着很大的政治风险，在改革的道路上进行着很有价值的探索。你近几年来发表文章的要点省委几个领导也都看过，大家觉得领导班子中，应该吸收这样的人。你可能觉得自己多年没工作，又没担任过重要领导职务，一下到省委领导岗位干得了吗？省委对这些问题也都考虑过，认为你会胜任的。”

“这太突然了，我怎么预先一点也不知道啊？”解书记说：“你不知道，我们却是多次考察酝酿很久了。这次进省委省政府班子的只有六个人，却是从几百个目标中挑选出来的。省委常委对你们几个已经讨论多次了。消息没透露出去，说明保密工作做得好。”

“到省委分管什么工作？”我仍然有些惶惑。解书记说：“还没最后定，初步考虑，让你分管组织。按你的性格，又比较超脱，在省里也没有什么拉拉扯扯的关系，和这个派那个派没有任何瓜葛，担任这个工作是合适的。也可以分管办公厅。你回去考虑考虑，把意见告诉我。”看书记看了看表，我也看了看表，已经快12点了，便只好告辞。省委多次派工作组考察，在全所进行民意推荐投票，有一次中央组织部还找我谈话，一谈就是半天。这么大动作，为什么所领导和我都没察觉事情有变呢？我们都以为这还是为考察当所党委书记的事呢！中组部找我时，老书记倒是有过怀疑，中科院考察了，中

组部怎么还来呢？他猜想准是上边对这样一个人有争议，20多年不是劳改就是农村劳动，由个副处一下当中科院研究所的一把手，是让人有点担心啊！任所党委书记，都觉得是连升三级，他哪敢还往高里想啊！谁又会往省级领导那里想呢？

八十年代初党中央提出了要进行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和省、地、市、县等机构改革，确实是一场实实在在的革命。机构改革的关键就是按“四化”要求改建中央各部及各级党政领导班子。“四化”不仅是一个口号，而是有具体杠杠、有硬指标，是容不得换汤不换药、蒙混过关或打马虎眼的。

那时的省委班子，是中央不久前调整过的，主要领导不少是被打成反革命、走资派，多年靠边站，复出后急于想干一番事业的人，反对任人唯亲。省委按照“四化”标准提出具体条件，让每个地市、厅局级单位、大专院校等各推荐两名适合进省级领导班子的人选。一下就提出600多人，经过详细筛选、考察，逐步缩小，又缩小到20人，中央也派来了工作组共同进行选拔工作。最后确定我们4人进入省委领导班子，两人担任副省长。新的省委班子包括新进的4名大学生，才有13人。新进的人中，都不是领导身边的人，而且以前一直也没在领导视野之内。中央很快批准了新的方案，说这是个搞五湖四海的领导班子，中央很满意。

（责任编辑 致 中）

### 作者简介

白石，河北省乐亭县人，1927年生，1945年1月参加革命。一生颇多磨难又富有传奇色彩。18岁在大学学习时就蹲了国民党的大狱。1955年和1957年又先后被打成胡风分子和右派分子。在劳改和群众专政中度过22个春秋才获得平反。但1983年初却奇迹般地由副处级一步跨进省委领导班子。曾任河北省常委、秘书长，省纪委书记、中央纪委委员，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白石青年时期和平反后发表了各种形式的文学作品百多篇，出版过特写集、长篇报告文学。离休后潜心文学创作，出版了自传体长篇系列小说《从囚徒到省委书记》第一、二部64万字，与妻子冯以平合写），首印1.2万册，几天之内又加印1万册，很快销售一空。现在第三部40万字也已定稿。这篇文章是正在写作的自传中的一部分。

# 我看社会主义

何方

## 一、两大流派和两种实践

兴起于十九世纪的国际社会主义运动，进入二十世纪已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主要潮流。这表现在两方面。一是两种自觉的社会主义实践。一是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社会主义胚胎（或因素）”的迅速发育和许多新独立国家选择走社会主义道路。对后两种情况，下面还要专门讨论。这里先谈前两种实践，就是共产党执政的国家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及其向共产主义的过渡，和社会党（包括工党、社会民主党等）执政的国家实行的社会民主主义。这两种实践，是在马克思主义两大流派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的思想指导下进行的。下面对这两者作点简单介绍。

### 共产党执政的国家

苏联解体前，这些国家都按斯大林模式，经济上消灭私有财产、实行单一的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除上层保有一定的等级制和特权外，群众中多实行平均主义），国内商品短缺，对外闭关自守，但也都有低水平的社会保障；政治上实行高度集权的一元化领导体制，意识形态上实行严格管制，禁止争鸣。因此，它们的经济不发达，社会不成熟，政权不稳定，时间一长，就难以为继。苏联和东欧国家就是在同资本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竞赛中自行崩溃的，而不是由于外来敌对势力的武装侵略或和平演变。邓小平也说，中国如不实行改革开放也一定垮台。事实确实如此。共产党执政的中国、越南由于进行了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生产就得到飞速发展，国际地位大为提高。但政治上意识形态上的权力垄断没有及时大力改革，所以问题还很多，社会不够稳定。

### 社会民主主义国家

这主要指二战前的瑞典、芬兰等北欧的社会

民主主义国家，和二战后工党、社会党几度执政的英国、荷兰、奥地利等民主社会主义国家。其实，社会民主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基本上是一回事，目前学界谈论时已通称民主社会主义，所以这里也就把两者合在一起来讲。不过细分起来它们还是有区别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和社会主义因素的多少都不尽相同。1951年英国工党发起恢复社会党国际的法兰克福会议，社会民主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两方面都参加了。在会议上通过的宣言中正式提出，“民主社会主义的目标和任务”是“扩大民主，把权力交给人民”，“使自由人能以平等地位在社会中共同工作”。民主社会主义为自己规定的原则是“自由、平等、博爱、民主”，经济上实行混合所有制和有国家适当调节的市场经济，建立体现平等原则和博爱精神的社会福利制度，允许意识形态多元化，上层领导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也在淡化。虽然各国的社会主义化进度参差不齐，执行和实现的程度有很大差别，以瑞典为代表的北欧国家就做得比较好些，其他称为民主社会主义的国家就做得差些。但是它们的大方向还是一致的，社会主义的因素也都在迅速增长。以财富占有来说，这些国家平均约有一半左右属于国有资产、公用事业和社会福利的公共部门，其中瑞典的公共部门占全部国民收入的65.4%，英国占47%。在所有制问题上，瑞典社民党还力图进一步做到公平，设法将企业利润逐步从资本家手中转给工人集体。因此1983年社民党执政时搞了一个“雇员投资基金制度”，规定每年从资方的超额利润（超过50万克朗）中提取20%交给职工集体的基金会，并将雇主代职工交的养老金提高1%。他们估计，经过三五十年，基金就可占企业股份的一半，私有制就将逐渐变为集体所有制。为了抗议这一法案，资本家组织了一次有七万五千人参加的游行示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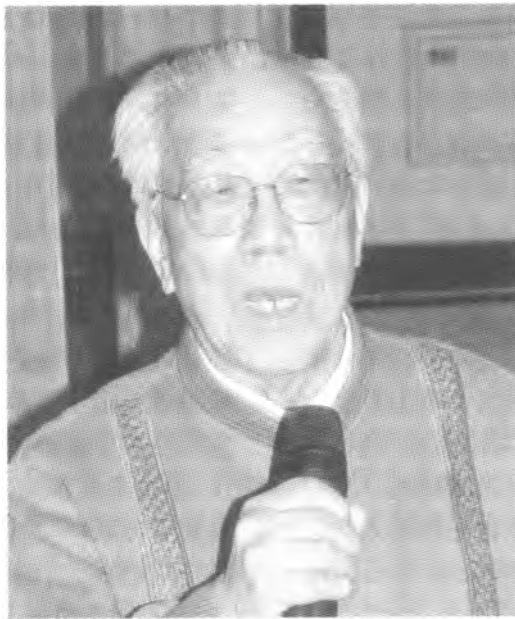


## 两种实践,两种结果

民主社会主义国家和共产党执政的国家,是二十世纪两种社会主义模式在进行竞赛和比较。实践检验的结果是,民主社会主义取得程度不同的胜利和成功,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向共产主义过渡(苏联开始于1936年社会主义建成,中国实行于大跃进时期)遭到失败。这已是不争的历史事实。这里就以瑞典等北欧国家为代表和苏联作点比较。瑞典、芬兰是二十世纪初欧洲最落后的国家,自然条件恶劣,但

到1970年代,富裕程度已名列欧洲前茅(1980年瑞典人均产值达一万五千多美元,超过当时的美国、西德等大国),真正做到了经济繁荣、政治民主、自由充分、福利完备、社会稳定、道德良好(清廉居世界头几名,贪污腐败和犯罪率最低)、人人平等(除政治上以外收入差距也最低)。消灭了等级制和特权,整个国家,总理、部长在工作时间配用专车的不到五人,首相或总理的家庭也不配备服务人员。更没有工资的“含金量”差别极大和什么正部长级的副部长以及医疗、住房、用车等分类的“正部级待遇”、“副部级待遇”这些规定。基本上消灭了三大差别,做到了普遍富裕等等。以马克思主义的自由人联合体为标准,民主社会主义国家探索的道路是基本正确的,而且成绩不小。这些国家实行代议制民主,有定期选举。这是人民管理和监督政府的好形式。有时人民不满社会党的政策,也会通过选举更换政府。但是由于社会福利制度一般具有能增不能减、能上不能下的刚性特点,所以上台的无论是右派还是中间派,都不能改变社会党的福利政策,也不能改变人民取得的基本权利和利益,结果就自然改变不了民主社会主义的根本性质。瑞典中右派几次短期执政都是证明。

相反,苏联的斯大林模式原本就走错了路,不但离“自由人联合体”越来越远,还导致经济落后(以前公布的许多数据弄虚作假,水分很大。



何方

1967年官方公布的国民生产总值为当年美国的—32715亿美元—67%,此后再未公布。据西方权威机构联合调查,苏联解体前1989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只有5120亿美元,与加拿大相当,实际上不到美国的十分之一。可见苏联当年统计的水分之大。俄罗斯官方承认,苏联的粮食产量直到垮台时还没赶上沙俄时的水平)、政治独裁、专制程度和滥杀无辜超过沙俄)、文化凋敝(文学就赶不上十九世纪),共产党领导和苏维埃政权终于被人民抛弃。当然,苏联存在的七

十多年也做出了很大成绩,如提高和普及了社会福利,缩小了收入差距,实现了工业化,打败了希特勒等,但这些都付出了很大代价,且没能避免崩溃。现在中国有些人还坚持唯心史观,把苏联的垮台完全归罪于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但据我所见所闻,苏联人民并不这样看。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三国,二战前的经济水平不低于瑞典、芬兰等邻国,地理条件还优越些,但加入苏联后很快就落后了。1980年当瑞典、芬兰人均产值已达一万五千美元左右时,它们只有四千美元左右,还是苏联各共和国中最高的。至于自由、平等、民主等就更谈不上了。所以还在苏联解体前,立陶宛共产党和最高苏维埃就通过决定,宣布脱离苏共和苏联而独立。

在苏联解体期间,我有一次去了列宁格勒,那里正酝酿投票这座城市改名的问题。我曾问到坚决主张改名的一位二战中卫城英雄,为什么要换掉列宁这个光荣的名字而恢复旧名。他以沙皇时物质文化生活在欧洲的地位和后来的苏联相比,无限伤感地认为苏联的革命搞错了,说二月革命后要是也实行民主、发展经济,俄国现在决不会处于在全欧洲平均水平之下的落后地位。我们争论许久也说服不了他(其实按照马克思、恩格斯对德国革命的设想,俄国二月革命后的主要任务也应当是反对专制、争取民主和为资本主义发展开通道路)。

据最近(2007年初)我国权威报告所提第一次(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化)和第二次(工业文明向知识文明转化)现代化标准,北欧各国不但早已是发达国家,而且第二次现代化的世界头十名中就有瑞典(第一名)、芬兰(第三名)和丹麦。无论按文明和现代化的哪条标准衡量,斯大林模式的国家都大大落后于民主社会主义国家(也落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决不能以起点低、底子薄为借口,看一下南北朝鲜的差距就行了。所以两相比较和衡量,民主社会主义基本上是胜利的成功,共产党领导下的斯大林模式(包括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则是错误的失败的,其中没有一个国家获得成功。这就是二十世纪作为人类社会历史重大特点的社会主义运动已经作出的结论。

## 二、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

什么是社会主义,邓小平说,过去我们并不清楚。因为以往对社会主义的经典理解,就是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现在要实行改革开放,这些当然都不适用了。

在世界上,社会主义也是五花八门。据有人引证瑞典前首相帕尔梅的话说,自称社会主义的国家,曾多达七十余个,遍布亚非欧拉美。如果按社会主义流派和它们的制度与政策区分,我看大体上可以分为三大类: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民主社会主义国家和选择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民族独立国家。

这三类中以第三类最庞杂,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有些还是前资本主义社会因素占优势)很难分,也容易变。不少国家是某个政党和领导人上台后宣布实行社会主义,下台后是否还在实行就不清楚了。但也不能看不起这第三类社会主义国家,一则它们在三大类中为数最多,二则其中一些国家实行社会主义某些原则还相当认真。据说印度改革前执行计划经济就很严格,以至在某些地方或部门不允许超额完成任务。

至于它们(第三类)对其他两类的倾向性,大体说来,多数倾向于第一类,少数倾向于第二类。比如它们都基本上承认共产党执政的是社会主义国家。但社会党执政的就不承认,而称之为共产主义或专制主义。不过对别国社会主义的承认

与否,恐怕最狭隘的还是共产党。它们主要不以社会经济状况和政治体制为标准,而只按意识形态的几项教条特别是领导人的主观意志来划分。例如共产党国家就始终不承认民主社会主义国家为社会主义。瑞典等北欧国家社会主义因素再多,也被划入资本主义世界,某些贫穷和统治严酷的国家,却被看作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由于共产党实行个人崇拜的人治,所以一国的社会性质还往往由领导来定。例如斯大林一发脾气,南斯拉夫就变成了资本主义。赫鲁晓夫发点“善心”,它又变成了社会主义。匈牙利事件后,它被开除了,但过了几年就又变回来了。中国也是多变。先是跟着苏联“一边倒”,从不承认变为承认。后来由于“反修”,自己又变了两回,而且快得令人眼花缭乱,才和铁托称兄道弟,匈牙利事件一起,又赶紧写了一篇“三评”——《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社会主义阵营存在时期,我们称苏联是老大哥,还劝大伙儿尊它“为首”。没过几年,毛泽东和赫鲁晓夫闹翻了,立即定它为“社会帝国主义”,还是世界战争的主要策源地。毛泽东去世和两国关系正常化后,又承认它是社会主义了。但在东方,我们还是有一大阵继续坚持毛泽东的“反修”路线,例如宁可赞赏和支持波尔布特残暴统治下的柬埔寨为社会主义,却认为多年并肩战斗共同反美的越南变修了(变成了资本主义)。

这样看来,什么是社会主义至今也还是一笔糊涂账。但是经过二百年的理论探索和近百年的社会实践,人们对社会主义总可能做点初步分析,得出一些初步结论了吧。当然,分歧还会有,争论还会继续。但是当前的问题已不只是在理论上要弄清,关键是要实践,是马上要做。如果什么是社会主义还弄不清楚,那么不但写在党章和宪法上要每个人必须遵守和坚持的这一套变成了空话,而且反倒成了一些人用来限制人们自由和随意整人的依据,更重要的还是全国人民不知道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只能跟着个别领导人的说法转。但各时期领导人的解释又不一定相同,结果就会出现重大差别。以文化为例,遇到开明的领导,主张遵守马克思主义规定的自由民主,那就会出现百花齐放、党内生活生动活泼的盛世;遇到强调专制集权的领导,就会制造各种借口,严行思想管制,坚持舆论一律,结果必然是百花凋



零、万马齐喑。这是中共党史一再证明了的。所以研究一下什么是社会主义，不仅是理论界的事，而且也是各级党政领导和全国人民的事。

但是要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当年曾一再声明，对未来社会还没条件作出具体的预测，甚至拒绝回答人们提的这个问题。恩格斯就曾拒绝把当时人们描绘的共产主义当做终极目标，只是强调历史的发展和工人阶级以及人类的解放。因为科学预测不是算命，没有充分根据，也只能是空谈和空想。所以关于社会主义的研究和讨论，只要实事求是地抓住主要特点和当前争取的目标就行了，不宜抠得太细，描述得很具体。如果那样做，就可能限于玩弄教条和流于空想，反而于事不利。有鉴于此，我在这里粗线条地列举几点现实社会主义应具备的条件。这是个人意见，不一定对，供大家讨论。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原则精神和两百年来对社会主义的研究与实践，我个人的理解是，社会主义国家或社会，大体总要具备(或正在积极创造)以下几个基本条件。

1, 发达的生产力和丰富的产品。社会主义本来就产生于资本主义生产力的高度发展，而且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还应继续大力发展生产，特别是那些原先水平较低国家和地区，使社会享有丰富的产品尤其是公共产品。这样才有可能实现社会主义的一些基本要求和条件，如消灭三大差别，建立完善的福利制度等。

2, 混合所有制和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由于发展生产和市场经济的需要，社会主义初期必须以生产资料私有为主，然后逐渐发展到集体所有制(也就是马克思说的社会占有)和按劳分配为主。

3, 自由民主，平等法治。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而自由则是民主的前提和基础。社会民主党创始人威廉·李卜克内西说：“正因为我们弄清了社会主义同民主不可分割的关系，我们才称自己为社会民主党人。”没有法治的自由民主，又会成为没有正常社会秩序的无政府主义。而法治又必须排除等级制和特权，建立在人人平等的基础上。所谓平等，是指政治法律上的平等、社会生活和人格上的平等、公民在谋求利益和自身发展上的机会均等，而不是物质享受和社会责任上的平均或等同。

4, 高尚的道德文化和健全的社会福利。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具有高度的精神文明和完整的社会保障。那里有发达的科学文化，人人都有学习和深造的机会。良好的社会制度和风俗习惯，造成人际间公平、正义、互信、互助，清除腐败、愚昧、迷信、造假。社会讲求公开性和光明正大，反对暗箱作业和阴谋诡计。根据平等原则和博爱精神，建立一套健全的社会福利体系，使人人享受到幸福，社会和谐、稳定。

以上四条也许有重叠和遗漏，但无论如何都是一些重要标志，缺少一条也不能算是社会主义。例如怎样对待市场经济和单一公有制，就是近百年实践取得的重要教训。事实证明，不实行市场经济、坚持单一公有制的社会主义是迟早要垮台的。民主和社会主义，在涵义上几乎等同。没有民主的社会主义，只能是君主专制主义或法西斯主义。不讲自由，只讲愚民政策和镇压，当然也不是社会主义。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贫富差距过大也不是社会主义。所以斯大林模式的国家，实行的不是社会主义。不管用多少社会主义词句，在人民心目中 and 历史上仍然不能算作社会主义。至于改变后是不是资本主义复辟，还可用上述标准来衡量。

长期以来，国际共运中始终只认一个标准，就是只看它是不是由共产党领导。只要是共产党领导就是社会主义。否则社会主义因素再多，但不是共产党领导，就只能是资本主义。这是一种违背马克思主义的狭隘宗派主义。必须改变这种只看标签的办法，而应按客观标准评定一个国家的性质，看它所含的社会主义因素有多少。社会主义因素多的国家，不管它是由什么党领导和人们怎么称呼，都应定为社会主义国家或走向社会主义的国家。离上述标准太远的国家，即使一切完全由共产党控制，也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只有按客观标准为社会主义正名，才能恢复有史以来人民心目中的社会主义名誉。

### 三、两种社会制度的趋同

现在世界上存在的主要是两种社会制度：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者之间是一种继承、发展和融合的关系，不是以前人们认定的那种只有对

抗、消灭和推翻的关系。人类历史也是循着这个方向发展的。这就是两种制度从原来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进一步相互靠拢、趋同，最后走向社会主义。这个社会主义是个什么样子，现在还只能走着瞧，但可以比较肯定的是，绝不是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倒更接近社会民主主义。

进入二十世纪，随着资本主义本身矛盾的加剧和社会主义运动的高涨，资本主义内部的社会主义胚胎也就生长得越来越快，实际上也是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趋同或过渡。以美国为例，先是在群众的压力和推动下，由政府发起“进步运动”，逐步实行抑制垄断、开放和监管股票市场、提高社会福利、扩大公民参政、增加公共产品等，已经在为趋同开路。到罗斯福实行新政，可说是更使趋同进入一个新阶段。在这之前，苏联的社会主义虽然走错了路，但还是显出了摆脱危机、集中办事、普遍福利等不少优越性。以瑞典为代表的民主社会主义，表现出的优越性则更为突出。这些既可供资本主义借鉴，也是促使它进行调整和改革的压力与动力。二战后，三种类型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有大量增加，从而更加大了对资本主义的压力和推动，使它进一步自觉地加速向社会主义学习和借鉴。例如，1965年资本主义国家一批代表曾聚集美国费城，召开了一个大会，叫做“世界资本主义大会”，发表《资本家宣言》，提出要借鉴社会主义的经验。由此可以看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朝这个方向调整和改革时，虽然参差不齐，但都是比较认真的。因为这不只是社会主义国家和工人运动的压力，而且也是资本主义本身的发展需要和趋势。加之它们的基础雄厚，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又走了弯路，所以在二十世纪下半期，它们就在和平竞赛中领先，不但经济、科技得到快速发展，还率先实现了一些原为社会主义追求的目标，在物质生活、社会福利、民主政治、自由平等、文化教育、科学技术等方面都走到了前面。

事实上，现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社会主义因素（即马克思说的胚胎）就已大大高于和多于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当它们消灭三大差别几十年后，也许中国才能解决毛泽东时代留下来的城乡二元结构问题。这就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居民长期和大量向发达国家“偷渡”和移民，而不是相反

的原因。无怪乎有些人从加拿大、澳大利亚、西欧国家回来对熟人说，咱们算什么社会主义，人家那才是社会主义呢！前国家领导人王震，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去英国进行调查访问后，对陪同人员谈到他的观感时说，“我看英国搞得不错，物质极大丰富，三大差别基本消灭，社会公正、社会福利也受重视，如果加上共产党执政，英国就是我们理想中的共产主义社会。”（这是前驻英使馆人员分别撰文提到的）随着全球化和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趋同的速度还会加快，而且还越来越自觉主动。例如布莱尔和克林顿提出“第三条道路”，美国有61名民主党议员成为“美国民主社会主义”的会员、欧盟的扩大和趋向均衡发展等。看来，西方发达国家“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很可能在“共产党国家”走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成社会主义）之前。

从社会主义方面来说，三大类国家都在继承和借鉴资本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的路虽然走得对，发展一直处于世界前列，但也必须继续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的东西。例如瑞典等国由于税率高和福利高，因而影响人们的工作和劳动积极性，使社会发展放慢，国家竞争力下降。后来这些国家在政策上作了调整，就又改变了面貌，芬兰2006年在世界竞争力中已排名第一。不过整个说来，西欧国家的福利和工会问题对经济发展上的消极影响一时还难以解决，使经济增长和竞争力在最近很长一个时间内落后于美国。但应说明，由于这些国家都实行民主政治，有定期议会选举和政府换届的社会调节机制，社会党搞不好，人民就会选保守党上台。保守党执政后会采取一些抑制福利和工会及其他右的措施，但它不会造成对原有社会主义因素伤筋动骨的改变，否则人民不答应，又会把它赶下台。就是英国撒切尔夫人搞的私有化，也并不是人们原先理解的那种私有化。所以即使在右派统治下，资本主义内部的社会主义“胚胎”仍在走向成熟，只是速度被搞得慢些而已，并未改变社会发展的基本方向。至于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向资本主义的趋同就更明显了。苏联东欧各国采取的是彻底打破斯大林旧体制的办法。中国、越南则是对原体制进行改革，大量借鉴资本主义的他山之石，如混合所有制、市场经济、多种分配、对外开放等。

由于是借鉴,所以就可多可少、可急可缓。中国、越南两国现在都搞得很不错。掌握得好,效果会更显著。

在这个借鉴和趋同问题上,还是邓小平说的,防“左”反“左”是主要的,而且也是长期的。从《共产党宣言》开始,百余年来国际共运和先后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一直都是吃“左”的亏。现在中国仍然如此,“左”是前进道路上的最大障碍。

苏联东欧的变化早已尘埃落定,变不回去了。如何评价这一事件,至今众说纷纭。坚持原国际共运观点的人,一直把这看成社会主义事业的挫折和历史的倒退。持社会进化观点的人们却认定这是历史发展的进步,因为它结束了阻碍社会前进的经济模式、专制体制和思想禁锢。看来,这些国家的人民(他们中许多人在一定问题上,特别是对当年苏联,留恋过去也很自然)是基本上同意后一种看法的,否则他们也很容易再和平演变回去,只要选举那些共产党人执政就行了。这也不是空口宣传哪个制度优越性大的问题,而是完全可以由实践逐步证明的问题。这些国家变化的时间并不长,但绝大多数已开始显示出比变化前要优越。不但建立了民主制度,经济发展快了许多,而且原有的社会保障制度大多得到保留,不少国家还有所充实和增加。

就拿变化中走了较大弯路的俄罗斯来说,现在情况也已好转。2006年世界银行先后公布了两份有关俄中经济情况的报告。4月17日的报告指出,俄罗斯经济增长是“符合穷人利益的增长”。俄国经济从1999年开始起飞,年均增长6%,到2006年经济总量增加了70%,但人均实际收入却大大超过这个增量。联邦主体和各地方政府,以财政支出的三分之一用于教育、医疗、救济等,建立和维持了一套更加完善的社会福利体系。报告预测,2012年俄可成为发达国家,202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可接近三万美元。去年10月普京访问德国回答采访记者时也说,“我们正在建设一个与我们建设了几十年的社会完全不同的新社会。我们将尽力做到遵循现代文明世界原则和民主原则,保障我国公民的权利和自由。”还说,“俄罗斯不打算重返苏联时期的政治体制。我们只是在探索一种适当的体制,既能保证我国

公民享有自由,又能保障他们享有管理国家和解决各种问题的权利,同时还能使国家成为造福人民的工具。”应该承认,俄国多数人民和普京的想法是一致的。上世纪五十年代,我曾有幸在苏联工作四年,九十年代又曾三次访俄。所闻所见也使我认同普京的谈话。一些俄国学者早就乐观地说,他们现在才是在真正建立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叶利钦当政时冒出来的那几个寡头是翻不了天的。把苏联东欧巨变说成是资本主义的复辟,是否妥当,起码还得看下去。

发展中国家宣布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更多,也都实行了一些社会主义措施,如不同程度的国有化、建立一定的社会福利制度等。但总的说来,它们和那些没有宣布实行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国家并无本质区别,虽然孕育着一些社会主义因素,但基本上都还是在发展资本主义,客观上为社会主义打基础。因为无论如何,对它们来说,集中发展生产力和建立民主政治还是历史必经阶段,是不能绕过去的,否则不但会走弯路,还得回过头来补课。这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也是马克思后百余年来世界经验的总结。所以不少国家都在为适应这一社会发展规律而进行必要的调整,例如印度的改革及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的调整。这种改革调整,实质上都是两种制度的趋同。不过发展中国家数量多,差别大,发展道路和水平也很不一样。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抓经济建设和民主政治,必然发展迅速,社会稳定,国富民丰;那些只高喊建设社会主义,实际上却一年到头瞎折腾,既不抓发展生产、又反对民主政治的国家,结果一定相反,变成极其孤立的国际乞儿。但这只能是极少数,不会影响人类社会发展的全局。

看来,二十一世纪将是两种制度不断趋同,逐步向人道、民主社会主义过渡的世纪。长期威胁着人类的世界大战,也会在这个过程中得到大体解决,矛盾和局部冲突也许难免,因为同属共产党领导的国家过去还兵戎相见呢)。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发展趋势。人类历史的进步是越来越快而不是越来越慢。我们祖先梦寐以求的大同世界,可能在本世纪就会在若干方面奠定基础。(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院士)

(责任编辑 吴思)



# 坚持基本路线必须澄清错误思潮

——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与杨承训的对话



刘国光

杨承训(以下简称杨):您在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些关键时期,科学阐发党的正确路线,澄清一些模糊认识,反对错误思潮。现在又到了—个非常关键的时期,又有各种思潮泛滥,我想有几个问题向您请教。

刘国光(以下简称刘):您不用客气,都是为了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行研究,在前进中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是不可避免的。对此,我们可以共同探讨。

## 全面准确地理解和贯彻基本路线

杨:首先是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问题。小平多次说过“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要管100年,动摇不得。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重申“坚持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

验”,这是完全正确的。可是,不少人对基本路线淡化了,尤其是喜欢片面地只讲一点,使它变了味。现在泛滥的许多错误思潮就是采用了这种手法。我觉得,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是一个根本问题。

刘:是的,党的基本路线是一个纲,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都是基本路线在新时期的理论升华和展开,是基本路线基础上的创新。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全面准确地理解和贯彻基本路线。

“全面”就要把“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来理解,不能割裂。坚持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发展的核心问题,或称为共产党执政的第一要务,而要发展就得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这又是两个基本点的含义。从经济学上说,就是现代化生产力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的有机统一。发展生产力是决定因素,邓小平强调的是“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实质上是社会主义的发展观,生产力发展离不开生产关系这个大系统。改革是为发展提供动力,属于生产关系及上层建筑领域的事,其目的也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发展”。这又涉及改革的方向问题,要求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要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框架内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所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一个有机整体。

“准确”就是正确把握基本路线的科学内涵,不能加以曲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能理解只要能赚钱就是发展,或者仅仅追求GDP的增长就是发展,而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

学发展。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本来就有明确的含义,属于经济和政治的方向问题,关键是全面坚持,一个也不能少。改革是社会主义自我完善,不能离开这个大方向;开放是保持主权和增强自力更生能力的开放,不是让外国资本主义控制我们。

杨:现在看来,全面准确地理解和坚持基本路线既是实践问题也是理论问题,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路线,与基本纲领(特别是基本经济制度)、基本经验(十六大总结的十条经验)是相吻合的。现在,应当用“坚持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的信念来扫清各种错误思潮,把握正确方向。

## 改革的正确方向是什么

杨:近几年您反复讲坚持改革的正确方向。的确,这个问题很重要,世界上有多种多样的改革,戈尔巴乔夫、叶利钦满口讲的都是“改革”,国内理论界也有许多人打着改革的旗号贩卖自己的私货,请您着重谈一谈这个问题。

刘:改革进行30年,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主要原因是党坚持正确的改革方向。当前的改革进入深水区,遇到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这些矛盾和问题,有些是在探索中缺乏经验造成的,有些是对改革的曲解、干扰造成的。对于前者,经验不足,需要总结经验教训,端正前进道路;对于后者,要睁开火眼金睛,加以识别,认真排除。这样才能保证改革大业成功。当然,这个问题不是一次讲讲就行了,需要反复讲,因为有人只提坚持自己的改革方向,却不提坚持改革的正确方向,并把别人推到“反对改革”的方面去。好像改革既然是时代大势所趋,可以不管什么方向不方向,只要是“改革”就好。这种笼统讲的用意既有浅薄的一面,也有不善的一面。不善的是把改革中反对搞歪理邪道的人说成“反对改革”,以达到鱼目混珠、以邪压正的企图。

我们知道,改革方向的问题有讲究。戈尔巴乔夫、叶利钦都说坚持改革,他们坚持的方向是什么?大家都很清楚。戈尔巴乔夫提出了“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叶利钦提出了自由民主主义。改革的结果是把苏联的社会主义颠覆了、端锅了,把一个好端端的社会主义国家搞成四分五

裂的资本主义国家(当然,我不是说前苏联的体制没有问题,怎么正确地改革是另一个问题)。在中国,有些人希望我们走苏东转型的道路,除了这些人,没有人赞成我们重蹈苏联“改革”导致亡党亡国的覆辙。所以,我们一定强调要坚持正确的改革方向,而不能笼统地讲“坚持改革方向”。

中国改革的正确方向是什么?这不是可以任意杜撰的,也不是突然提出来的,必须有所根据。没有根据,信口开河,怎么能让人跟你走。我们应当根据《宪法》、《党章》以及党中央的有关文件精神来确定改革的正确方向。这样,可以把改革的正确方向归结为以下几点:

(1) 改革必须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2)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是区别于资本主义的本质,很重要,不能不讲。

(3) 根据《宪法》规定: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成分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4) 在经济运行机制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也就是国家宏观调控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计划和市场都得要。”江泽民同志也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不是取消计划性,社会主义计划和市场两个手段都要用。

(5) 政府的职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职能转向社会职能,提供公共服务为重点,这是重要问题。但不能像有些人讲的完全退出经济建设职能,仅仅提供公共产品。这是与公有经济为主体相呼应的。

以上五条可能不完全,但大体上可以回答什么是正确的改革方向。正是我们党和政府坚持这条道路,由此改革才能不偏离正确方向。这是改革的主线。正是坚持了这条主线,改革才取得了伟大成就。

杨:照您的分析,正确的改革方向很清楚。但

有人说,什么是社会主义,连邓小平也说,我们不清楚。那怎么会清楚的正确改革方向?

刘:邓小平是说过这句话,这是在改革的初期说的。但是,经过十一届六中全会对历史问题的决议,经过十二大到十四大,经过邓小平南方讲话和一系列有关社会主义的论述,应该说,我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什么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大体有了一个清楚的认识。这是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中外历史经验总结出来的结论,体现在初级阶段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上,体现在我们在前面所讲的几条正确改革方向上。不能说到现在我们还不知道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对我们还是一团雾。那我们靠什么来进行这场伟大的改革,这些年不是瞎摸了吗?不是的。我们已经弄清楚了社会主义的大方向,总的轮廓也有了,有待充实的是细节。

应该说,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形成的新东西,不能像有些人污蔑的那样,说我们现在还在搞“斯大林模式”、“毛泽东模式”、“传统社会主义模式”。新的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模式或“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模式”,也吸收了“传统社会主义”中好的东西,排除了它的不好的东西。不能把“传统社会主义”一笔勾销,不能把毛泽东时代一笔勾销。毛泽东时代有不少缺点错误,但这个时代为中国铸造出丰功伟绩,是谁也否定不了的。

## 必须排除错误思潮对改革的干扰

杨:现在也有学者口口声声讲改革,但就是不讲坚持改革的正确方向。江泽民同志曾经讲过,存在着两种改革观,一种是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的改革,一种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改革”。这也就是前面所说的改革开放与四项基本原则的关系。邓小平在1989年5月就讲过:“某些人所谓的改革,应该换个名字,可以叫作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他们‘改革’的中心是资本主义化。我们讲的改革与他们不同,这个问题还要继续争论的。”事实上,这个争论还在继续下去。

刘:是这样的。与我们党坚持的改革主线同时存在的还有另一条改革主线,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改革”。邓小平在1986年9月28日就说

过:“反对自由化,不仅这次要讲,还要讲十年二十年。”1987年3月8日讲:“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整个过程中,至少在本世纪剩下的十几年,再加上下个世纪的头五十年,都存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1989年5月31日,邓小平讲:“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不能动摇。”可见,邓小平预见到二十一世纪头五十年资产阶级自由化在中国的顽强性,不可轻视。邓小平的预见不是无的放矢。在经济学领域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表现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影响上升,马克思主义地位被边缘化。我在2005年“7·15”同教育部同志的谈话中就讲了这点。

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对市场经济一般问题的研究方法及观点,有不少我们可以借鉴学习,不能盲目排斥。但要注意它的意识形态理论的核心观点。90年代以后,由于种种原因,主要是小平所说的政治思想“一手软”,自由化的核心理论观点,如“经济人”假设、追逐私利的人性论、私有制永恒论、市场教旨主义、政府职能最小化“守夜人”等,在我国经济界、理论界广泛传播,对我国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施加相当大的影响。这是不争的事实。这种影响造成改革的某些局部扭曲,引起部分民众一些怨言和非议,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中国改革的正确思想和新自由主义思想的碰撞是所谓“改革第三次大争论”的起端。自由化的“改革”理论打着拥护“改革”的旗帜,想把中国引到搞资本主义,也就是私有化、市场化。他们的意图是以私有化、市场化抹掉社会主义方向,把中国纳入由公有经济为主体转化为私有经济为主体的“转轨国家”行列。

一些同志不知“转轨国家”一词的内涵。有些人把中国改革和苏东剧变等量齐观,如最近有人说“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中国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都属于“民主社会主义”的胜利。不知中国的改革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是坚持社会主义的;而苏东转轨是转到资本主义那里去了。他们把中国、苏联、波兰、匈牙利等都叫做“转轨国家”。目前,已经有人给“转轨国家”下了“准确定义”。“国有制为主导转为市场为主导、私人经济为主导的历史性转变的国家。”这是波兰学者科勒德科2006年10月6日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



研究中心讲话里讲的，该研究中心 2006 年第 59 期《简报》刊发主要内容。因此，我们不能稀里糊涂地人云亦云，把中国也说成“转轨国家”，即把以公有制为主体转到以私有制为主体的国家。

我历来对“转轨国家”的提法有保留意见。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对“转轨”讲得最积极，他们办有《转轨》杂志。几年前他们在北京开会时，我就讲过“转轨国家”的提法不妥当。假如把“转轨”限制在国家行政计划指令为主转向市场调节为主，还说得过去。但中国的“转轨”还要保持相当的政府调控，保证计划性。江泽民在十四大前中央党校讲话中，在解释选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法而省去“有计划”三个字时说，“社会主义经济从一开始就是有计划”的，这在人们的脑子里和认识上一直是清楚的，不会因为提法中不出现“有计划”三个字就发生了是不是取消计划性的问题。“邓小平也说过，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都要用。现在一讲计划，就有人扣你帽子，就说你想回到计划经济体制去，说你反对改革。我们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在国家宏观调控下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不能变成“市场原教旨主义”，不能一切都市场化，把中国改革笼统地叫做市场化改革。

## 警惕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改革思潮

杨：您提出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反对不讲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以后，现在各种假借“社会主义”之名的改革纷纷出场，鱼目混珠，您注意到这个现象没有？

刘：是的。我也发现所谓“第三次大争论”的内容，在争论的过程中发生了一些戏剧性的变化。有些资产阶级自由化顽固分子基于私有经济大发展的事实，欢呼所有制改革已经成功，经济



中共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

改革已经基本告一段落，呼吁进入民主化的宪政改革，西山会议便是一例。另一些人辩解说他们不是不要社会主义的改革，但是他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不同，认为社会主义的模式不同。这就应了我在过去文章中讲的，有些人只讲市场化改革，不讲社会主义；有些人假惺惺地讲一下“社会主义”；有些人任意歪曲社会主义。现在，不讲社会主义的少了，任意解释社会主义的东西多起来了。比如“人民社会主义”、“宪政社会主义”、“幸福社会主义”等等。由于社会主义在人们心目中有崇高地位，逼得反对它的人也不得不披上“社会主义”的外衣。

一个官方机构的刊物几次引用瑞典前首相帕尔梅的话说，现在社会主义的定义有 160 多种。想让我们在这方面达成共识，太难了。最近还是这个刊物，又推崇英国学者费里浦斯算过有 260 多种社会主义，瑞典艾尔法说有 1500 多种社会主义。他们以此引导我们来混战一场。其实，马克思恩格斯早就在《共产党宣言》中讲过有不同的社会主义：封建的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等，并对这些“社会主义”一一加以批判，做了科学的分析。只有科学社会主义才能代表工人阶级，指导劳动人民获得解放。不是随便哪一种社会主义都可以选择。今天的中国已经做出了选择，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邓小平和我们党所采取的正确的改革方向，

是我们党几十年经验教训的总结,是我们的正确选择。这就是我们的标准。怎么还要另外的选择?有些人不顾《宪法》、《党章》的规定,不顾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四项基本原则,他们这样做,实在是太离谱了。

现在有人喜欢提出各种不同的社会主义模式供人选择,花样繁多的模式,总的思想脉络离不开新自由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那一套,骨子里都是在同正确的改革方向对着干,同四项基本原则对着干。下面我们稍稍解剖一些例子。

“社会主义新模式”。据发明者说,这个新模式是由四个要素整合起来的,即(1)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的混合经济;(2)市场经济;(3)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4)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四个要素能构成社会主义吗?

(1)“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的混合经济”,这里没有讲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最重要的公有制为主体,只有混合经济,抽掉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2)“市场经济”,这里没有讲国家宏观调控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样的市场经济就没有前提了,也不知道是什么性质了。(3)“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相结合”,这里没有讲按劳分配为主体,只讲结合。我同意你的观点,是所有制关系决定分配关系。按劳分配为主体是与公有制为主体配对的。如果不讲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当然也不会有按劳分配为主体,那就只好按资分配和按劳动力的市场价格分配,引向两极分化。(4)“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只能建立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基础之上。作者说民主政治的核心是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当然是坚持社会主义最重要因素之一,但共产党领导的如果不是以公有制为主体而是以私有制为主体的经济,不是按劳分配为主体而是按要素分配的经济,恐怕这个共产党本身就要变质变色。大多数劳动人民不希望这一点,我相信中国共产党也决不会走上这条路。总之,四要素构成的“社会主义新模式”是资本主义自由化的模式而不是科学社会主义模式。

“人民社会主义模式”。人民社会主义模式之所以引人注意,是因为它是国家体制改革的重要研究机构领导人提出来的。他的“人民社会主义”具有五个特征:(1)以民为主;(2)市场经济;(3)

共同富裕;(4)民主政治;(5)中华文化。以上五个特征有些用词是抄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上掩盖不住反社会主义的实质。社会主义的实质和特征是什么?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早已有规定,中国改革的创始人和总设计师早已有阐述。我们都很熟知。建立公有制,消灭剥削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特征。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了大力发展生产力,不得不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实行国家宏观调控下有计划性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要实行人民民主专政。但是在所谓“人民社会主义”五个特征那里,公有制为主体没有了,宏观调控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没有了,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没有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也没有了,用中华文化来代替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发明者一忽儿把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有经济与俾斯麦的烟草公司、铁路国有化、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混为一谈,说什么国有经济的比重不是社会主义的标志;一忽儿又不得不提一下公有制为主体和基本经济制度,言不由衷,逻辑混乱,前后不一贯。这也是“打左灯向右拐”的必然现象吧。

总之,“人民社会主义”模式五个特征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都没有了,还叫什么社会主义。一堆不着边际的词藻,任何资产阶级政党都能接受。

## 从“新自由主义”到“社会民主主义”

杨:最近谢韬在《炎黄春秋》《一家言》专栏发表一篇文章说,“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并且歪曲和篡改了恩格斯的原意,竟然说恩格斯也放弃了科学社会主义。这种思潮特别值得注意。

刘:在挑起“社会主义模式”混战前,那些赤裸裸不讲社会主义只要“市场化改革”的思潮,不需多少学问就可以嗅出它的“新自由主义”的味道。“新自由主义”成为过街老鼠以后,某些人一窝蜂地投向“社会主义”,讨论起“社会主义模式”来,明白人就嗅出其“民主社会主义”的味道。你

从某些刊物连篇累牍地介绍和吹捧“民主社会主义”，介绍和吹捧瑞典经验，就可以看出来他们要在中国改革中打出这个旗号了。果然不错，谢韬先生承担了这一“光荣使命”，勇敢地在《炎黄春秋》推出了《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打了一个漂亮的擦边球”（港报），想要改变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在我们党和国家性质和发展道路上改弦更张。

他从外国端来的一套构成民主社会主义模式的东西，除了“福利保障制度”这一点，因为别的模式没有突出提出来，我们后面将有所论述外，其余“民主宪政”、“混合所有制”、“社会经济”，与他国内同行推出的先行模式大体一样，没有什么新鲜的东西，我们也不再论述。只是在歪曲解释恩格斯 1893 年同法国《费加罗报》记者谈话，说《资本论》第三卷推翻了《资本论》第一卷，以此论证伯恩斯坦修正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正宗”上面，与他国内先行同行相比，有独到之处。但是这些“论据”，最近已被马克思主义专家们的一系列考证所击碎，我也用不着重复了。他把“民主”二字放在“社会主义”的前面，作为“民主社会主义模式”，向我们党推荐的时候，难道不知道西方社会民主党人反复把他们自己思想体系的名称，在“社会民主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之间改来改去？苏东剧变以后，又把 50 年代起改称“民主社会主义”颠倒回来，改成“社会民主主义”，以回避在苏东剧变中已被资产阶级妖魔化了的“社会主义”对自己的牵连。他们不再把“社会主义”视为奋斗追求的目标制度，放弃要求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而满足于现存资本主义制度的点滴改良。在社会党人自己已经不用“民主社会主义”概念而改用“社会民主主义”概念的情况下，谢韬还把“民主社会主义模式”推荐给中国共产党，要求实行，岂不令人笑掉大牙。

不可否认，社会民主主义在瑞典等少数国家的社会福利保障方面，确实创造了不少好东西，这也是他们借鉴社会主义国家福利制度好经验的结果。这些国家创造的一些实际做法，回过头来也值得我们借鉴学习。但是社会民主主义的历史功绩，在于它帮助资产阶级缓和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并没有取消矛盾），在于很好地保证了垄断资本的所有制和金融寡头的统治，即资本对

劳动的专政。正如它的代表人物曾经承认的，社会民主主义不过是“资本主义病床旁边的医生和护士”。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项研究（徐崇温）表明，在瑞典，95%的生产资料掌握在 100 个大家族手中，17 个资本集团支配着国民经济命脉，仅占人口总数的 0.2%的人口控制着全部股票的 2/3，仅占人口总数 5%的富翁约占有全部财富的 1/2 以上。以致在社会民主党政府提出“雇员投资基金方案”时，仍遭到大大小小雇主的激烈反对，使得试图对生产资料私有制有所触动的“基金社会主义”流于失败。

## 说“执政者打左灯、向右拐”是非常错误的

杨：谢韬宣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行改革开放的一系列政策”都属于民主社会主义”。又说江泽民和胡锦涛迈出了新的步伐，“标志着中国走上了民主社会主义的道路”。

刘：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说成是“民主社会主义”，不值一驳。就连他自己举的例子，“废止单一的公有制，实行多种所有制的共同发展”来说，这项政策还有关键性的“公有制为主体”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限制，怎么能说这项政策是民主社会主义的政策？倒是谢先生讲“为了避免修正主义之嫌，我们称之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一句话连同他讲的现在我国“只能采取‘打左灯、向右拐’的策略”，就把他的真实意思凸显出来了。就是说，现在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打左灯”，是虚的；实际执行的是“民主社会主义”，是“向右拐”，是实的。

这是非常错误的说法。我以前认为，中国的右派喜欢讲“打左灯、向右拐”，大概是出于他们有些人做贼心虚的阴暗心理，就像西山会议有人讲的，“现在不好明说，说不得”；“亮不出来”；“只能遮遮掩掩，躲躲闪闪，畏畏缩缩”地说出来，这样的心理在作怪，只好“打左灯、向右拐”。为什么呢？因为在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经过长期浴血奋战而建立起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共产党关于党的无产阶级性质的规定，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关于国体和基本经济制



度的规定,有邓小平关于四项基本原则的多次言之凿凿的申明,有中国人民捍卫宪法保卫社会主义的决心和警惕的眼光,这是想要中国改变政权性质的资本主义势力不可逾越的障碍。

谢先生的挑战,逼着我们党回答他提出的问题。是不是像他所说的改革开放一系列政策都属于“民主社会主义”?有些同志建议权威方面应当回答。我倒觉得,以我党权威之尊严,犯不着理会这样一个变更了信仰的共产党员提出来的不像样子的主张。但是可以放手让马克思主义者在主流媒体上对这种企图改变党、国性质的错误思潮,进行彻底的批判,以防它搅乱人们的思想,误导改革的方向。这是至少应该做的。

## 意识形态领域不但要容许“多样化”更要强调“主旋律”

杨:这样看来,当前意识形态领域很不平静。这与建立和谐社会并不矛盾。我们要通过解决不和谐达到和谐。对于错误的改革思潮,你认为应该怎样正确对待?

刘:现在意识形态领域不是有“多样化、主旋律”之说吗?社会利益多元化后,非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思潮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要有一个度,一个边。不能让这些错误思潮把人们的思想搞的乱七八糟、六神无主,不能让这些错误思潮把改革与发展的方向引入歧途,像戈尔巴乔夫的“多元化”、“公开化”所导致的灾难后果那样。所以,在实行多样化的方针时,一定要强调“主旋律”,强调切实的而不是官样文章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强调宣传科学的社会主义,强调宣传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给宣传正确思想,批判错误思想以更多的说话机会,或者话语权。批判与反批判从来就是追求科学真理的必由之路,各种思潮的和平共处并不有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如同某些同志所幻想的那样。当然,要防止利用争鸣来制造社会不和谐的杂音。

但是现在舆论界的情况不完全是这样。许多很好的马克思主义文章,批判反马克思主义和反社会主义的文章,不能在主流媒体上发表。而新自由主义的东西,民主社会主义的东西,倒是畅

通无阻。近两年我写的一些力求坚持与中央保持一致(我这样看,有关领导部门也这样看)的文章,某些媒体,包括我们自己党政机关办的媒体,不愿发也不敢发我的文章,生怕沾上了“反对改革”的边。我感谢另外一些媒体和网络的信任,使我有说话的地方。这是我这几十年从来没有过的经历。这个现象十分奇怪。不是我一个人有此感受,好多正直的作者都有这种感觉。所以,我再利用这个机会,呼吁要加强主旋律的一面,让马克思主义、科学的社会主义,真正占领舆论阵地,真正成为意识形态领域的主流指导思想。

杨:最后,还有一个问题,“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的猖狂发作,是不是同干部队伍学习马列主义不够有关?

刘:是有关系。谢韬先生从反面教训我们,必须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等等,特别是要读重要的经典著作,才不至于上理论骗子的当。多年来我们注意抓干部的各种专业学习,但却很少组织党和国家各级干部认真学习马列,特别是多年不组织干部学习重要的马列原著。而我们记得,毛泽东时期对此抓得很紧。学原著,有助于了解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东西是什么,不是什么,有助于我们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不给理论骗子有空可钻。这对于领导干部来说,尤其重要。

杨:刘先生今天讲得很深刻。我想起邓小平晚年的告诫:“坚持社会主义,防止和平演变。”要出问题首先出在内部。直到1993年9月,他还特别强调不能改变基本路线,“就是要坚持,不能改变这条路线,特别是不能使之不知不觉地动摇,变为事实”。作为代表人民利益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基本路线,排除一切错误思潮的干扰,坚持和阐发党的创新理论。

(对话人简介:刘国光:中国社会科学院特邀顾问、学部委员;杨承训:河南省经济学会会长、河南财经学院资深教授)

## 本刊更正

《炎黄春秋》今年第六期《为曹荻秋平反的争议》50页右栏倒数第二段中的“上海市委常委、组织部长赵振东……”;“赵振东”应为“赵振清”。

# 邓小平的政治体制改革蓝图及其实践

吴敏

### 解决权力过分集中问题以改善党的领导是邓小平抓住的主要矛盾

早在 20 多年前，被誉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就设计了一幅科学的政治体制改革蓝图。这个蓝图蕴涵在邓小平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之中，是邓小平理论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邓小平文选》第 2、3 卷中，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著作主要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政治上发展民主，经济上实行改革》、《关于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等光辉文献。特别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曾被党中央称作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总纲领”和“指导性文件”。

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蓝图的基本框架，主要体现在以下九个方面：

其一，改革一提出的时候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启动政治体制改革的时机和条件已经成熟。而且，经济体制改革必须同政治体制改革相互依赖、相互配合、相辅相成，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不能实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

其二，政治体制改革是全面改革向前推进的一个标志，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政治体制主要是党和国家的组织制度、领导制度，制度问题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

其三，政治体制改革总的目标有三条，一是巩固社会主义制度，二是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三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

## 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

（一九八〇年八月十八日）

邓小平



性，让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参与管理，实现管理民主化。

其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是一个必须长期坚持的方针，绝不允许有任何动摇。要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其五，权力过分集中是传统政治体制的基本特征和“总病根”，是“文化大革命”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国家和人民因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现在再也不能不解决了。所谓权力过分集中，就是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书记，什么事情都由书记拍板，党的集体领导制和民主集中制形同虚设。不少地方和单位，都有家长式的人物，他们的权力不受限制，别人都要惟命是从，甚至形成对他们的人身依附关系。

其六，党政不分、以党代政是传统政治体制的主要弊端，政治体制改革要把党政分开放在第一位，处理好党和政府的关系，这是一个关键。我们坚持党的领导，问题是党要善于领导，不能干预太多，干预太多倒会削弱党的领导。政治体制改革要致力于改善党的领导，党只能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

其七，搞现代化一定要有两手，一手抓建设，

一手抓法制，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法制体系。要依靠加强法制、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确保党风和社会风气实现根本好转。党风和社会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形成贪污、盗窃和贿赂横行的世界。

其八，肃清思想政治方面封建主义的残余影响，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这个任务重点在于改革和完善党和国家的制度，在制度上做一系列切实的改革，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否则国家和人民还要遭受损失。

其九，政治体制改革很复杂，每一个措施都涉及千千万万人的利益。所以，要坚持既坚决、又审慎的方针，要分步骤、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决策一定要慎重，看到成功的可能性较大以后再下决心，但改革总要有个期限，不能太迟，步子要加快。可以设想，在党的十三大之后，大约用十年左右的时间基本完成政治体制改革的近期任务。

可以看出，邓小平设计的这个政治体制改革蓝图，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为指引，以新中国成立以后三十年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为借鉴，立足于中国现阶段的客观实际，注重革除传统政治体制的主要弊端，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紧迫性、重要地位、总体目标、基本方针、关键任务、思想保障、战略步骤等各方面都作了较系统较深刻的阐述。在邓小平看来，政治体制改革要以民主政治体制根本取代权力过分集中的传统政治体制，这是一场矛头直指传统政治体制“总病根”的攻坚战，要把党政分开放在第一位，通过着重解决权力过分集中问题以改善党的领导。只有抓住了这个主要矛盾，政治体制改革的其他问题才能比较顺利地得到解决。

## 反对“以党治国”和“党权高于一切”是邓小平长期坚持的重要思想

在邓小平设计的政治体制改革蓝图里，之所以要将党政分开放在第一位，要紧紧抓住解决权力过分集中问题以改善党的领导这个主要矛盾，

这同他长期坚持的反对“以党治国”和“党权高于一切”的思想密切相关。

早在1941年，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北方局主办的《党的生活》上发表了《党与抗日民主政权》一文，着重阐述共产党领导抗日民主政权的基本要求和基本方式，以清除国民党“以党治国”、“党权高于一切”观念在共产党内的影响。邓小平很重视这篇文章，将其收为1994年出版的《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中排序第二的重要著作。在这篇著作中，邓小平着重提出和阐述的观点主要是：

第一，共产党要发展政权中的民主斗争。既然有各革命阶级的代表参加到政权中来，“必然在政权中反映出不同的利益、不同的政治立场、不同党派阶级的民主政治的斗争。”“我们共产党是不怕民主政治斗争的，因为我党的主张是正确的，只有那种不相信党的主张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只有那种投机分子、官僚腐化分子、贪污分子，才惧怕民主政治斗争，惧怕把党的面貌放在群众面前。”

第二，共产党的领导植根于群众的拥护。共产党在政权中的领导优势从何而来？基本的是从民主政治斗争去取得，即是说，主要从依靠于我党主张的正确，能为广大群众所接受、所拥护、所信赖的政治声望中去取得。“民主政治斗争可以使党的主张更加接近群众，可以使群众从自己的政治经验中更加信仰我党。所以，只有民主政治斗争，才能使我党取得真正的优势。”

第三，“以党治国”是国民党的恶劣传统。“假如说中国是一个半封建的缺乏民主的国家，则反映到党内的是，共产党员一般缺乏民主的习惯，缺乏民主政治斗争的常识与锻炼。”某些同志的“以党治国”的观念，就是国民党恶劣传统反映到我们党内的具体表现。”“以党治国”的国民党遗毒，是麻痹党、腐化党、破坏党、使党脱离群众的最有效的办法。”

第四，把党的优势建筑在权力上是靠不住的。一些人“误解了党的优势，以为党员包办就是绝对优势，不了解真正的优势要表现在群众拥护上。把优势建筑在权力上是靠不住的。”过去我们有些高唱优势的同志，认为共产党员占多数了，天下是我们的了，因而可以为所欲为了，于是许多过左的错误由此而生，中间分子对我不满，进步分子非常不安，群众对党的舆论也不好。除了阿Q主义者，



谁能说党已经有了优势！”

第五，党权高于一切是最大的蠢笨。一些人“误解了党的优势，把党的领导解释为‘党权高于一切’，遇事干涉政府工作，随便改变上级政府法令。”“结果群众认为政府是不中用的，一切要决定于共产党。于是要钱的是共产党，要粮的是共产党，政府一切法令都是共产党的法令，政府一切错误都是共产党的错误，政府没有威信，党也脱离了群众。这实在是最大的蠢笨。”

第六，民主政治的好处就是能使党受到群众的监督。“关起门来决定复杂的政策问题，必然发生错误”，“必然脱离群众”。“民主政治的好处，正在于它能够及时反映各阶级各方面的意见，使我们能够正确地细心地去考虑问题决定问题；它能够使我们从群众的表现中去测验我党的政策是否正确，是否为群众所了解所拥护”；“它能够使我们党得到群众的监督，克服党员堕落腐化的危险，及时发现投机分子以及破坏分子而清洗出党。”

第七，党对政权的责任是指导和监督。“党对政权要实现指导的责任”，“要实现监督的责任”。“党的领导责任是放在政治原则上，而不是包办，不是遇事干涉，不是党权高于一切。这是与‘以党治国’完全相反的政策。”

第八，党组织没有超越政权的权力。党组织在同级政权机关的派出机构“没有超越政权的权力，没有单独下令下指示的权力，它的一切决议，只有经过政府通过才生效力。”“不可经常地以党的名义提出意见”，“只有大的事件大的问题，才用党的名义提出主张。”“各种重要问题都要经过政府正式会议讨论。”

第九，要加强对党员和群众的民主教育。“随着民主政治的开展，民主教育比任何时候还要迫切”。“在我们各项工作中，哪一件事里面都有民主问题。我党要善于在一切工作中，一切运动中，大大发扬大众的民主主义作风，与一切不民主的现象作斗争。”“我们要在民主政治斗争中，保证党对政权的领导，我们更要在民主政治斗争中，使党成为群众的党！”

邓小平在抗日战争时期发表的这篇重要著作，明确地回答了共产党依靠什么获得领导地位，共产党怎样对自己建立的政权实行领导，为什么要清除“以党治国”观念在党内的影响等一系列基

础性、关键性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关于党的建设 and 党的领导的历史文献中居于重要地位，是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设计政治体制改革蓝图的一个重要思想渊源。我们现在更应该看得很清楚，因为长期坚持‘以党治国’和‘党权高于一切’的错误做法，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均已分别丢掉了政权，中国国民党还相继丢掉了两次，中国共产党怎么还能在这条道路上走下去呢？

## 新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应该勇敢地承担起来的义不容辞的重要责任

1987年召开的党的十三大，对实践邓小平设计的政治体制改革蓝图作了全面部署。在此后一年多时间里，在我党领导下，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践进展迅猛，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在实行党政分开、改善党的领导方面，一是致力于划清党组织和国家政权的职能，转变党对国家事务的领导方式，逐步理顺党组织与国家政权机关以及企事业单位、各种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二是致力于明确中央、地方、基层在实行党政分开实践中应该分别采取的不同方式，先从中央和地方做起，随后再逐步向基层扩展；三是致力于调整党的组织形式和工作机构，撤销各级党委中不在政府任职但又分管政府工作的专职书记、专职常委，撤销党委机关中与政府机构重叠对口的部门，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不再处理法纪和政纪案件，企事业单位党组织逐步改由所在地党委领导。这一系列的改革举措，是对党和国家原有权力结构的重大调整，触及相当一些党的领导机关特别是领导干部的切身利益，难度是非常大的。但是，由于党中央的坚强领导和广大干部群众的坚决支持，这些改革举措的实施在总体上是比较顺利、比较平稳的。

出乎人们意料的是，1989年春夏之交，北京发生了举世震惊的政治风波；紧接着，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又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骤然陷入危机。面对这一连串猝不及防的国内国际重大政治事件，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没有再按照邓小平设计的蓝图和党的十三大的部署继续下去，而是将这个蓝图和部署基本上搁置起来了。从1989年下半年至今18年来的实际情况看，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践进展状况大体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1989年下半年至1992年2月之前。在这个阶段里，注重强调的是“反和平演变”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对政治体制改革不仅不提了，还撤销了党的十三大按照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蓝图所采取的许多重要举措。邓小平在1989年5月曾经旗帜鲜明、态度坚定地强调：“十三大政治报告是经过党的代表大会通过的，一个字都不能动。”但是，从1989年下半年至1992年2月之前两年半的实际情况来看，对十三大的政治报告几乎是整体上被改动了。

第二个阶段，从1992年2月至1997年9月之前。在这个阶段里，由于邓小平视察南方谈话的发表，前两年多“左”的思潮甚嚣尘上，改革开放基本上陷于停顿的状况有了根本性的转变。但是，当时在肯定和强调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尽力开辟经济体制改革新局面的同时，不仅大大弱化和降低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地位，而且避开了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蓝图的主体性诉求，只将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行决策科学化民主化以及法制建设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内容。当然，在这个阶段里，也进行了以政企分开和精简、统一、效能为原则的党政机构改革，建立了国家公务员制度，这也属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大范畴。但是，由于没有触及传统政治体制的“总病根”，仅仅是在技术性层面上整改，所以，这些改革的局限性非常明显，实际效果乏善可陈。从实践效果来看，1993年的党政机构改革，基本上以失败告终，不仅政企分开远未实现，还很快就出现了机构越减越繁、人员越减越多的尴尬局面；1993年施行的国家公务员制度，建立于不科学的、官本位色彩很浓的职位分类基础之上，难以割断同传统干部人事制度的内在联系，《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及其配套规章所规定的多项制度在相当程度上没有得到真正实施。

第三个阶段，从1997年9月直到现在。在这个阶段里，虽然将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并提了，虽然将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当代中国“一定要高举”的“伟大旗帜”了，也提出了“依法治国”、“尊重和保障人权”、“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等一系列正确的思想理念，最近几年来在实践中又实行了一些确有成效的“亲民”政策，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在相当程度上受到了关注和保护，但是，

在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指导和实践部署中，多是一般性、原则性地提出要健全民主制度，加强法制建设，要求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只是对农村基层群众自治采取了一些确有成效的促进措施，而对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蓝图所要着重解决的主要矛盾，即通过实行党政分开、解决权力过分集中问题以改善党的领导的内容，则仍然没有足够的重视。

毛泽东认为：“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和影响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因此，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否则，“就不能找出解决矛盾的正确的方法”。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的显著特点，就是紧紧抓住了通过实行党政分开、解决权力过分集中问题以改善党的领导这个主要矛盾。自1989年下半年以来，我们对邓小平的政治体制改革思想学习不够，重视不够，没有政治体制改革中着力去抓主要矛盾，往往是在一些次要矛盾上绕来绕去地“打转转”，这必然导致在政治体制改革实践中“只抓芝麻，不抓西瓜”，很难从传统政治体制里挣脱出来。比如，1998年以后的几年里，在农村村民委员会选举中普遍实行“竞选”的势头很好，但最近几年，农村基层民主发展的势头明显地减缓了，甚至还出现了严重地倒退趋向。再比如，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这意味着，我们国家的一切权力均由人民选举产生并对人民负责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行使，人民代表大会在各种国家政权机关中具有最高的权威和地位。我们要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无疑要坚持这个目标和方向，使人民代表大会真正成为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将人民代表大会应该行使而实际上没有行使的权力收归人民代表大会，确保人民代表大会对其他国家政权机关的组织、领导和监督。但是，自1992年以后的15年来，尽管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地把“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而由选民选举、监督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制度和机制并没有多少改进，人

民代表大会对于其他国家政权机关的组织、领导和监督职能并没有真正行使起来，人民代表大会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种仪式性、程序性的组织形式，远未成为名副其实的国家权力机关。而且，现在一些地方又有了明确的规定，不允许人大常委会对“一府两院”职能部门的领导干部进行评议了，不允许人大常委会对“一府两院”进行个案监督了。这是一种倒退行为，何以谈得上是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完善”呢？这两个实例充分表明，在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蓝图基本上不被重视的情况下，政治体制改革实践不仅不可能有根本性、实质性的进展，已经推行了的改革还很容易重新退回到原来的老路上去。

18年来，我们为什么没有很好地看重邓小平设计的政治体制改革蓝图呢？一方面，20世纪80、90年代交替之际国内外发生的一系列重大政治事件，客观上要求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践推进需要审慎；另一方面，按照邓小平设计的蓝图启动根本性、实质性的政治体制改革，难免要面临很复杂的局面，要付出一定的政治代价，而我们对此还缺乏足够的思想准备，这大约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但是，长期不重视邓小平的政治体制改革蓝图，一直不对传统政治体制权力过分集中的“总病根”发起进攻，致使其危害愈演愈烈，已经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后果。十几年来，腐败现象蔓延的趋势愈益显著，因分配不公而形成的贫富悬殊愈益扩大，医疗、住房、教育这新的“三座大山”愈益沉重地压在了广大老百姓的头上。之所以如此，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不重视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蓝图而导致的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以及由此造成的权力制约机制的缺失，民主化、科学化决策机制的缺失。这种状况，实在是不应该继续存在下去了。而且，把根本性、实质性的政治体制改革越是往后拖延，将要面临的局面势必更复杂，将要付出的代价势必更沉重，甚至有可能发生难以预料、难以克服的社会动荡和政治危机。此种令人堪忧的结果，任何稍有良知的炎黄子孙都是极不愿意看到的。只有浴火的凤凰才能获得新生，在根本性、实质性政治体制改革的熊熊烈火面前，有着悠久革命传统的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必然要赴汤蹈火，勇往直前，是决不应该有任何犹豫、彷徨和怯懦的。

有的同志说，自1989年下半年之后，邓小平没有再像以前那样强调政治体制改革，这表明他已经放弃了原来设计的政治体制改革蓝图。这个说法不能成立。众所周知，邓小平在1989年退休以后态度很明确，他决心不再过问中央的工作了，要让新的中央领导集体独立地承担起工作责任来。他明确表示：“对中国的责任，我已经交卷了，就看你们的了。”再则，在国内外相继发生重大政治事件的特殊情况下，对原来部署的政治体制改革实践进程作些调整，暂时不再对传统政治体制的“总病根”发动攻击，在一段时间里把政治体制改革的步子放缓一些，这是合理、必要和明智的。政治体制改革是在党和国家的中枢神经系统动大手术，具有很大的风险性，不能不采取非常谨慎的态度。但是，策略性的调整决不等于战略性的动摇。在1989年下半年之后，邓小平并没有放弃他原来设计的政治体制改革蓝图。1989年9月，邓小平明确指出：“中国在十年改革开放中制定的各项方针政策不会改变。十三大制定的路线不能改变，谁改变谁垮台。”在1992年初视察南方的谈话中，邓小平进一步告诫说：“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他这里所说的改革，当然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1993年经邓小平“逐篇审定”之后出版的《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完整地收入了他设计政治体制改革蓝图的多篇论著，这更清楚地表明了邓小平在1989年下半年之后仍然紧紧抓住实行党政分开、解决权力过分集中问题以改善党的领导这个主要矛盾，从根本上、实质上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主体思路和坚定态度。

现在，邓小平逝世已经十年有余了，根据时代发展的新特点和人民利益的新要求，进一步丰富和完善邓小平设计的政治体制改革蓝图，坚定不移地将这个蓝图付诸实施，以尽快改变十多年来因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而导致了诸多突出社会问题和弊端的不正常状态，这是新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应该勇敢地承担起来的义不容辞的重要责任，也是对邓小平在天之灵的最好慰藉。

（文中引邓小平言论均引自《邓小平文选》1、3卷及《邓小平年谱》下册）

（作者系山西省委党校教授）

（责任编辑 李 晨）



# 马恩确实是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首倡者

阎长贵

谢韬先生在《炎黄春秋》2007年第2期《一家言》发表的文章《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中说，马克思、恩格斯晚年是“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首倡者，对不对？我认为是对的。不过，应该补充说，不仅仅是晚年。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开始合作创立他们学说的时候，就希望和没有否定无产阶级和平取得政权的可能。1845年2月15日，恩格斯在爱北斐特的集会上发表演说，一方面指明：“社会革命是穷人反对富人的公开的战争”，它“将以共产主义原则的实现而告终”；一方面又说，要达到“避免使用暴力和流血”这个目的，“只有一种办法，就是和平实现共产主义，或者至少是和平准备共产主义。所以，如果我们不愿意用流血的办法解决社会问题，如果我们不愿意使我们的无产者的智力水平和生活状况之间的日益加深的矛盾尖锐到像我们对人性的理解所启示的那样，必须要用暴力来解决，要在绝望和强烈的复仇心中来解决，那末，诸位先生，我们就应当认真地和公正地处理社会问题，就应当尽一切努力使现代的奴隶得到与人相称的地位。”（《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1957年版第624-626页）

1846年7月17日，马克思恩格斯以布鲁塞尔的德国民主主义者——共产主义者的身份在给英国宪章派的菲格斯·奥康瑙尔的信中说：“欣悉您在诺定昂的选举中取得了光辉的成就，我们谨向您，并通过您向英国的宪章派庆贺这次辉煌的胜利。……今后战场将由于土地贵族退出斗争而廓清。而斗争也只能在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这两个阶级之间进行了。资产阶级的战斗口号是：‘用一切办法扩展贸易并由郎卡郡的棉纺织业巨头组织内阁来实行这种措施’；工人阶级的战斗口号是：‘根据人民宪章对宪法实行民主修改’，如果这一点实现了，工人阶级就会成为英国的统治阶级。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英国工人充分了解到力量对比的这种变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1961年版第27-28页）

1847年10月底-11月，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回答“能不能用和平的办法废除私有制”的问题时，说：“但愿如此，共产主义者也会是最不反对这种办法的人。……但他们也看到，几乎所有文明国家的无产阶级的发展都受到强力的压制，共产主义的敌人这样做无异是想尽方法引起革命。因此，如果所有这些最终把被压迫的无产阶级推向革命，那时，我们共产主义者将会用实际行动来捍卫无产阶级的事业……。”在回答“共产主义者怎样对待现有的其余各政党”的问题时，又说：“在实行民主宪法的美国，共产主义者必须支持愿意用这个宪法去反对资产阶级、并利用它来为无产阶级谋利益的政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1961年版第366、374页）

马克思恩格斯在1847年12月-1848年1月合著的《共产党宣言》中，考虑到法国和其它一些国家的形势，则热烈和坚决地主张暴力革命（只谈了这种办法），他们指出：“无产阶级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而建立自己的统治。”又说：“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284、307页）

掌握和遵循唯物辩证法的马克思恩格斯是与时俱进的，他们既坚持

自己的信念,又从实际出发。在1871年巴黎公社起义前马克思是反对的,而爆发后,他就热情地支持和赞扬,失败后,他又认真地深刻地总结经验教训。1871年9月22日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伦敦代表会议上就德国和英国国际工人协会状况发言说:“我们应当向各国政府声明:我们知道,你们是对付无产者的武装力量;在我们有可能用和平方式的地方,我们将用和平方式反对你们,在必须用武器的时候,则用武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1963年版第700页)

1872年9月8日马克思在阿姆斯特丹群众大会上就刚刚结束的海牙代表大会发表演讲,说:“我们从来没有断言,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按:指“推翻维护旧制度的旧政治”——笔者),到处都应该采取同样的手段。我们知道,必须考虑各国的制度、风俗和传统;我们也不否认,有些国家,像美国、英国,——如果我对你们的制度有更好的了解,也许还可以加上荷兰,——工人可能用和平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即使如此,我们也必须承认,在大陆上的大多数国家中,暴力应当是我们革命的杠杆;为了最终地建立劳动的统治,总有一天正是必须采取暴力。”(《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1964年版第179页)

在80年代末,即1889年12月18日,恩格斯在致丹麦社会民主工党内的革命派格·特里尔反对其党内改良主义多数派的信中,指出:“无产阶级不通过暴力革命就不可能夺取自己的政治统治,即通往新社会的唯一大门,在这一点上,我们的意见是一致的。”在这封信中恩格斯还批评了丹麦农民党“放过拿起武器来惩罚宪法的破坏者的机会”的做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2版第685、687页)而进入90年代,恩格斯根据形势的变化,则在保留享有“革命权”的同时,进一步论述了“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问题。1891年他在《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中指出:“可以设想,在人民代议机关把一切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只要取得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就能够按照宪法随意办事的国家里,旧社会可能和平地长入新社会,比如在法国和美国那样的民主共和国,在英国那样的君主国,英国报纸上每天都在谈论即将赎买王朝的问题,这个王朝在人民的意志面前是软弱无力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2

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73页)当时,恩格斯认为在德国专制制度下还没有这种可能。他说,在德国宣布某种类似的做法,就是揭去专制制度的遮羞布,只能把党引入迷途。

到1895年3月,即在逝世前的5个月,恩格斯在《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认为,不仅在德国,而且在整个欧洲,都有了这种可能,都应该和可以这样做。恩格斯说:“当二月革命爆发时,在关于革命运动的条件和进程的看法上,我们大家都受过去历史经验,特别是法国经验的影响。”历史表明,“我们当时的看法只是一个幻想。历史走得更远:他不仅打破了我们当时的错误看法,并且还完全改变了无产阶级借以进行斗争的条件。1848年的斗争方法,今天在一方面都已经过时了。”“这里斗争的条件也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旧式的起义,在1848年以前到处都起过决定作用的筑垒巷战,现在大大过时了。”“实行突然袭击的时代,由自觉的少数人带着不自觉的群众实现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恩格斯指出:“这是不是说,巷战在将来不会再起什么作用了呢?决不是。这只是说,自1848年以来,各种条件对于民间战士已经变得不利得多,而对于军队则已经变得有利得多了。所以说,将来的巷战,只有当这种不利的情况有其他的因素来抵消的时候,才能达到胜利。”

另一方面,恩格斯在这篇《导言》中又指出:“德国工人仅仅以自己作为最强有力、最守纪律并且增长最快的社会主义政党的存在,就已经对工人阶级事业作出头一个重大贡献,除此以外,他们还对这个事业作出了第二个重大贡献。他们给了世界各国同志一件新的武器——最锐利的武器中的一件武器,向他们表明了应该怎样使用普选权。”在罗曼语国家里,人们也开始逐渐了解到对旧策略必须加以修正。德国人作出的利用选举权夺取我们所能夺得的一切阵地的榜样,到处都有人效法。”

当然,需要指出,恩格斯特别郑重声明:“不言而喻,我们的外国同志们没有放弃自己的革命权。须知革命权总是唯一的真正‘历史权利’,——是所有现代国家无一例外都以它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唯一权利。”

在这篇《导言》中,恩格斯还指出了资本主义

存在和发展的长期性。他说：“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的程度；历史用经济革命证明了这一点，从1848年起经济革命席卷了整个欧洲大陆，在法国、奥地利、匈牙利、波兰以及最近在俄国刚刚确立了大工业，而德国简直就成了一个头等工业国，——这一切都是以资本主义为基础的，可见这个基础在1848年还具有很大的扩展能力。”（以上各段引文均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第509-522页）在这里，恩格斯不仅修正了《共产党宣言》中“资产阶级不能统治下去了”的断语，也修正了《资本论》中“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的断语。

这就是恩格斯1895年所说的情况和表明的观点。时间已经过去100多年了，现在，其情况是变得好些，还是差些。我觉得是好些，而不是差些。甚至应该说，不论经济发展，还是政治发展，都不可同日而语了。拿资本主义的扩展能力来说，在今天不是还很大吗？！而又在哪个资本主义国家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剑拔弩张的斗争形势？！事实上，马克思恩格斯所论述意义上的无产阶级在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已经不存在了。

马克思恩格斯与时俱进的理论创新精神非常宝贵。在1895年3月，恩格斯在坚持一定条件下拥有暴力革命权的原则基础上（认为恩格斯在《导言》中完全放弃了暴力革命的原则是不对的，为这件事情，恩格斯当时曾不只一次地严厉斥责德国社会民主党一些人“无论如何是和平的和反暴力的策略”，即“绝对守法”、“绝对放弃暴力行为”的观点和做法），着重提出和论述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问题，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然而，从列宁起举例说，列宁有部名著叫做《国家与革命》，其副标题为“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学说与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任务”，该书涉及和引用了马克思恩格斯十五六篇著作，包括文章和书信，就是没有和《国家与革命》的主题关系极其密切的恩格斯这篇《导言》，一直到今天，恩格斯（以及马克思）用和平手段取得政权即“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观点几乎从来没宣传过，相反，始终处于被否定和被批评的地位。顺便说一下，1972年，即在

文化大革命中，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编辑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版就没收入恩格斯《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这部十分重要的著作。我们过去这种做法造成了很大的危害，有很多经验教训。

马克思学说创立和发展的历史表明，在如何取得政权问题上，马克思恩格斯始终是“两点论”，而不是“一点论”。不过马克思恩格斯在晚年，特别是恩格斯在晚年——他比马克思晚逝世12年，更强调更全面地阐述了和平取得政权即“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问题，这在他逝世前不久写的《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即也是他最后的一部著作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再说一次，就是在这部著作中恩格斯也不是只讲一种可能性）。毋庸置疑，现在，即马克思恩格斯逝世100多年后的今天，资本主义发展状况和世界形势都发生了绝大变化，我们更应该学习马克思恩格斯的创新精神，并依据他们创立的实事求是的世界观与时俱进地正确看待如何取得政权这个问题。

（责任编辑 吴 思）

## 敬告作者

一、投寄我社的稿件，三个月内未接到拟刊用通知，作者可自行处理。

二、不刊用的稿件，凡打印文本和手写短稿，不予退稿；手写长稿，如作者要求，可退稿，请在投稿时付足退稿邮费。

三、向我社投寄稿件时，不要寄拟配发的照片，待我刊决定刊用后再与作者联系。

四、拟向我社投寄两三万字以上的长文和长篇书稿，请先与我们联系，经同意后再寄，以免丢失和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五、向我社投稿的作者，请在稿件上注明详细联系方式及作者本人的身份证号码。

《炎黄春秋》编辑室





# 萧克将军

## 谈

### “三次站错队”

郭其侨

国防大学的前身，在文化大革命前叫高等军事学院、政治学院、后勤学院。再往前，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建立的由刘伯承元帅任院长的南京军事学院。1970年后，撤销了高等军事学院、政治学院、后勤学院，成立军政大学，校址主要部分仍在高等军事学院的大院内，校长是时任总参谋长的黄永胜兼任，政委为张秀川。1971年“九一三事件”（林彪出逃摔死）以后，因黄、张都是林彪的死党被撤职，中央军委任命萧克为校长，唐亮为政委。1978年又一分为三：军事学院（去掉了高等二字）、政治学院、后勤学院，萧克任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直到1985年8月又将三大学院合并为国防大学为止。

1985年下半年，军委要召开一次院校会议，研究军队院校的体制改革问题。萧克院长为了准备这次军委会上的发言，于1985年4月中旬出发到湖北、河南、河北的一些军事院校搞调查。他出发时带了我，要我作记录回来帮他准备发言稿。我那时任军事学院研究部军事学术研究室主任。

萧院长调研的第一站是武汉。他当时是全国政协副主席，所以火车专为他挂了一节专用车厢。这种车厢一半是卧铺一半是会议室。中午我在卧铺上翻来覆去睡不着，于是我就起来到会议室去

看报纸。不一会儿，萧院长也不睡来到了会议室。他一进来看到我坐在里面就问：“你怎么不睡呀？”我说：“睡不着，来看看报纸。”他也坐了下来。这时，我就想起了一个话题，等他坐下了我就问：“萧院长，我过去在批林整风大会上听你说过，你说你一生三次‘站错队’，这最后一次是‘文化大革命’，没有人没站错队，这我理解，你前两次站错队是怎么回事啊？”萧老一听我提这个问题，一下来了精神，“你愿意听这些吗？”我说：“我很想听。早就想问你，但没有机会。”萧院长说：“那好，我就简单讲给你听听吧。”于是他老人家就讲了起来：

“第一次站错队是1929年6月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那时，军召开的党代表大会，几乎都要重新选举军党委和军委书记。在这次选举军委书记时，我投的陈毅同志的票，大多数代表都投的陈毅同志的票，只有林彪少数几个人投毛泽东同志的票，所以毛泽东同志落选了，陈毅接替毛泽东当了军委书记。毛泽东同志一气之下，据说跑到漳州‘养病’去了。那时刚建党不久，党内民主空气很浓，选举时愿意投谁票就投谁票。陈毅同志当选后，就化装绕道香港去上海，向中央军委汇报红四军七大的情况。当时中央军委书记是周恩来同志，周听了陈的汇报后，指示陈毅同志回去一定要把毛泽东同志请回来。陈根据周的指示，又化装成商人，几经周折返回了苏区。陈回来后，请回了毛泽

东同志，并于1929年的12月在福建古田召开了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之前曾于9月开过红四军八大），毛主席在会上作了报告，并根据这个报告做了决议——即有名的古田会议决议，毛主席又恢复了在红四军的领导职务。你想，我在红四军七大的这次投票，不是站错队了吗！”

我当时听了后，心想：难怪我以前听老同志说过，毛主席曾经讲到过以前什么重要会议上投的“一票”问题，可能他老人家在心里还一直耿耿于怀，还记着谁投他票了，谁没投他票。难怪他以后那么欣赏和信任林彪呢！

萧院长接着说：“第二次站错队是我们二、六军团长征快到目前的四川甘孜时。那时张国焘在甘孜，他派了一位代表来迎接我们。这位代表来到后，就分别单个找我们二、六军团的领导谈话，说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他们率一方面军（东路军）北上如何如何错误，他们四方面军南下如何如何正确，等等。我当时不了解他们长征会师后的具体情况。那时我们六军团就一部电台，还经常坏，再加上战斗紧张，很少和他们联系，所以对张国焘代表所说的话我没有表态。也就是说，我当时没有批评张国焘的错误，这不是又站错队了吗？”

我说：“你没表态算什么站错队呀！”

萧说：“现在不是有一种说法，叫做不表态的表态吗？”（意思是说，你没有表态反对，就等于默认和支持。）

我说：“你们不是个别单独谈话吗？别人也不可能知道啊！”

萧又说：“现在不是还有一种说法吗，叫做没有不透风的墙嘛！”

我心想：原来如此！

萧院长又接着说：“我们到达甘孜后朱德总司令也在这里。朱老总立即召集我们二、六军团领导开会，向我们讲了张国焘不遵守中央指示北上而坚持南下、搞分裂等等错误。朱老总的的话我们都是完全相信的。因为我从参加南昌起义，就在朱老总的领导下，以后南下广东，转战湖南，发动湘南起义，到井冈山与毛主席会师，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我都是在朱老总的领导下。在甘孜时，朱老总又把我们和张国焘等四方面军领导召集一起开会，在会上我们都批评了张国焘的错误。”

也就在这个时候，党中央指示由二、六军团组

成二方面军，贺龙同志任总指挥，任弼时同志任政委，萧克同志任副总指挥。

我听了萧克院长的这段谈话后，感慨颇多。

“站队”一词，是文化大革命中的流行语。当时全国上下大大小小单位，在江青、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挑唆下，几乎都分成了两派。凡是他们支持的，就封为革命造反派或无产阶级革命派；否则，就扣上“保守派”、“保皇派”的帽子。所谓革命造反派，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在江青一伙的操纵下，成天搞夺权，揪斗“走资派”（各级领导）和“反动学术权威”（专家、学者、名人），破“四旧”，打、砸、抢、抄、抓，胡作非为。这就是他们所谓的是在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站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的，站队站对了；“保守派”不同意造反派的搞法，就是“站错队”了。于是乎站队问题就成了一个人是革命还是不革命甚至反革命的大问题。文化大革命中，站错队的保守派是绝大多数，真正的造反派是极少数。

我记得萧院长在谈到三次“站错队”的讲话，是在1973年讲的。那时还处于文化大革命时期，所以他用了“站队”一词。站队是以毛主席划线的，萧院长也把文革中的这种划线站队方式，套到了他历史上的那两次经历中去了，那时党内生活高度民主，哪有什么以人划线的问题呢？可见，文化大革命中那种个人崇拜的恶劣风气，发展到了何等登峰造极的地步！

萧克老将军不仅文武全才，而且品德高尚。他老人家为了党的事业，为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为了我军的建设和发展，奉献了毕生精力，从来是严于律己宽于待人。他参加了南昌起义和我军的创建；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参加了中央苏区和湘鄂黔苏区创建。那时他就担任了六军团的军团长和二方面军的副总指挥。可是解放后授衔时只给他授上将军衔，后来又干脆把他转业到农垦部当个副部长，无论从哪方面看，我都觉得不太公正。为什么会这样呢？是不是与他说的前两次“站错队”有关呢？只有天晓得！可是萧老从来未把这些事放在心上。

萧老现在已经年过百岁华诞了。好人长寿！

（作者退休前为解放军国防大学研究生院院长，正军职）

（责任编辑 李晨）

# 胡耀邦在湄潭的惊人之语

洪 星

“继续鼓足干劲生产，准备敞开肚皮吃饭”。这是1959年春胡耀邦视察湄潭时讲的两句惊人的话。那时大跃进正在全国兴起，《人民日报》在头版发表了一篇《鼓足干劲生产，敞开肚皮吃饭》的文章，引起全国强烈的反响。耀邦同志对这篇文章表示质疑。

是年元月15日，他在向湄潭县“双千人活动分子”大会讲话时，大声地问大家：“《人民日报》这篇文章提法对不对？”当时会场一片哗然，没有人回答。耀邦同志对大家说：“同志们，这两句话不完全对。应该修改一下：鼓足干劲生产前头应加‘继续’二字，敞开肚皮吃饭前头应加‘准备’二字。我们现在粮食生产还没有过关，粮食还不够吃，吃饭还要节约。要继续鼓足干劲生产，把粮食搞上去了，才能敞开肚皮吃饭。所以现在只能准备敞开肚皮吃饭。”胡耀邦这种实事求是精神，给与会同志留下深刻的印象。在大跃进年代，在全国一片赞扬声中，耀邦同志敢于实事求是讲真话和他敢于破“两个凡是”的精神，是一脉相承的。

1959年1月13日，县委接到贵州省委通知，说团中央书记胡耀邦要来湄潭视察工作。县委委托我和吴华林（湄、凤、余三县合并前县委书记）负责接待工作。当时我和吴华林书记商定在贵州省茶科所接待。元月14日下午5点，我和吴华林同志在打鼓坡茶山下公路旁等到了从余庆县方向过来的胡耀邦一行。他们下车后，团省委书记汪行远向我们一一作了介绍，其中有团中央副书记杨海波。他们三人乘一辆华沙牌小轿车，既没有警卫员，也没有其他陪同人员。写到这里我想到上世纪50年代贵州省委书记周林同志。那时我同他一块儿下乡，也是我们两

人或三人乘一辆车，轻车简从。如今这种作风不多了。

安排耀邦同志住下后，当天晚上在茶科所客厅耀邦同志约请了部分公社党委书记开了一个座谈会。他提出一些问题，如农业生产情况，粮食亩产多少斤，集体食堂办的怎样，群众每天吃多少粮，干部作风和群众关系如何等等询问大家。会议开的生动活泼，无拘无束。大家觉得耀邦同志没有架子，敢说真话，倍感亲切。

元月15日上午，耀邦同志与杨海波、汪行远参加了县委召开的“双千人活动分子”大会。当耀邦同志走上主席台与台下听众见面时，他首先就向大家提出一个问题，问台下的同志们“鼓足干劲生产，敞开肚皮吃饭”这句话对不对？接着他回答了这个问题（本文前边已述）后，讲了如下意见：一是湄潭这个地方好，农业生产除盛产粮食外还有茶叶、烤烟等经济作物，木材也不少，应该把这些资源充分利用起来。湄潭今后应大力发展粮食生产，同时也要大力发展茶叶生产，实现茶叶县。二是整顿好公社。公社成立不能叫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标准高得多高得很。觉悟极大提高，生产极大发展，生活极大改善也只能叫社会主义。三是干部要转变作风，办事要和群众商量，不能一急就骂人。骂人是不对的，应向群众赔礼道歉。办事既要有冲天干劲，又要有科学分析精神，绝对不能蛮干。

耀邦同志讲话给与会同志极大的教育。在左倾思潮盛行的年代，他敢于实事求是讲话，确实是难能可贵的。可惜三县合并后新的县委主要领导者没有听胡耀邦同志的忠告，仍旧我行我素。因此，导致发生惨重的“湄潭五九”饿死人事件，教训极其深刻。（责任编辑 赵友慈）



# 中国大百科全书奠基人姜椿芳

杜明  
明  
摘编

姜椿芳被一些同志称为中国大百科全书之父，在中国出版界被一些学者称为“中国的狄德罗”。

姜椿芳 1931 年参加革命，1932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 年创办《大北新报画刊》被日本人逮捕，在狱中坚贞不屈。1941 年苏德战争爆发后，我党通过姜椿芳同塔斯社商定由“苏商”出面创办中文《时代》周刊，在上海成为抗日的一盏灯塔。解放后他除继续领导时代社工作外，又先后任上海军管会文管会副艺室主任、市文化局对外文化联络处处长。同年创办了上海俄文专科学校（上海外国语大学前身），任校长和党委书记，培养了一大批新中国急需的俄语人才。1952 年姜椿芳调任中宣部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副局长，主持《马恩全集》、《列宁全集》和《斯大林全集》的翻译和出版。他为马列主义的编译事业日夜操劳，竭尽全力。当时师哲把他誉为“沙漠中的骆驼”。

## 秦城“孕育出”“大百科”

“文化大革命”浩劫中，姜椿芳以莫须有的罪名被监禁，在秦城监狱蹲了近七年之久。在秦城单身牢房里，姜椿芳身心受尽折磨，双目近乎失明，但他心里却一直思考着一个问题：中国怎么会发生“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惨剧？他得出的结论：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全民文化水平低，容易受不健康思想影响，因此抵制不了这样一场浩劫。他认为必须千方百计提高全民文化水平，了解世界，认清历史发展趋向。他认为，编辑、出版一部中国大百科全书是当务之急；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不能没有一部大百科全书。在狱中他独自一人默默构思着创办中国大百科全书的计划。

1975 年姜椿芳无罪出狱后，在有关各方面人士的参与下向中央写报告申请，1982 年由国务院总理颁发聘书，任命他为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

姜老和他的“百科迷”们就这样正式启动了这一工程。一切白手起家。没有房子，他们借国家出版局收发室做联络点；没有资金，他们向国家出版局借了 40 元人民币，作为临时花销之用。

最先出版的《天文学》卷于 1980 年底问世，接下来是 1982 年出版的《外国文学》卷。每一学科卷的策划，确定主编、副主编、编委会人选，编写过程中的各种会议，姜老都亲自参加。而各卷所有的重要稿件，姜老都是晚上在台灯下手拿放大镜，用他那双严重的青光眼，逐字逐句审阅的。

季羨林回忆说：“大百科出版社成立时，我参加了许多与大百科没有直接关系的学术会议。姜老每会必到，每到必发言，每发言必很长。不管会议的内容如何，他总是讲大百科，反复论证，不厌其详，苦口婆心，唯恐顽石不点头。他的眼睛不好，没法看发言提纲，也根本没有什么提纲，讲话的内容似乎已经照相制版，刻印在他的脑海中。朱光潜先生说，姜椿芳这个人头脑清楚得令人吃惊。姜老就靠这惊人的头脑，把大百科讲得有条有理，头头是道，古今中外，人名书名，一一说得清清楚楚。”

1987 年 12 月 17 日，姜椿芳在极度痛苦中离开了他所热爱的社会和人民。在去世前一个多月，他说：“我不发怒，不生气，但对这个‘不生气’，我现在有一个体会，实际上在‘生气’，只是把它压下去了。‘忧愁’，‘忧’什么呢？我也受到一些不公平的待遇，我想不通。十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被批斗，后来

被抓起来，坐监牢坐了七年。在‘文革’中我没有流过一滴眼泪，但是当我看到一段悲惨的故事，我常常要流很多眼泪。一想起文化大革命，是有些‘忧愁’，也有‘怒’，是一种坚强的意志克服了这些。”

## 姜椿芳进牛棚

文革开始，姜椿芳在牛棚里，每天都要站在伟大领袖像前早请示晚汇报，不断地低头认罪，接受各种各样的大小会批斗，随时听候造反派和外调人员的调查。其余时间，便是写那些永远也写不完的交代材料以及进行强制性提审和惩罚，每天早晨集体早请示、请罪后，还要高唱 嚎丧调）：

我是牛鬼蛇神，我是人民的罪人

我有罪，我该死

我有罪，我该死

人民应该把我砸烂砸碎，砸烂砸碎

我是牛鬼蛇神，我向人民低头认罪

我认罪，我改造。

这时老舍已经走到太平湖边，在那里坐到傍晚后，含恨投湖了。

那时姜老还可以回家，孩子们回家也带来种种信息：北京六中创办了“劳改所”，用酷刑拷打出的鲜血在白墙上写下：红色恐怖万岁！老师被抓去严刑拷打，有几个老师被活活打死；北师大女附中的女学生们，将手无缚鸡之力平时备受尊重的著名女校长残酷折磨致死；某某学校红卫兵烧书鏖战了三天三夜，火光冲天……

1966年“红八月”里所发生的一切，使姜椿芳心疼得流血，他已经明白一个全民族的灾难降临了，他牙疼，彻夜失眠。天还不亮，街道上的高音喇叭就传出刺耳的歌声，起劲地响彻在漆黑的夜空：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嘿！就是好！

革命大字报，嘿！

烈火遍地烧，

胜利的凯歌冲云霄。

不久，北京 34 中的红卫兵会同编译局的造反派，十多个人浩浩荡荡来姜椿芳家里抄家。当时家里有他的老母亲、妻子和一个孩子在，他们一见这阵势，已经明白要发生什么事了。进屋后，那个领头的腰间束着戴铜扣的大皮带双手叉着腰大声呵



姜椿芳

斥：你们听着，我们是 34 中的红卫兵，现在到你家破四旧、抄家，你们要老老实实配合，否则砸烂你们的狗头！环视了墙壁以后，又高声骂道：为什么不挂毛主席像，真是反动透顶！一边说着，一边将家人关在一间小屋里，七手八脚将小屋的窗户用报纸蒙上，勒令他们老老实实呆在小屋里，不许出门，也不许向外看。

那些红卫兵手里拿着大木棒，为了给个下马威，先稀里哗啦砸碎一些瓷器，然后几个人大声嚷着：拣值钱的东西拿！于是，拿的拿、砸的砸，一阵噼噼啪啪的声音响过，满屋子的瓷器碎片和横躺竖卧的家具，就像当年日本鬼子进村一样。小屋里的老奶奶，看不见这一切，但那砸烂东西的响声，却像砸在她的心上，她活了这么大的岁数，看见过日本鬼子祸害老百姓，却没想到怎么自己人也学会了这一套。当时，姜椿芳三女儿的孩子小琦和她的保姆也住在家里，两个多小时以后，除了保姆住的房间外，其他全被洗劫一空。那些红卫兵个个背着个大书包，一边拿一边向书包里装，装走了姜家几个式样各异的小座钟、书柜里摆设的各种小工艺品，其中有的是国际友人送给姜椿芳的纪念品，以及照相机等，还抄走了镶大理石的红木书桌以及红木沙发和家具。

34 中的红卫兵抄完家之后，又有其他学校的

红卫兵去抄家，经过几次反复抄家后，姜椿芳家里只剩下睡觉的床和一个三条腿的桌子。因为外单位几次去抄家，编译局的红卫兵就在姜家的大门上贴了一张条子，上书：此院已被抄过家。他们的本意是避免学校、街道再去抄家，谁曾想却好像有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意思，这就给姜椿芳及其一家带来更多的灾难。那时盛行革命大串联，红卫兵和革命造反派从天南海北全国各地聚到首都北京，他们想“经风雨，见世面”，有的甚至想借此见见大人物。

那是一个星期天，一群外地的红卫兵正走街串巷，当走到西城丰盛胡同姜家门前时，一看条子就知道院内有黑帮，一个红卫兵说：站住，这里有情况，发现了敌人！于是七八个人横冲直撞进了院里，谁是黑帮？一声断喝，姜椿芳正吃着饭，放下饭碗站了起来，以后的事情，凡是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就可想而知了。他不是没受过污辱，也不是没挨过打，但那时家人没在眼前。而现在，妻儿和老母目睹了这一幕，特别是他那为革命曾经舍生忘死的老母亲，这比打死她还要难受啊！

街道上的小孩子受大人影响对所谓的“敌人”也是拳打脚踢，有一个小学校竟布置红卫兵每天要做一件对“敌人”专政的事，并要求汇报。小孩子哪里懂得什么专政，无非是体罚而已。姜椿芳为此也深受其害，因为住“牛棚”，被恩准回家的时间很少，因为门上的条子，即使回了家，也是一样的提心吊胆。有一次他在家里吃饭，两个红小兵跑进来，向他的碗里放了一把沙子，然后扬长而去。他想起在编译局食堂吃饭时，有些小孩子往他的饭碗里放鱼骨头、石子儿，他不动声色地将这些东西用筷子夹了出去。他想，这大概就是这些孩子的专政方式吧。他难过的是这些孩子正在成长，这些东西给他们以什么影响呢！

他是一个诚实的人，但在当时，诚实只能给他带来更大的灾难。除了无休止的批斗和交代外，专案组专门整理了“三反分子姜椿芳在猖狂反扑”的材料上报给康生。这份报告，这样写道：

最高指示：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

文化大革命以来，姜椿芳对我局革命群众和干部把他揪出，对他的历史进行审查以及红卫兵

抄家等革命行动，一直是不满的、对抗的，一有机会，他就进行反革命串联和猖狂反扑！下面几件事，足以说明：

1967年6月间，当革命小将调查追问问题使姜无以答对时，姜椿芳这个三反分子竟气势汹汹地嚷道：“你们是来了解情况还是来问口供的，你们要问口供审问我，我就不谈了。”过了几天这两个同志又来调查时，姜居然威胁说：“光审问我，没法谈，我不去。”1967年10月外调人员问到关键问题时，姜竟摆出一副老党员的架势，教训起对方说：“你们搞过地下工作没有？”当对方指出姜的态度极其嚣张时，姜却非常狡猾地说：“不要误会，不要误会。”

1968年3月8日外调人员问到姜的要害问题时，姜态度极其恶劣，竟然强硬地反问：“你们是不是来考我的？”

1968年3月18日外调人员问到姜的要害问题时，姜拒不交代，公然狗胆包天破口大骂革命小将放屁！混蛋！一再恶狠狠地说：“你们不懂，你们不懂！”

1968年3月21日当专案组勒令姜交代谩骂革命小将、对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反扑的反动思想时，姜椿芳这个反革命分子不但不低头认罪，反而一肚子委屈地控诉起革命小将，胡说：“3月18日来的这两个青年激怒得我两天没睡好觉。我不能再做老好人了。我不能逆来顺受，他骂我，我就骂他，对方说我入党没有介绍人，以此来推断我是假党员，我推想这是陪同人员介绍我的情况时说的，是事先定好我是假党员，让他们来压我，所以我激怒了。”同时又公然提出“对方要问什么问题我弄不清楚，今后是不是可以像王惠德那样，我先问问外调者是哪个单位的，调查的中心问题是什么？总说我不老实我想不通。总的说来，我不应受这种待遇。”当专案组勒令姜今后绝对不许发生类似情况时，姜竟说：“今后尽量做到。”

1968年3月21日姜对专案组说：“我也想到我可能被捕。”并公然污蔑说：“公安部门要弄清问题也可以逮捕我。”

姜椿芳专案组 1968年5月8日

### 一次审讯 一声断喝



“听见了没有?!”

姜椿芳有些茫然,不知说什么好。

“快交代你的罪行,讲!”

姜椿芳镇静了一下,冷静地说:“我说的都是实话!”

主审官向旁边几个人使了一下眼色,然后恶狠狠地说:“你的问题铁证如山,你还想抵赖,你以为就能滑过去,休想!我看你还是得清醒清醒!”

桌前的那几个人早已站了起来,很快地围了上去。一顿拳打脚踢,姜椿芳再也站立不住,“扑通”一声栽倒在地下,眼前直冒金星。

“好哇,装死!……”

主审官两手叉着腰,大声吼道:

“今天就进行到这里,送他回号子!”

于是,两个警卫一边一个拖起姜椿芳就走。

连续数天白天审问,晚上写材料,审问时,有时被罚“喷气式”;有时罚站、挨打,一站就是一天,姜椿芳双腿已经开始浮肿,像穿了两只沉重的靴子,步履艰难。这天上午8时,他照例被两名武警带出了号子,送进了审讯室。所谓的“里通外国、苏修特务”的罪行已经讲了一遍。现在是回答讯问。

“你是怎样认识李立三、李莎夫妇的?又是怎样把‘苏修特务’李莎拉进毛选组的?”主审官胸有成竹又斩钉截铁地扔出了讯问的题目。

“我最初到李立三家是在1952年冬天,中央责成李立三召集一批人校订我和曹葆华新译出的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参加的有陈昌浩、张锡侑、曹葆华和我,我还带去中宣部斯大林著作编译室的工作人员做记录。因工作时间较长,在他家吃了午饭,但没见到女主人李莎。初次见到李莎是在1956年,校订《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的俄译文,参加者还是张锡侑和陈昌浩,我也去了。因此文章在师哲主持下译成俄文,又由中央责成李立三召集人校订。有些俄文问题,李立三问他的老婆李莎,那天还在他家吃了饭,从此认识了李莎。”回到监室后,狱方又送来了小茶几、钢笔水和纸笔,令其写交代材料。于是姜椿芳补写了审讯中没有让他说完的话。

这个交代材料交到专案组,当他再次被提审时,发现主审官怒气冲天,其他几个人也都凶相毕露。姜椿芳刚被带到指定地点站定,主审官几乎是吼叫着说:“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老实交代你的

罪行!你可倒好,不但不交代,反而指控上面!像你这样的人,就得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

年轻的陪审员站了起来,两手叉着腰大声喝道:“看样子你只有吃点苦头才肯交待,低头,再低!”一直弯到九十度。绕着弯子,又提了其他一些问题继续审讯。

姜椿芳低头弯腰,忍受着侮辱。两个小时过去,本来已经肿胀的双腿,几乎支持不住,眼前冒着金星,腰酸如裂。但是他的心智始终清楚,他咬牙坚持着,又过了一会儿,忽然眼前一黑,他向前一个趔趄,几乎栽倒,那个年轻的冲了过来就势一拳将他打倒在地。接着又是一阵拳打脚踢,嘴里还不干不净骂道:“别装死!这不是打你,是叫你清醒清醒!”

主审官接着说道:“你这个死顽固,等着瞧吧,我们有办法对付你!”

频繁的审讯和折磨,牙齿疼痛,口腔也肿了起来,有时疼得坐不住,只得在小床上来回摇摆着晃动身体。似睡非睡中,姜椿芳好像看见杨靖宇向他走来,他仍旧穿着那件半旧的灰布长衫,两眼炯炯有神,走近时向姜椿芳伸出那一双温暖的大手……

忽然,又好像在哈尔滨十三道街那个半地下室家里的小屋里,杨靖宇打着拍子,两个人低声地唱着《国际歌》。

虽然是小声唱,但越唱越热烈,两个含着热泪的头紧紧地靠在了一起。

又恍惚杨靖宇要回前线了,那是6月初的天气,杨靖宇着一身半农民、半商人的短裤褂。往事一幕幕,像演电影在头脑里翻腾。此时好像他正在与自己握手告别。

说也奇怪,想起杨靖宇,想起和他在一起的日子,自己好像坚强了许多,牙疼的折磨似乎也轻一些了。

一天晚上,照旧进行一天中的第三次审讯。向毛主席请过“罪”后,专案组没有叫他坐下而是直接提出一些问题。当姜椿芳回答道:“在翻译《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的工作中,在使用苏联专家的问题上,我犯了错误。”

专案组一位年轻的陪审员站了起来,拍着桌子吼道:“不是什么错误,是罪行!”主审官也站了起来,无可奈何地摆摆手,示意让他说下去。

姜椿芳的陈述总是按事实的本来面目，无论讲多少遍，也无论从何处提出问题，都不会前后矛盾，也找不出任何破绽。车轮战摧毁了他的健康。

## 活下去为了要编大百科

姜椿芳经常翻腾一个问题：为什么会产生这场浩劫？考虑来考虑去，他认为主要是整个国家文化落后，人民知识贫乏、愚昧迷信，以致听任林彪造“神”以及“四人帮”之类野心家的胡作非为。中国迫切的问题，是要普及知识，提高全民族的文化水平。

他想起18世纪在欧洲发生的资产阶级革命，那是1789年首先在法国爆发，然后遍及欧洲各国。不可否认，当时唯物主义思想的传播是这次革命的准备和先行。在这次启蒙运动中，有一个名字令人难忘，那就是哲学家狄德罗，他和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等杰出的科学家、哲学家一起，结成了“百科全书派”，和达兰贝尔一起着手编辑出版《法国百科全书》。他们用百科全书的形式，对所有历史、文艺、科学、技术等各个领域里的封建迷信、愚昧无知的观点进行批判，用唯物主义的观点对各个学科和领域里的知识做了新的阐述和论证。这样，百科全书便成为资产阶级革命的号角和武器。而带头做这件事的近代百科全书之父法国的狄德罗也总在他的头脑里盘旋。他读过狄德罗的传记，也搜集过有关资料，他崇敬他多年，而现在在这间狭小的牢房里，狄德罗好像在他的头脑里生了根。狄德罗一生生活贫困，只读到中学就因交不起学费而辍学。后来当过私人秘书、交易所的司账和家庭教师以及为人捉刀代笔，但仍入不敷出。狄德罗精通英语，经常从事些翻译……这和姜椿芳贫困的青少年时代读不起书，为谋生计过账做过家庭教师、靠翻译维持生活等等又何其相似，所以他想起狄德罗，深深理解挣扎在生存线上的他是怎样的勤奋好学。而更为相似的是，1749年狄德罗因为他所著《给有眼人读的论盲人的书简》一书被认为是反宗教的，从而被投入监狱。他在狱中也反复思考怎样批判宗教迷信、封建保守等等旧思想，最后想到了用百科全书的形式宣传唯物主义的思想，于是又对如何编纂百科全书做了种种细致的设想。有人说历史是制造吻合的能手，谁能

想到在狄德罗逝世那么多年之后，有一个中国人也在狱中苦苦思索狄德罗当年要办的事。姜椿芳想如果有幸能够活着出去，他一定要用这条捡来的生命，用整个余生来填补中国文化的这个空白。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他告诫自己：一定要和死神抗争。

秦城监狱在一段时间内，擅自规定受审人员必须“一侧睡”，就是只准面向牢房的观察孔睡觉，不准仰卧，不准翻身，也不准换另一侧，白天坐着也只许对着监狱口坐着。

到了1972年，姜椿芳的身体已经衰弱到极点，这时他在单人牢房里已经熬过了整整四个年头。

有一次，姜椿芳因为血压太高而导致头晕难以站立，被送到监狱医务室诊治被怀疑是“单身牢房综合症”，秦城监狱患上这种病的不少，得过这种病的描述说：“鲁宾逊和星期五在孤岛上，他们还是两个人，还可以看到动物、树木，还可以看到大海、蓝天和白云，而我只能看到四面墙。即使放风的时候也看不见人。他们把我放在一个放风间里，就把门锁上了。我在患上‘单身牢房综合症’后，一度身体处于严重的脱水状态，差不多有一百多天，每天晚上都要依靠安眠药才能勉强睡上半个小时，人被折磨得疲弱不堪。这种与外界完全隔绝的生活，令我九死一生。”

姜椿芳疲弱的身体被怀疑得上了这种病，为了防止丧失语言能力，他在牢房中常常自言自语，为了使头脑不至于迟钝，他有时数数，开始顺着数，然后倒着数；为了保持记忆力，他开始回忆他所结识的人，从相识到他所了解的朋友的一切，一个一个地想，使他的头脑总是处于活动状态之中。

姜椿芳素来热爱诗歌，有一段工作非常忙碌，还要每天背上一首唐诗，这已成为他的习惯。现在漫漫长日终日枯坐，背诵诗歌也是他防止失忆和痴呆的一种手段。他常常一首接一首地反复背诵。

由于长久对着门和窥洞枯坐，全身已无一点力气，他想尽办法制造活动的机会，屋的一角是便池，他多上厕所，借机来回走动；坐牢已四年，来时发的囚服早已破旧不堪，狱中规定，由嫌犯自己缝补，棉服也要自己拆洗。姜椿芳经常要求拆洗缝补，这也能增加一些活动量。

由于三叉神经受损，面部开始剧烈地疼痛，晚

上疼得睡不着觉，实在忍不住时，就在枕头上晃动；白天疼得坐不住，严重时，恨不得一头撞到墙上，也许那能够结束这剧烈的疼痛和眼前这一切。但是，他不能，他要争取活着出去，他要拼上性命去圆一个梦，一件对中华民族有利的事。

光是剧烈的疼痛还好一些，麻烦的是，由于面部神经抽动，嘴闭不上，无法咀嚼，饿了两天，几乎站不起来了。他要求到医务室看病，监管人员理也不理，看也不看，蛮横地甩出三个字：“自找的！”

姜椿芳清楚地知道，如果他再不进食，不维持这一口气，几天后的夜里，他就会被人不知鬼不觉地拖出去，只是狱方的花名册上 6902 的名下，多了“病故”两个字而已。面部如果不扯动，尚且疼痛难忍，但现在必须去碰它，他要活，就不能坐以待毙。于是，他强忍剧痛，将食物搞碎，一点一点地用手送到喉咙里，然后再用力吞咽下去，每吞下一点食物，都要疼出一身汗，他以惊人的毅力对抗死神。

1972 年 9 月 25 日监狱医务室记下了他的健康状况：

6902 病犯，右下肢内踝部皮下大片状淤血，双下肢指凹性水肿，经常稀便，血压 100—180，双眼发胀，眼压高。

这时，他的健康已经被摧毁了，入狱时血压正常，现在变成了高血压，入狱时有轻微青光眼，写出材料毫无问题，此时几乎双目失明，有时几乎摸着写。

据曾在秦城监狱坐牢多年后来获平反的穆欣讲：“曾见一份调查秦城监狱当局肆意破坏社会主义法治，采取法西斯手段残酷迫害革命老干部情况的材料，揭发这里打骂、体罚成风的事实：‘拳打脚踢、喷气式、扭胳膊、揪耳朵、撕头发、撞墙、棍子打、大铁钥匙捅、罚站、脖子里塞雪球、冬天里拉出去冷冻’等等，形式多种多样。杨奇清同志 1968 年遭到毒打，肺部受了严重内伤，以致过早逝世……”

有人冒着生命危险，偷偷向中央反映了秦城监狱的法西斯暴政情况。1972 年毛泽东将原铁道部长刘建冀“文革”中被关押）夫人反映秦城监狱虐待在押人员的来信批给周恩来，提出对“这种法西斯式的审讯方式”应一律废除”，并下了一道指示，给各监狱约法三章：1，让犯人吃饱；2，让犯人



睡足；3，没有病症时才可以审讯。从这时起，秦城监狱才有了变化。

姜椿芳的期盼没有落空，光明战胜了邪恶，他终于等到了这一天。1975 年春邓小平重新上台，姜椿芳无罪出狱，他拖着极度虚弱的身体，立即着手进一步研究编纂大百科全书。在有关各方面人士的参与下，他直接向中央写报告，得到中央同意，并于 1982 年由国务院总理颁发聘书，成为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

姜老和他的“百科迷”们启动了“中国大百科全书工程”。

在最艰苦的岁月，姜椿芳脑海里总是浮现着哲学家狄德罗，这位和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等杰出人物结成的“百科全书派”，对 18 世纪欧洲的资产阶级革命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姜椿芳在牢狱的深夜辗转不眠，咬着牙面对人格侮辱和多种刑罚，心里就是有这个强烈的信念——一定要编出一本中国的大百科全书，这是向封建主义愚昧宣战的号角和檄书。正因为如此，历尽千难万险，这部中国大百科全书终于和人们见面了。

当我们翻开这厚厚几十本的人类智慧结晶，我们就不会忘记姜椿芳，这位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呕心沥血的伟人。

（本文摘编自《中国现代百科全书奠基人姜椿芳传》）



# 华尔街上的中共大亨

伊里

华尔街是美国垄断资本的心脏，从 1792 年创建以来，就牵动着美国和世界经济的命脉。任何公司能在那里占有一席之地，便是财富与实力的象征。曾经有一位中国青年，凭着对党的赤胆忠心，在华尔街闯出一片天地，成就了辉煌的业绩。这是一个鲜为人知的真实故事——关于华尔街中共大亨的传奇。

## 投身抗日洪流，成为“红色大亨”

舒自清，原名舒鸿源，祖籍浙江省奉化县舒前村。1918 年 2 月 8 日，出生在上海市虹口区一个贫民家庭。他靠自学成才，十八岁就成为英国义茂



舒自清夫妇

利会计师事务所最年轻的审计师，又受聘为上海洋行的高级职员。“一二·九”反帝爱国运动使他从“科技救国”的梦中醒来，加入了上海职业救国会，在中共地下党员张困斋的启发下，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积极投身于抗日活动。“八·一三”事变，日寇使上海变成了血腥的地狱。舒自清愤怒地对张困斋说：“日本人欺侮我们，是可忍孰不可忍！国民党腐败不抗日，再这样下去中国就要亡了！我要到陕北去找朱德、毛泽东和共产党。”张困斋回答说：“这边也有朱、毛的抗日组织，留在这儿作用更大！”舒自清听了喜出望外，他请张困斋做介绍人，于 1937 年 10 月参加了革命队伍。组织上调他到党领导的进步团体“华联同乐会”支部工作，和卢绪章、杨延修、张平、朱祖贤等同志一起，把救亡运动搞得热火朝天，团结了大批金融界青年和爱国民士。

1939 年 9 月，日寇步步紧逼，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全国形势愈益恶化。周恩来决定组建党的第三条秘密战线——广大华行，作为绝密、备用的组织。如果政局发生突变，第一条战线（八路军办事处、新华日报社等公开机构）和第二条战线（国统区、敌占区党的各级地下组织）瘫痪，它将起而代之，发挥作用。除了极少数高层领导是中共党员外，这个公司和其他商贸机构没有区别。按照周恩来“长期隐蔽，不断提升社会地位，当好‘资本家’，但又要‘同流不合污，出污泥而不染’”的指示，以“财神爷”、“大老板”的面目作掩护，采取单线联系，独立作战的地下工作方式。卢绪章出任总经理，具体领导这条战线。他们后来为根据地输送了大量情报、物资和经费，帮助中央领导人往返国统区，成为党最隐秘的地下掩体和经济支柱。

卢绪章走后，舒自清临危受命，接任了“华联同乐会”的党团书记。敌人想用高官厚禄收买舒

自清,都被他以“对政治没有兴趣”为由而谢绝。碰了软钉子的敌人露出了狰狞面目,1940年9月18日晚上,特务气势汹汹地闯进“华联同乐会”抓人,舒自清恰巧不在躲过了劫难,上级立刻安排他到重庆广大华行工作。当时战火纷飞,行程艰险,一路上辗转走了八个省,于11月初到达重庆。开始让他主管广大药房,后来接任了广大华行重庆分行经理,民孚、民安等公司的董事,广大华行副总经理。在商海的激烈博弈中,为了表示廉洁自律,他毅然改名“自清”。

遵照周恩来广交朋友,保持灰色面貌,当好“资本家”的指示,舒自清结识了大批医药界和各界的名流。后来遇到的许多棘手问题,都请他们出面化解。广大华行采用送干股、贴高息、合伙经营、私下津贴等办法,与国民党高级政客张军光,蒋介石侍从室专员、陈果夫的亲信施公孟,军统少将梁若节,航空检查所所长严少白,医药司司长俞松筠,重庆卫生局局长王祖祥等达官显贵建立了密切的关系。连税务局局长也成为他们的座上宾,不但没找麻烦,还指点广大华行如何应付税收检查。

舒自清为人豪爽,爱交朋友,他利用自己出身奉化,常与“四大家族”的人混在一起,请客吃饭、打桥牌、搓麻将,联络感情,刺探情报,寻找商机。有一次陪孔祥熙夫人打牌,唯恐赢了会触怒太太、小姐,但输多了又是党的损失,因此,只打四圈,故意输个50块钱左右,即借口有约会婉言告辞。这一招很讨众人的欢心,不久“输先生”名声大噪,重庆上流社会纷纷传言:“广大华行有蒋氏的背景。”

保护色搞好了,社会关系也打开了,舒自清开始拼命为党挣钱。他利用“前方马瘦,后方猪肥”的状况,广纳投资,扩展销路,使他们的西药生意财源滚滚。太平洋战争爆发,国际贸易通道断绝,进口货行情大涨。广大华行抓住机会,利用自己的贸易渠道赚了个盆满钵盈,总资本翻了几番。还凭借信用和关系到中央银行贷款,转手高息放出;利用宋美龄的航空委员会特批乘坐飞机的便利,异地倒卖黄金、美钞,不断获利。通过孙科,他们得知苏联有意与中国做买卖,而且商品价格低廉。广大华行决定利用国民党的合法途径去做这笔巨额生意。谈判准备周密,进行顺利,舒自清和公司领导出席了签订代销苏联鹿茸精、山道年、碘片合同的宴会,双方都很满意。与苏联的贸易大大提高了广

大华行的商业信誉,利润也非常丰厚。

## 从中国到美国,创业历尽艰辛

1944年,法西斯已成强弩之末,国际形势即将发生重大变化。毛泽东在会见美国外交官和记者时指出,战后中国建立民主政府,首要目标就是实现国家工业化。我们需要美国的援助与经济合作,这对中美双方都有好处,也会大大促进世界的稳定与发展。周恩来指示广大华行,以前的其他任务都不要做了,要想尽一切办法去赚钱,大力开展中美贸易。于是总部准备派年纪最轻、英语流利、业务纯熟、尚无家室之累的舒自清去美国创业,把公司的活动资金三十万美元,抽出三分之二交给他做原始资本。

舒自清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项危险而艰巨的任务。他马上去找蒋介石的小舅子毛庆祥,用三十万元的重金开路,以毛领导的“中国生产促进会”的名义,很快就搞到了去美国的签证。在秘密潜入红岩村接受周副主席的指示后,于1945年1月动身。他的美国之旅真是九死一生,飞越喜马拉雅山时几乎坠机,被迫滞留印度达数月之久,横渡大洋时又遭到日本军舰追袭,总算有惊无险踏上了洛杉矶的土地。

下船的第一印象就是美国非常富庶!虽然战争还没结束,但是街上行人穿着都很体面,市场货物充足,到处蕴藏着无限商机。舒自清非常兴奋,决心要放手大干!他先去芝加哥伯特药厂,除了接洽定货业务外,还想拿到他们在中国的经销权。当时西药在中美市场差价很大,一般可以卖到美国成本的四倍,利润高昂,所以他决心要做西药的生意。没想到此行并不顺利,先是门卫瞧不起他那身在印度花七卢比买的斜纹布西服,不让进去。后来老奸巨猾的销售部经理又不肯按期发货,虽然在舒自清金灿灿的八万美元的攻势下,最后同意三个月内交货,但是却傲慢地拒绝把在中国的代理权交给“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公司”。决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舒自清当机立断准备去纽约——这个世界贸易中心争取新的机会。他听到人们议论美国共产党说:“我要有十万美元就决不去参加”。心想:“我有二十万美元,还是要当共产党,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理想!”

舒自清住进帝国大厦旁边著名的五月花旅馆，这一天希特勒投降了，纽约大街小巷都挤满了载歌载舞的人流。舒自清也非常激动，他认为法西斯德国的崩溃为日本侵略者敲响了丧钟。在战后的世界，中国要想占据重要地位，强大的经济实力是基础。他这个过河卒子必须勇往直前。1945年6月1日，广大华行美国分行正式开张。

为了使公司有一个高起点，舒自清首先瞄准了那些世界著名的大药厂。来到礼来公司营销部，舒自清不禁叹为观止，和这个成立于1876年的药业巨头相比，伯特药厂简直不值一提。销售部主任接待了这位年轻的中国商人，可是没容他讲完来意，就打断道：“先生，我们在中国有固定的贸易伙伴，谢谢！我很忙。”舒自清刚刚离开，他就耸耸肩膀对秘书说：“Whai she? A young Chinese boy!”去惠氏、辉瑞、默沙东等公司的遭遇和礼来大同小异，没有谁认真对待舒的提议。美国人的自大和对中国的无知令他既愤怒又沮丧。但是，早年的艰辛生活造就了舒自清倔强的个性，他仍然积极寻找新的突破口。11月底，舒自清辗转找到了上海时期的老朋友纽约花旗银行副总经理，他一口答应帮忙，并说：“美国人对中国市场早就馋涎欲滴了！”

过了几天，美国六大药厂之一、排名第二的施贵宝公司中国部经理帕克·格林约见舒自清。舒自清立刻全副武装起来：戴上金边眼镜，说话、动作尽量缓慢，显得庄重沉稳，领带别针用纯金的，还买了一块劳力士金表，销售策划书及代理协议等商业文件也早已准备妥当。总之，一定要让对方认为自己是有实力、可信赖的资深商人。格林曾经在上海工作过，对中国的情况比较了解。这时施贵宝高层十分看好中国市场，准备大举进军，花旗银行副总的推荐，使他们对广大华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舒自清还在格林太太的生日Party上，赠送了真丝领带、金表、金首饰等重礼，格林表示，要向上级力争把中国的代理权交给他，决不放过这个互利互惠，赚大钱的机会。

两周以后，国际部总经理魏克约舒自清面谈合作事宜。这是施贵宝公司的重量级人物，只要他点头，事情就成了。舒自清在会面前详细了解了他们对中国市场的战略、要求合作者的条件、预期的利润目标、将采取的销售方式、与合作伙伴的分成等等，并对魏克的资历业绩、性格爱好、工作作风

进行了考察，有针对性地准备了好几套谈判方案。他详尽地向魏克介绍了广大华行及中国市场的情况，强调他们是按照西方的经营理念运作，早已形成遍布全国的销售网，有实力、有信誉，业绩卓著，如果合作保证每年生意可以做到百万美元以上，纯利润不会少于五十万。他的发言深深打动了这位老谋深算的商人，双方合作的意向基本肯定了，但是关键的利润分成却迟迟没有提及。舒自清心里很着急，表面却装得若无其事。他了解到施贵宝有一批存货盘尼西林，正是国内奇缺，要用金条来换的特效消炎药，就主动提出马上购买十万美元的药品。魏克当即拍板，把施贵宝在中国和东南亚独家经销西药的代理权交给舒自清，每单生意给他百分之十的代理费。这和他心中百分之十五的比例有相当差距，但是看来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了，舒自清仔细权衡利害后，认为不能错过机会，来日方长，等买卖做大了，还怕他不涨代理费吗？1945年12月，广大华行美国分行与施贵宝公司签订了正式合同，舒自清马上买进了十万美元的盘尼西林和其他药品。他的公司在纽约崭露头角。

## 打败宋子文，驰骋华尔街

正当春风得意的舒自清包了专机，把第一批西药紧急运回国内时，在上海亚细亚大厦的广大华行总部，却发生了一桩离奇的盗窃案。价值五万美元的金砖和美钞，本来严密封存在总经理办公室的保险柜里，一夜之间统统不翼而飞。这是为中央领导参加政协会议准备的经费啊！当时把卢绪章急得团团转，他要求警察局迅速破案，又向各分公司十万火急调头寸，还要严防消息传出引起市面恐慌。就在他一筹莫展之际，接到舒自清药到上海的电报。卢绪章喜出望外，马上在报刊电台猛登广告，还派人把大街小巷都贴满花花绿绿的“盘尼西林真灵”、“维他命保命丸”等宣传标语，霎时间茶楼酒肆人人议论广大的美国新药。不出一周，药品全数卖出，光盘尼西林就赚了十万美元。

美国分行与施贵宝皆大欢喜，舒自清没费周折地就将代理费提高到百分之十五。接下来的几笔生意总额达到了一百万美元。舒自清意气风发，充满了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豪情壮志，又把眼光转向了钢铁、化工、机械等领域，还在留美的学



者中广招人才。总公司的订单源源不断涌来,美国厂商也纷纷上门接洽业务,舒自清又与杜邦、摩根等垄断财团做成进口化工原料、五金等数量可观的买卖。公司名声大振,搬到华尔街120号。野牛是华尔街的图腾,任何公司如果能挤进这里,就是成功的标志。在美国,名声和信誉是一笔宝贵的无形资产。这时,舒自清领导的美国分行再也不是默默无闻的小角色了,他们可以堂而皇之地贷款,赊账,用别人的钱生钱,再美美地大赚一笔。

1946年夏天,美国分行的西药生意如日中天,横扫了中国市场,使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也眼红起来。他托美国前国务卿史坦汀·纽斯向施贵宝的老板要中国的代理权。魏克故意把消息透露给舒自清,使舒自清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他装出不在意的样子反问:“你们了解宋子文的官僚公司吗?我听说蒋总统对他很不满意啊!而且中国政局要大变了。”几句话击中要害,魏克表示:宋是搞政治的,舒是有力量的企业家,我们相信你。但是却打算乘机压价。舒自清针锋相对,要求把代理费提高到百分之二十五。魏克愣了片刻气急败坏地说:“舒,你有没有搞错?连宋都得来求我们呢!”舒自清气定神闲地提出,可把今年的生意做到五百万,最后不但如愿以偿,还免除了广告费。

他一鼓作气,不但做进口生意,又开始向美国出口大豆、桐油、猪鬃、肠衣等中国土特产,也获得了丰厚的利润。为了扩大影响,他经常在公司租用的豪华公寓里操办酒会,打牌、跳舞,招待美国商界大佬,华侨领袖,社会名流,国民党去美国的党政军警特高级官员,及中国工商界赴美的巨子。一时间他和美国分行声名远播。大家都认为舒自清有实力、有后台,是新兴的买办大资本家。

为了保密,舒自清和中共地下党没有横的联系。当时中共美国支部领导人司徒慧敏曾向组织汇报,说舒自清是四大家族的忠实走狗。解放初期,他在地下党领导人刘少文家里碰见了舒自清,十分惊愕,刘少文为他们介绍说:“司徒,这就是你向我报告的四大家族的人啊!”在座的同志都哈哈大笑起来,司徒慧敏这才知道舒自清也是共产党。

1946年圣诞节前夕,舒自清在著名的希尔顿饭店举行盛大酒会,招待各界头面人物、新闻媒体、国民党领事馆官员及访美的军政要人。美国出口委员会主席举杯即兴发言,称赞他年轻有为,善

于把握机会,国际贸易做得非常出色,与会者报以热烈的掌声。酒会非常成功,又提升了广大华行美国分行的社会地位,扩展了影响力。不久,总部接到舒自清的报告:“美国分行生意总额一千万美元,利润二百万美元,净资产翻了十番……”在那时这是很了不起的巨大收益。大洋彼岸送回的钱和物马上被投入到日益激烈的人民解放战争中。

正当舒自清的事业达到顶峰之时,接到了美国征兵局要他去服兵役的命令。按照法律,在美国的中国公民也要到前线去当兵。舒自清非常着急,因为离开一天,就会损失数万美元。他托国民党《扫荡报》驻美记者沈杰飞,利用进出白宫、联合国的特许证,找到征兵局局长罗希礼中将,请求撤销这道命令。几经周折,最后从国民党驻联合国的军事代表团,开出一份舒自清在中国参加过抗战的证明,避免了重大的损失。

上级指示要在纽约搞一个地下接待站,安置去美国的同志。舒自清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妻子黄雨清。经过调查比较,他们买下一家中餐馆“羊城酒家”。楼下开饭店,楼上可以住宿。在美国开餐馆很不容易,要与当地的香堂、黑社会搞好关系,羊城酒家就曾经因为没交保护费而被砸坏数次。还得排除地方帮派的干扰,例如店里的广东帮和福建帮就势同水火,互相拆台。当时黄雨青已经怀孕数月,每天坚持上班十几个小时,任劳任怨,与丈夫配合默契。她出身名门,美貌多才,思想进步。舒自清的厚道、开明和才干深深打动了她的心,使她义无反顾地与丈夫同甘苦、共患难。

本来舒自清还准备投资实业,在美国轰轰烈烈大干一场。后来国内解放战争发展迅速,党指示他暂时收缩而没有继续。1948年底,由于地下党高层出现叛徒,第三条秘密战线的同志有暴露的危险,12月17日,舒自清按组织的命令撤到香港。临行前他满怀深情地抱起几个月的女儿对妻子说:“如果三个月后还没有我的消息,你就自己把孩子养大吧!”

#### 四.新中国的外贸专家,含冤受屈丹心不改

在美国的四年中,舒自清以丰富的贸易和财会经验,高超的英语水平,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

在复杂多变的国际政治和贸易环境中，独当一面，充分利用各种社会关系，打通多条贸易渠道，为我党举行国共谈判和政协会议提供了宝贵的外汇；并向国内进口大批西药和其它急需物资，为新中国的创建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一些在他身边工作过的人，深受他的感染，后来也追随他回来，为建设新中国出力。纽约分行副总经理高平叔，一个留洋的经济学家，就曾经感慨万分地说：“真没想到老舒也是共产党，如果人人都像他那样大公无私，一心为民，中国就有救了！”

舒自清回到香港后，担任华润公司总经理。他把自己在广大华行担任副总经理的股份红利十万美元全部交了党费，还说：“我是为革命才回国的，不需要一分钱存款！”为了打破禁运，支援抗美援朝和国内建设，舒自清夜以继日地做了大量工作。战争结束时，他主动放弃了海外优越的生活条件，回到国内，在外贸战线上又做出了新的成绩。他是一位精明的外贸专家，在商场上往往屡出奇招，克敌致胜。中国的猪鬃大王古耕虞，曾经称赞舒自清是“商业奇才”。在建国初期他就提出，应该扩大对西方国家的出口，以及举行广交会的创意，并为实施这个战略付出了辛勤的汗水，此举为我国贸易走向世界奠定了基础。由于出色的业绩，组织上选派他参加万隆会议的筹备工作，为促进与亚非国家的经济交流，他埋头苦干，不负重托。

虽然工作上舒自清得心应手，可是政治上却屡遭挫折，每次运动都成为“运动员”，还怀疑他有经济问题。审查的结果：舒自清虽然手上有过成千上万的黄金美钞，却始终一清二白，甚至连他应得的金钱也交给了组织。尽管如此，舒自清还是遭到歧视和打击。三年困难时期，被下放到农村劳动，他仍然毫无怨言，对党充满了信心。

60年代，他到中央调查部担任美国研究所所长。文革中，由于舒自清夫妇的特殊经历，被造反派当作“美国特务”批斗得很厉害。不久，他们被秘密关进北京市秦城监狱。造反派说，因为舒自清是孔原的人，孔原是周恩来的人，舒自清又是周恩来派到美国去的，所以康生同志亲自批示抓捕。舒自清被当作“政治重犯”单独关在小囚室，日日两餐都是菜汤、窝头，根本填不饱肚子。冬天屋里冷得像冰窖，为了保持足够的体力，他坚持每天跳踢踏舞锻炼身体。看守开始对舒自清十分严厉，后来发

现他乐观开朗、很有学问，就渐渐转变了态度，有人还偷偷跟着他学英语。舒自清在坐牢的五年里重新系统学习了马恩列斯的原著，特别是《资本论》，出狱时光读书笔记就装满了一麻袋。

1972年10月，周恩来总理指示要落实干部政策，形势稍有好转。1973年1月，黄雨清已报病危七次，舒自清的身体也很不好，在许多老同志的帮助下，他们以“保外就医”的名义被放了出来。虽然头上仍然戴着沉重的政治帽子，没有工作，妻子濒临死亡，孩子四分五散，舒自清仍然急切地关注着我国的经贸工作。他曾设想，要用外国的钱来办中国的事情；在一些地理位置合适，条件较好的地区，不妨实行特殊政策，吸引外资推动当地的经济发展；建立跨国公司，采用西方经营理念，融入世界经济大潮，使我国外贸工作与国际接轨……这些超前的观念难能可贵，但在当时还不可能实现。

1976年10月“四人帮”倒台了，舒自清也获得第二次解放。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他的才能有用了用武之地。在外贸部担任国际贸易研究所所长时，他凭借娴熟的外贸经验，利用信贷和买卖期货操纵国际糖价，一举为外贸部赚了二亿美元，这在改革开放初期确是了不得的成绩。他还广泛收集外贸信息，编纂报刊，后来成为各省领导人重要的招商引资、进出口贸易的信息来源。还为国家培养了大量急需的高素质外贸人才。江苏、深圳、海南、宁波、厦门、上海等处，都能见到他活跃的身影。国务院的领导同志对他在建立特区、引进外资等方面提出的首创意见非常重视。他当年的一些部下，现在早已成为亿万富翁，舒自清利用这些老关系，促成了许多中外商贸项目。他又提出融资建立跨国公司，为国家挣大钱的设想，可惜由于各种复杂因素未能实现。1988年离休后，他仍然离而不休，为开发经济、吸引外资积极出谋划策。

1989年6月7日，联合国准备在芬兰赫尔辛基召开国际关贸会议，舒自清为参加会议亲自写了发言稿，力主中国加入WTO，并雄辩地阐明这不但对中国有利，更对世界有益。可惜壮志未酬，便于6月1日中风倒下，没能成行。身患重病后，他还念念不忘地关心外贸体制改革和加入关贸协定的问题。1996年5月1日在弥留之际，他颤抖地竖起两个手指，对未竟之事深表急切与遗憾。

(责任编辑 李 晨)

# 我的极左经历

吴思

假如四人帮在权力争夺中获胜，极左派的命运会有什么不同？

尽管高层权力斗争风云变幻，最终决定一种社会理想成败的，还是它在社会基层的可行性。极左派在文革中推行的农村政策是：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大寨模式可行，极左派的理想就可行。大寨模式行不通，极左派早晚要退出历史舞台。

文革末期，我在学大寨的最前沿，在极左翼，向更左的方向冲锋，亲身体会到极左派前进的艰难。极左派名声不好，他们的视角很少被顾及。不过，我在左翼受挫的经历，对我理解晚年毛泽东的失败和中国极左势力的衰落大有帮助：我的焦头烂额之处，也是他们举步维艰之地。

## 一、义务劳动受挫

下乡插队之前，我在中学当了几年团支部书记，按照列宁在《伟大的创举》中的教导，多次组织过“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到农村后，我接任第三生产队的团小组长兼青年突击队队长，又把“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搬到了农村。

我们村口的南山上有片荒坡，第一次义务劳动就是在荒坡上刨坑栽树，建一座“共产主义青年梨园”。1976年4月一个星期六的傍晚，收工之后，我们青年突击队四十来人义务劳动两个小时，种上六七十棵梨树。这是我们村历史上头一回搞义务劳动，大家很好奇，连在校学生也跑来参加。效率高，干劲大，挑水爬坡都是一路小跑，义务劳动大获成功。

初战告捷，按照当时的俗套，我作《流汗歌》一首，发在黑板报上。诗写得很矫情，把符合正确路线的一分情绪夸张地感受为五分，表达为十分，努力自我感动并感动别人。

在胜利的鼓舞下，我又有了更宏大的设想：将不计报酬的义务劳动，从每周一天逐步增加到两天三天，最后取代有报酬的劳动。在我们生产队，

然后在我们村，率先实现共产主义的劳动分配形式。这种设想的理论基础是：按劳分配是一种“资产阶级法权”——给多少报酬出多少力，以人们的私心为基础，助长雇佣劳动思想。不计报酬的义务劳动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萌芽。我的计划比大寨还要左。大寨当时的劳动报酬形式是“一心为公劳动，自报公议工分”；被后人讥为“大概工”；但劳动报酬与劳动态度和劳动成果多少有一些关系，因此就残留了雇佣劳动的痕迹。我打算消灭这点痕迹。

一周后，我组织了第二次义务劳动，人数稍减，但干劲也不小，补栽了三十多棵梨树，给上次栽的树浇了水。公社广播站很快就在大喇叭里表扬了我们青年突击队，还提到我的名字。

第三四次义务劳动，分别给苹果园和梨园浇水。众人的新鲜劲渐渐消退，参加者越来越少，有事请假的越来越多。列宁在《伟大的创举》里提出过一个设想：共产党在取得政权之后，如何判断入党积极分子的动机是否纯正？他建议把“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作为一面筛子。经受住半年以上考验的，才能吸收入党。党员经受不住考验的，还可以清除出党。这个想法当然不错，可是，把这面筛子用到我们生产队，恐怕过不了多久，筛子上边就剩不下几个人了——说不定只剩我一个。进一步说，我这个剩下的孤家寡人，动机是否纯正仍然成问题：我能经受住较大的考验，到底是因为我热爱劳动或热爱人民呢，还是因为我有更大的野心？

一天晚上，我召开团小组会，讨论义务劳动中出现的问题。我猜想，大家的新鲜劲过去了，再往下走，必须调动蕴藏在青年心中的更深刻的精神力量，启发大家的觉悟，读书学习，思考人生的意义，树立人生榜样，等等。没想到，这个会成了对我的批评会。几位团员在会上联合指责我，说大伙热情衰退的主要原因就在我身上。我利用了大伙，干活是大伙出力，出名却是我个人的。大家不愿意继续被我利用，成为我捞取个人荣誉的工具。



这种指责是有道理的。毕竟公社大喇叭只点了我一个人的名字，其他人的面目模糊为一个集体。从结果看来，我迅速得到提拔重用，这种说法也可以得到支持。但利用大家捞取个人荣誉确实不是我的初衷，至少我没有意识到这种动机。我意识到的就是前边描绘的宏图大略。至于我想在实现宏图大略的过程中捞取什么私利，这一点不妨讨论，我也有兴趣加深自我认识，但我肯定不认那笔小账。我的抱负或野心没那么小，不在乎大喇叭表扬之类的蜗角虚名或蝇头小利。稳定军心，稳住阵脚，哄着大家死心塌地跟我走，更符合我的长远利益。

问题在于，我不在乎，人家却觉得亏了。而且是精神物质双双亏损。我刚来，根基尚浅，会上没有一个人替我说话。

按照党团生活会的规矩，我必须先作自我批评。我很想在自我批评之后发动反击，说他们试图逃避义务劳动，用对我的指责掩盖自己的懒惰和自私，掩护自己临阵脱逃。但是争吵起来，公开决裂，以后的义务劳动就更难组织了。这种仗只能由别人替我打前锋，我本人出面属于赤膊上阵。于是，我更加广泛深入地征求了大家的意见，做了自我批评，深挖了个人名利思想，重新部署了黑板报小组的宣传工作，请大家今后对我多多批评监督。原定议题取消，下一次义务劳动也没有安排。

几天以后，我被任命为生产队副指导员，进入生产队领导班子，团内职务由别人接任。我的极左宏图也不了了之。

我感觉松了一口气。当时有一句话流传颇广，据说还是毛主席说的：“在命运的迎头痛击下头破血流但仍不回头”；我把这句话抄在笔记本上自我激励。这次及时的提升，免去了我预感到的一连串头破血流的失败。

当然，这种分析已经是事后诸葛亮了，那时我并未深想。现在深究起来，我感觉松了一口气，就是因为我朦胧地感觉到，“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这棵幼芽在我们团小组内难以存活，更长不大。这还没涉及什么大东西呢，无非是一两个星期拿出两个小时，还有公社大喇叭里的那点荣誉分配，同志们已经摆出一副决裂的架势。这点东西尚且不能承担，一旦人数扩充到整个生产队，时间扩大到每周三五个工作日，关系到半数以上物质利

益的分配，那时，列宁在《伟大的创举》中寄以厚望的“劳动群众本身自由的自觉的纪律”；又如何担当得起？我们心里究竟存在多少支撑这种自觉纪律的“伟大的英雄主义”？

列宁指望那种奋不顾身的英雄主义能够战胜小资产阶级的利己主义，在革命精神基础上建立的劳动组织能够创造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因而取代资本主义。但在我发动的实战中，不过几个回合，英雄主义就败于利己主义，青年突击队也面临散伙的危险。当然，将来我可能更老练，根基更稳固，大权在握，手下有人打前锋，还可以动用强制手段，让反对者不敢说一个不字。不过，在那种情况下，维系义务劳动的还能算“自由的自觉的纪律”吗？

## 二、向自留地让步

我第一次和贫下中农打架是在1976年5月上旬。生产队的麦子正在浇灌浆水，社员自留地的土豆还在旱着。谁浇谁不浇、早浇或晚浇，与收成关系甚大。当时队里的三级扬程水泵老出毛病，我敢拆敢修，又是生产队副指导员，便由我负责带着一帮社员日夜轮班浇麦。

我主张先集体、后个人，集体的麦子不浇完，不向自留地供水。

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看来，自留地是资产阶级法权在所有制领域的残余，在此基础上，小生产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必须时时加以限制。我信奉这套理论。

开头几天，有一些社员向队委会提意见，抱怨自留地浇不上水。指导员和队长向我转达了意见，我用几句大话将他们顶了回去。但形势一天比一天严峻。渠道常被扒开，社员偷偷截水浇自留地。有一回，麦田里的社员很久等不来水，顺着渠道巡上来，发现有人扒水又不敢制止，就找到我，说断水了，让我查查原因。我顺着水渠往下走，看见大队书记的婶子在扒水浇自留地，就上去训了她一顿，堵上口子。她骂我祸害贫下中农，我骂她给贫下中农丢脸，偷大伙的东西。这种事情时常发生，浇麦进展缓慢。

为了打退小生产的进攻，我发动了舆论攻势。

我借助团支部的力量，召集本队团员和青年积极分子开会，讨论用水中的两条路线问题，还在黑板报上发表小评论：《危险的口子》，再通过大队的大喇叭广播出去。

这种从报纸上学来的招数不太管用，夜里总有扒口子的人。我在明处，扒口子的人在暗处，再说我也不可能一天24小时不间断地巡渠。负责浇麦子的社员怕得罪人，既不巡渠，断水了也不报告，我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再往后，浇不上水的社员愈发急了。一天下午，我在巡渠时看见一位年近四十的正牌贫农扒水浇自留地。我过去制止，他先说好话，不管用，便骂我不顾贫下中农的死活：“你们知青有饭吃，就往死里整我们贫下中农！你干脆一铁锹劈死我得了！”说着还伸过头来。我看说空话没用，便自己动手堵水渠，我堵一锹，他扒一锹，你来我往，演变为推推搡搡，我脚下一滑，一个趔趄跪在一块尖石上，当时膝盖就肿起来了。那汉子怕事，立刻住手，仓惶退走。我又一次得胜，一瘸一拐地回去了。

我摔瘸了的故事很快就传开了。于是，大队书记出面，召集贫下中农协会开会，众人纷纷发言，痛斥那位扒水的贫农：你爹咋死的？忘啦？——他父亲看见日本鬼子进村，心里害怕，拼命往家跑，日本人让他站住，他照跑不误，结果让日本兵一枪打死了。——那会儿你咋不敢闹？现在，人家北京知青到咱山沟来，受这么大罪，还不是为了咱们好？你倒敢闹啦？如此这般。那贫农点头哈腰，态度诚恳，连声认错。大队书记给我撑直了腰，做足了面子之后，当场任命我为贫协小组副组长。

我当时多少有些疑惑，贫下中农协会这么有威信？忆苦思甜这么管用？我们打起来他都不让步，一提他父亲的死因立刻就觉悟了？后来，处理过几次类似冲突之后，我才明白他真正怕什么。按照村里的常规，两人动起手来，一旦有人受伤，就可以让对方赔一笔医药费和误工补助，外带探视赔礼必须携带的点心匣子。看不出伤来，尚且要装病开药讹他一笔，像我这样膝盖肿得老高，换了普通社员，至少要扒他一两个月的工分。我是知青，如果回家休养，再加上路费，那费用就更没谱了。



作者（右一）在知青队门前

事情闹大以后，一直不爱管事的指导员也召开队委会，专门研究用水问题。我说了自己的观点，主张先集体后个人。队长并不和我正面争论，他说我的主张是对的，但毛主席让我们关心群众生活，贫下中农的吃菜问题也应该重视。再说，分给社员自留地也是毛主席的政策，地分给人家了，就不能不让人家种，不能不让人家浇水。他建议白天集体浇麦子，夜里社员浇自留地，谁先谁后，由抓阄决定。队委会七个成员，六个同意他的意见，我只好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

话说回来，我不服从又能怎么样？腿脚灵便时尚且把不住水，现在瘸了，我更不能不识抬举，与所有人敌。

后来，我当了生产队的一把手，有权一个人说了算，再遇到类似的情况，照样被迫让步。假如不让步，迫使人家执行我的命令，就等于逼着人向我辞职。我们生产队方圆五六里，沟壑纵横，数千棵干鲜果树，大大小小数百块粮田，哪面坡上的哪棵树果子该摘了，需要几个工，哪块田该锄了，需要几个工，这些知识我不懂，没有多年经验的积累也休想掌握。队长一撂挑子，我就抓瞎了。就算我本事大，什么都懂，我也只能带一拨人干活，其他生产小组，老人妇女和各种专业队，如果没有干部招呼着，众人能在地头一坐一整天，根本就别指望出活儿。我本想让社员多为集体做贡献，如果干部撂挑子了，大家全在地头坐着，岂非求益反损？

### 三、社员激励机制的缺口

农民对集体大田和自留地的亲疏是可以计算的。

刚插队的时候，我对农民普遍偷懒的现象很不理解。按照当时的意识形态信条，工人农民爱国家爱集体爱社会主义，不应该偷奸耍滑。我问一位贫农为什么不好好干活，他反问道：“有我多少？”这话我听见了，但没有往心里去。十几年之后，我才领悟了这句话的深意。

我们第三生产队有57户人家。假设每户人口劳力相等，在集体的大田里，我刨57镐，才为自家刨了1镐。反过来说，我偷懒少刨57镐，自家才损失1镐。这种体制极其有效地激励偷懒，同样有效地惩罚劳动。自留地则不然。那里的每一镐都是为自家刨的，真所谓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动者不得食。对我们生产队的社员来说，自留地对劳动积极性的激励效率是生产队的57倍。结果，自留地和庭院仅占总耕地面积的7%左右，但社员像绣花一样精心伺候，每年收获的烟叶粮食和蔬菜，价值将近家庭总收入的三至五成，能与生产队90%多的耕地分庭抗礼。

我们生产队的激励效率只有自留地的1/57，这还算好的。1958年人民公社兴起的时候，规模动辄万人，连生产队和大队的干部都不用对劳动成果负责，结果闹出了一场大饥荒。饥荒迫使极左派撤退，在“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一线构筑防御工事，同时伺机反扑。大寨大队和昔阳全县取消“三自一包”，实行大队核算，又把前沿推进到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中线阵地。大寨大队80户人家，从物质刺激的角度看，其激励效率只有自留地的1/80，还不如我们生产队。

总之，如果把自留地比作社员的亲儿子，集体大田就是50竿子甚至80竿子打不着的远亲，其疏远程度如同陌路。

顺便交代几句：我没有计算工分差别对劳动者的激励作用，因为这种作用在我们村并不存在。名义上说是按劳分配，实际是按年龄和性别分配。男壮劳力一概评10分，女壮劳力一概评8分，老人孩子根据年龄体力评4至8分，地主富农比正常标准低一档。真实规则偏离名义规则，是因为这

样做阻力小，就好像现在评职称，论资排辈，评委会只卡硬条件，否则就难免纷争大起，既得罪人又摆不平事。我一度不知深浅，试图打破这套不分好歹的规矩，把一位敬业的老饲养员从八分半提高到十分，结果孤军奋战，在队委会上几次争吵，只给老饲养员争到9分。老饲养员感到社会压力，私下找我，求我别替他争了。

对比自留地和大包干，大寨模式在激励机制方面存在如此巨大的缺口，农村基层干部如何弥补呢？常用的办法有三种。

第一种，以身作则，道德感召。

普通社员刨57镐，我刨87镐，107镐。我让你们占我便宜，你们好意思吗？有不好意思的，自然会多刨几镐。大寨的陈永贵，大寨大队的几个党支部，尤其是贾进财，都是这么干活的。这种感召是有效的，只是效果不那么可靠——它不仅依赖干部行为的感召力，还要依赖众人良心的敏感程度。

我和附近公社的一位先进知青聊过这种作用最佳状态。他讲了一个故事。他们公社有一个村，队长干活拼命，为了集体不顾家，结果和老婆打架，老婆喝农药自杀了，丢下四个孩子。他们队里的社员特别感动，不用招呼就出工，干活全不惜力，谁偷懒大家就骂他没良心。收工后大伙还轮着去队长家带孩子，替他种自留地，帮他家打的柴禾堆了一房高。我们两人唏嘘之下，笑叹自己没有老婆，想感动大家不知还要等多久。

第二种，思想教育。

思想教育也有两个层次。所谓提高阶级觉悟，无非是让众人认清自身利益与集体利益和国家利益的一致之处。这种以物质利益为基础的教育，说到底，避不开1镐与57镐的关系问题。算得越透彻，偷懒越有理。假如人家偷懒而我不偷懒，一位社员反问我：那不是让人家剥削了吗？这是第一个层次。在这个层次上我们算不赢偷懒的社员。

第二个层次，倡导“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创造共产主义新人。毛泽东试图培育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公而忘私、大公无私的共产主义新人，“对工作极端地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极端地热忱”。

在蜜蜂和蚂蚁的社会中，这种个体确实存在，但一个社会性昆虫群体其实只是一个繁殖单位，



近似于人类的一个家庭，而不是血缘关系疏远的一个生产队或一个村庄。工蜂工蚁与本群体姐妹的基因重合率达到75%，而人类的父母与儿女之间、兄弟姐妹之间的基因重合率不过50%。蚂蚁蜜蜂的献身精神是有生物学基础的，正如人类对家庭和亲人的关爱也是有生物学基础的。拥有这种利他精神的物种可以在进化中获得竞争优势，从而保住甚至扩大自己的基因分布区域。极左派鼓吹以社会阶级为基础的献身精神，而社会阶级并不是遗传繁殖的基本单位。极左派的这种企图，简直就是要创造一个连“造物主”也不知如何设计的新物种。

当然，毛主席说了，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人类确实有一种精神力量，问题在于，在激励机制的缺口中，这种精神力量顶得了多少镐？顶三五镐还是57镐甚至80镐？在我们生产队，平均而论，这种不在乎回报的纯精神力量，似乎连三五镐——缺口的7%——也顶不上。极左派坚决反对一切利用人类利己之心的政策，说那是调动私心，因此狠批物质刺激，禁止各种承包制度，迫使基层干部集中力量创造共产主义新人。如此极端的政策，固然符合两种激励机制的竞争逐步升级、走向破釜沉舟的逻辑，但也意味着关闭93%的能量，依靠7%的能量推动农业生产。结果，产品严重匮乏不说，在我的感觉里，那7%的精神力量也被折腾得筋疲力尽，历尽摧残之后，剩下的还不足3%。

#### 第三种，政治压力。

所谓政治压力，对我来说，主要体现在大庭广众之下训人。大家干活的时候，如果有人站着聊天，半天不动弹，我就吆喝一嗓子：“动弹啦动弹啦，要聊回家聊去！”再严重点，就在出工前不点名地警告一番。“有人思想成问题啊。我数了，一上午锄草不到二百下！一分钟还锄不了一刀！给谁干呢？给你自己干呢！你偷懒，不是剥削大伙嘛！再不自觉，咱们就拉出来说！”如果有谁反抗，顶嘴带脏字，我就狠狠扣他的工分。我对社员如此凶悍，以至我们队的小孩哭，当母亲的会拿我来吓唬孩子：“哭，哭，再哭吴思来啦！”

当然，作为平衡，也要经常表扬劳动态度好的社员。

保持政治压力，我认为是填补缺口的主要手段。以我们生产队而论，那56镐的缺口，假如以身

作则和道德感召的力量可以补上6镐，思想教育可以补上4镐，政治压力就可以补上16镐甚至20镐。于是26镐至30镐有了着落，剩下的26镐到30镐则难以弥补，体现为怠工造成的净损失。

这种估计，用来解释大寨，肯定低估了政治思想和干部带头作用的力量。大寨的社员很少怠工。但用这个比例解释我们生产队，解释全国的情况，未免过分乐观。大包干之后，农村劳动力大量外出，留在家里的人，劳动质量明显提高，劳动时间却大大缩短，由此可见，公社体制下怠工的净损失不止一半。

八亿农民怠工，中国受不了，全世界都受不了。极左派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没有能力弥补激励机制的缺口，就守不住集体经济的阵地，更别提继续前进了。

## 四、干部激励机制的缺口

算到这会儿，一个新缺口出现了：那些以身作则、进行思想教育、维持政治压力的干部，他们的动力来自何方？普通社员激励机制的缺口靠他们勉强补上了一半，但在这一半的背后，补缺者自身的激励机制，也是千疮百孔，随时有瓦解的危险。

我当生产队指导员的第一年，平均每两个月，生产队长向我辞职一次。其他五位队干部也穿插其间。撂挑子的原因很多，为了省事，仍旧以水渠为例。

有一天，大队书记的堂兄忽然将通过他房后的水渠拆毁，几十亩麦田的封冻水没法浇了。他说水渠渗水，把他家的房基涵了，要求队里挖地三尺，用水泥浇筑这段水渠。我们去他家看了，一丝水痕也没有，为了这种莫名其妙的担心，就要断水半个月，大量耗费贵如面粉的水泥？生产队长认定大队书记支持他堂兄刁难自己，立刻找到我，宣布辞职。

这位生产队长年近五十，是个心高气傲的人，农活很好，自留地和庭院收拾得妥帖至极。他看前任队长一而再，再而三地撂挑子，什么事也扛不住，多次耽误队里的农活，心里有气。所以，我请他出山，一探口风就觉得有戏，按常规三顾茅庐之后，他就接手上任了。没想到刚上任就遇到了这种挑战。

拆水渠的汉子大约三十六七岁，精灵鬼怪，好讲三国，是我们生产队的人尖子。新队长也是人尖子，便有了几分竞争关系。新队长不肯受他的气，所以一遇挑战便派人去硬修断渠，那汉子干脆往断渠上一躺：要动家伙就往我身上招呼。派去修渠的石匠自然不肯为了队里的事打架，就找了队长，队长又气哼哼地找到我，说这是受大队书记的指使，没法干了，宣布辞职。其实他夸大了挑战的来头。大队书记私下跟我说过不少新队长的好话，请他出山当队长也是大队书记的建议。

我上门问那闹事的汉子，为什么早不闹晚不闹，队长刚上任就闹，是不是对人家有意见。汉子说，早就想闹，看前任队长溜肩膀，怕吓着他，就忍到现在。新队长不是本事大吗，怎么也这副德行。现在想来，这话其实也是斗气。庄稼急用水的时候他不敢断，怕激起众怒。庄稼不用水的时候，我们又不怕他断。浇可有可无的越冬水之时，最是打劫的好机会。结果，僵持数日，经过四五次往返谈判，闹事的汉子放弃挖地三尺的要求，只要用细水泥把他屋后这段水渠抹上一层，就容许过水了。

此事解决了，队长的心却凉了，死活不肯再干。于是，我又拿出对付前任队长的老办法，吃过晚饭就到他家做“思想工作”。其实也没什么可说的，翻来覆去就那么几句话：“大伙的事，都不干谁干呢？你也不干我也不干，秋后大伙喝西北风？”然后就端过他家的烟筒卷大炮，喝他家的茶，有一搭没一搭地闲扯几句，每天熬他到半夜，按照常规，熬到第五六天，再坚决的人也会答应继续干。遇到特别顽固的情况，我还会拉上其他队委会成员，甚至拉上大队书记，一起做他的思想工作，一起去熬他，轮流去熬他。

按照左派的革命逻辑，干部干部就是先干一步，除了责任义务和指挥别人的荣耀，当干部几乎没有物质方面的好处，全凭革命精神的支撑。在那57镎里，他们只有1镎，但他们却要晚上开会，处理琐事，白天操心安排农活，带头多干，督着别人多干，不时还要干点堵人财路的事，得罪几个路子多的能人。这就意味着，他们付出了两到三镎，所得只有1镎。他们让普通社员搭了便车。

当然，干部偶然也能在招工招生等好处出现时优先一把，但那不是主要因素。如果特权多、待遇好，就像大公司高薪雇佣管理人员一样，也可以

构成强大的激励体系，但这条路与文革的理想背道而驰。当时正在抓“党内资产阶级”；“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主要罪状就是利用特权搞腐败。众目睽睽之下，那时的特权收益比现在少得多，在干部比普通社员多付出的10镎中，平均起来，特权未必能抵偿两三镎，缺口依然存在。

地主和资本家都有足够的动力监督雇工的劳动，正如雇工也想方设法逃避监督一样。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双方对利益最大化的追求构成均衡，维持着经济的运行。但是，地主资本家监督管理的动力来自剩余索取权，监督带来的收益完全归他们自己，亏损也要由自己承担。这种物质利益的奖惩机制是有效的，但被视为资本主义道路。在大寨模式中，干部监督管理的收益全归大众，他本人的收益主要来自精神和社会地位方面的荣耀。那么，干部的社会地位、当干部的精神愉悦和指挥别人的荣耀能不能补偿那些额外付出呢？这就因人而异了。

前任队长，开头觉得还能补偿，干得时间长了，荣耀和地位带来的愉悦淡化了，就觉得难以补偿了。干得越久，与怠工和占小便宜的社员的冲突就越多，对人性和自己的服务对象就越失望。最后，原来还有几分的同情心和责任感消磨殆尽，轻蔑和愤懑越来越重。队干部找我撂挑子的时候，往往会撂下一句狠话：“这帮东西，饿死他们也不屈！”

新任队长，支撑了大半年后，荣誉感同样淡化了，对前任队长缺少担当的义愤消失了，儿子又进公社农机修配厂当了工人，继续当干部的利益相对下降，于是，遇到一点小麻烦就辞职了。最后我请出一位有残疾的中年人接替他当了队长。如果我继续熬他，未必不能再使他撑半年，但我失去了熬他的兴趣。

和那些辞职的干部一样，我对人们的一般看法越来越坏，温情越来越少。开始，我希望自己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生活得彼此分不开，想他们之所想，急他们之所急，努力去热爱人民。当干部不过一年，有一天，偶然和其他公社的先进知青聊天，说到社员偷懒的现象，我咬牙切齿地冒出一句：“一群牲口，恨不得拿鞭子抽！”话一出口，心里一惊。我这是怎么了？本想热爱人民，怎么反倒滋生恨意？本想当人民的勤务员，怎么心里成了奴隶

主？我隐约感到有什么地方出了毛病。

## 五、反向改造世界观

这又扯出了我心里的一個漏洞。队委会激励机制上的缺口，由我这个一把手负责填补。我凑凑合合地补到60分及格的水平，但我心里的缺口谁来补呢？

按照毛泽东在《纪念白求恩》中的要求，“对工作极端地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极端地热忱，”这个漏洞似乎可以自我填补。就好像饿了要吃，渴了要喝一样，热爱人民就去为他们服务，从而得到自我满足。但在我的感觉中，这种纯情感的东西，在与工农大众的冲突中会逐渐冷却，缺口越来越大。靠爱和情感补不上。

我们村流传着一首顺口溜：“大队干部搂，小队干部偷，社员缝个大兜兜。”描述了众人踊跃占集体便宜的场面。如此描述有些过分。我的印象是，在正常年景，五分之一偷，五分之三搂，五分之一不偷也不搂。每到偷窃收益最高的季节，队委会就推出我当一个月的护秋员。我是外来的愣头青，敢得罪人。几个月护秋员干下来，每天想贼防贼，练出了一双贼眼。我每隔三五天抓一个贼，创造了我们村看秋历史的最佳战绩。所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在这种检验和调整之中，我的世界观悄然转变。多年之后，我接触到西方经济学对人的基本假定：人们理性自利地追求利益最大化。这个说法让我眼前一亮，好像揭去了看秋练出的贼眼的最后一片蒙子。

现在回首往事，我才意识到自己的世界观确实得到了改造，只不过和毛主席指引的方向截然相反。在贫下中农的教育下，我的眼睛和眼中的世界彻底改变了，从醉眼陶然的一片粉红，变得越来越像老鼠，善于在黑暗中发现利益和危险——贼眼贼亮。

回顾对农民感情的变 1977年10月，北京优秀知青参观团在昔阳“大寨展览馆”前留影，前排左六为作者

化，我还有一个惊奇的发现：当年的愤恨现在又变成了赞赏。过去，意识形态教条把工农大众描绘成精神最干净、关心集体、大公无私的圣人集团，抬高了 my 期望值，一旦失望就滋生恨意。现在，高调的意识形态转变为人类理性自利的假设，期望值已经降低，对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的憧憬也变成了对利益制衡体制的信仰。此时心态平和，把千方百计追求个人利益的行为视为当然，发现一点自我约束也知道珍惜。再看农民与统治集团斗智斗勇，包括当年与我斗法，妙手连发，不禁欣赏起他们的反抗策略。由此看来，现实主义培养同情和温情，理想主义反倒助长仇恨。

顺便提一下，我对工人阶级的感觉比对农民更糟糕。1974年，我曾在当时最革命的石油战线当过一个月的翻砂工，发现工人们每天只干三四个小时的活儿。我多干了，就有热心的师傅劝我注意群众影响：你这样干可能提高定额，连累大家，群众会对你有意见。后来我在大港油田干活儿，以中上等速度干两个小时，师傅就过来制止我们，说一天的定额已经完成。我大惑不解：号称最先进的领导阶级为什么也偷懒怠工？多年之后，我看到刘少奇在安源煤矿组织罢工的经历，工人得势之后，每天只干半天活，整得公司承受不了。李立三在路口拦截工人，不许他们早下班，工人就骂他是资本家的走狗，还动手打他，气得他大哭而去。刘少奇为此苦恼很久，还请教了来访的美国共产党领导





人,大家都不知如何是好。

跳出马列主义教条之后,我才闹明白一个浅显的道理:工人农民和地主资本家一样,每个阶级都在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种互相冲突的追求构成均势,社会因此正常运行。确实有自觉精神这种东西,但仅靠某个阶级的觉悟和自律是不够的。任何一家独大的格局都会损害全局并最终伤及自身。这种来自生活经验的认识就是我转而信仰利益制衡体制的根据。

随着世界观的悄然转变,我的浪漫情怀越来越淡,理性和算计深入骨髓,本来依靠理想和信念填补的缺口也进一步扩大。干部当到第二年,我隐隐约约地意识到,自身力量补不上那二三十镐的大缺口。我对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前途深感悲观。极左派描绘的共产主义理想越来越显得渺茫。我开始怀疑继续死撑下去的意义。

在真实的心理活动中,这个变化过程体现为拉锯般的冲突。革命热情逐渐冷却让我深感恐惧,便调动起全部力量与之对抗,精心呵护心中的每一颗火种,鼓起腮帮子吹出火苗。这时我写出了此生最革命的几句诗:“火红的党旗呼啦啦地飘!我们是党旗上的镰刀!我们的热血在党旗上燃烧!”我迫切需要用热情的大话给自己加热。

总之,靠精神力量或世界观改造补不上缺口。那么,靠行政升迁如何?

如果像国营企业那样,出色的管理者可以得到行政体系内部的升迁,这当然是有效的激励。不过,农村干部能够进入干部系列的概率极低。大寨出了一个政治局委员,一个中央委员,这种概率,在全国上百万个村庄里,连二十万分之一也没有。建筑工人的年度死亡率是十万分之八,这种死亡风险几乎不在职业选择的考虑范围之内,而成为中央委员的概率还不到这种不值考虑的概率的6%。对农民来说,成为公社干部的机会也小到了不值考虑的程度。一旦升官的概率低到一定浓度,激励就不再普遍有效。反过来,撂挑子,争取更多的闲暇,才是获得福利最大化的策略。这也是农村基层干部的实际选择。

结论:干部激励机制的缺口,靠行政升迁的路也补不上。

不过,这条路可以列入我的考量。我是知青,又是先进典型,从大队领导升到公社领导再升到

县委领导的概率远高于常人。我当时确实也如此预测自己的归宿。问题在于,追求升官的个人前程,还能算共产主义的人生观世界观吗?我想走这条路,到底是为了对革命做更大的贡献呢,还是为了个人的名利地位呢?我糊弄自己说,地位越高,对社会的贡献越大,这是为了革命。但我怀疑自己是自欺欺人,而且可疑程度超过六成。

假如毛泽东长命百岁,我在学大寨的道路上继续走下去,我会变成什么样子?

如果没有升官,如果我和农民一样需要养家糊口,大概用不了几年,我的肚子就会告诉我什么是真理。如果我因为学大寨积极而很快升官,恐怕我会继续与农民作对,加大向小生产进攻的力度,在更大的范围内割资本主义尾巴。

顺便插一句,我的升迁完全是由上级领导决定的。甚至在入党之前,公社副书记和大队书记就找我谈话,内定我为生产队指导员兼大队党支副书记,连群众意见都不必征求。继续听党的话,继续与农民作对,对我的升迁有益无害。

如果我在明白是非之后升了官呢?我会为了自己的前程昧着良心推行极左路线吗?我会像安徽凤阳县委书记陈庭元那样默许大包干吗?我不知道。官场也是改造世界观的好地方。

## 六、临阵脱逃

以极左的标准衡量,我的插队经历就是一连串的失败。青年突击队的义务劳动首先受挫,以共产主义义务劳动替代雇佣劳动的梦想破灭。限制自留地或曰资产阶级法权的努力以退让告终。建立坚强的领导班子的企图也一再失败。屡战屡败之后,我失去了发动进攻的锐气,和多数基层干部一样转入守势。

每年深秋,种完冬小麦后,县里都要开二十多天的三级干部会,简称“三干会”。先在公社开,再转到县里开,整党整风,建班子。我连续参加了两年,每年的重点都是解决干部撂挑子问题。在全国范围内,干部激励不足的问题普遍存在,年底便是干部撂挑子的高峰。我们听大量鼓动报告,接受上级给我们打气,学习先进典型,互相批评并自我批评,听革命前辈训我们没出息,听公社书记跟我们说好话,说大话,再集中解决几个让人灰心丧气的

难题。最后人人过关地表个态,承诺再干一年。那么,经过多年的筛选沉淀,什么人留在干部队伍里?

我们听过一个生产队长的报告,题目是《当队长有瘾搞管理没够》。许多有管理偏好的人,当领导感觉轻松愉快的人,组成了生产队干部的群体。他们有人特色的选择偏好降低了当干部的成本,提高了当干部的收益。只是这种人比例很小,经过长期沉淀积聚起来,也未必能补上激励缺口的两三成。

各级领导竭尽全力,只能勉强维持这种均衡。这是学大寨运动维持不垮的最后一道防线。这道防线漏洞百出,但最高司令部一轮又一轮地动员发令,干部队伍像环环相扣的战阵和各级督战队一样挺在那里,经受着八亿农民海潮一般扑向自留地的正面冲刷,经受着农民和农村干部大面积怠工在内部和背后的淘洗。

僵持之中,恢复高考了。

我曾经在公社大喇叭里放出大话:“招工不走,招生不去,永远扎根在贫下中农的心里。”这句话悄悄给升官的前程留了一条路,却完全堵住了进工厂和上大学的路。

一位和我同样肩负重任的知青朋友劝我:“我试着扎根了,但我发现贫下中农的心里是一片沙漠,你扎根其中也无法成活。”他考上了清华。可是我的大话余音缭绕,报名高考无异自打耳光。我咬紧牙关,不理父母的请求,不报名,不复习,默默抵制了那年高考。伙伴们在考场中答卷的时候,我正爬在树上打核桃。秋色西来,天高云淡,我胸中激荡着自我牺牲的悲壮感。

1978年,社会大变动各种迹象越来越显著,大队书记和公社负责知青工作的副书

记先后找我谈话,表示支持我参加高考。我表面上显得不太情愿,答应考虑考虑,暗自却高兴有这个就坡下驴的机会。我自欺欺人地想:上大学也是为革命,本事大了可以对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

那年夏天我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一所我认为最具理想主义和革命精神的学校。考分到达村里的时候,正是护秋的季节。人们大呼小叫地找到我,说我的考分特别高。我半信半疑去大队广播室看了成绩通知单,果然远远高于录取线。我心中一阵狂喜,却故作镇静,不紧不慢地踱回宿舍,提了镰刀,按照往常巡山的路线出了村。走到荒僻处,终于按捺不住,一口气跑上十几层楼高的山梁,毫不气喘,兴犹未尽,又蹦了几个高。平静下来后,我为自己的反应大吃一惊,也为自己的大喜感到羞耻。我怎么这样?不是上不上大学无所谓吗?我那么想离开农村吗?我还以为自己对农业学大寨的伟大事业恋恋不舍呢。由此我也得到了一条经验:人们往往并不了解自己。

新鲜劲过去之后,我心底的羞愧露头了,而且数年挥之不去。我食言了。我怕苦了。我临阵脱逃了。同时我又感到大为轻松,真切体会到什么叫“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我不必在一场预感到失败的战争中苦苦支撑下去。(责任编辑 致 中)

## 按需出版 继续征稿

我公司“按需出版”广告自2004年7月刊出后,得到大家的热烈反响,至今已为国内外的中老年作者出版了数十种个人传世作品,并获得信誉、服务及质量的良好评价。现继续征稿。

三大优点: 解决由于印数少而不能出版的问题(50本起印)。 即需即印,总是新书,零库存。 避免资金一次过多投入造成浪费。

适用范围: 个人著作(小说散文诗歌自传等等); 家庭、家族需要保存、传世的专辑、画册; 印数: 100册以下最合适。

资金投入: 自费。以20万字288面为例,印制50本一般在4600元左右(黑白单色)。详细报价可电话或信函咨询,亦可参阅本刊2004年第9、10期所登广告。

稿件内容文责自负,但不符合我国出版法规的不能出版。没有书号,不能销售,仅作为留世和赠送。

印制质量: 70克胶版纸印刷,质量上乘。

我公司也可代作者联系出版社,出版可供市场发行的著作。

所有出版的图书均事前签订合同。

公司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清缘西里小区1号楼1509号, 邮编: 100088, 热线: 010-59870796, 手机: 13901158422。北京地区上门服务,送书到家。本广告长年有效。

北京文苑文化发展公司

2007年1月

# 我是怎样被“补”成右派的

季音

反右派斗争是上世纪中国发生的一场灾难，无数人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希望、工作、家庭甚至生命。尽管时光已逝去半个世纪，但往事历历，难以忘怀。

1957年夏季，中国的政治形势由原来和风细雨的整风运动，突然变成了狂风暴雨式的反右派斗争。斗争的对象主要是知识分子，新闻界是重点之一。

人们通常都把反右派视为是1957年的事，称之为“沉重的1957”。其实，这个运动到1958年并未停止，而且来了个“补课”，继续扩大“战果”，斗争之激烈不亚于1957年，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是在1958年被推入右派深渊的，我就是其中的一个。

## “为右派鸣不平”招来大祸

1957年反右派斗争狂风骤起时，我在人民日报驻上海记者站担任首席记者。如同过去的历次运动一样，最初我对这个运动基本上是拥护的，这出于一种习惯，就是说带有相当大的盲目性。我是在抗日战争前期参加革命的，亲身经历了包括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在内的一个又一个辉煌胜利，参加了毕生难忘的1949年开国盛典的采访。生活使我形成了一个坚定信念：凡是党中央作出的决策都是对的，都要无条件执行，党指向哪里，我就奔向哪里。反右派斗争开始了，我作为一个党报的记者，理所当然地投入了采访报道。写了不少新闻和通讯。

现在回过头来反思，我当时的报道大都是强词夺理、强加于人的，既没有冷静的独立思考，也缺乏深入的采访和听取当事人的申述，只是按照编辑部领导的意图和“红头文件”精神行事。反右派斗争是新中国第一场全国规模的“左”的运动，

我在前期未能坚守一个记者应当客观公正、坚持真理的职业道德。

我对反右派发生明显的怀疑和动摇是在运动日益扩大时，我所熟悉和信赖的一些朋友先后“落难”，使我大为吃惊。最先传来的是人民日报社国际部东方部主任蒋元椿被划为右派的消息。蒋曾和我在第三野战军新华社前线分社共同做过战地记者，我们在战争第一线上曾共度过一段艰难岁月。他是一个为人耿直、对工作认真负责的好同志，业务能力很强。抗美援朝时期，他作为新华社评论员，以“江南”的笔名写了大量抨击美帝国主义侵略行径的评论文章，名噪一时。批判他时，我在上海，听说他获罪的主要原因是“鸣放”期间，在国际部《呼风唤雨》的墙报上贴了一张题为“圣旨口”的小字报，主要批评胡乔木在领导国际宣传上作风不够民主等问题，可能意见说得比较尖锐。我想即使意见不够正确，对这么一个好同志，怎么能只根据一件事就轻率地划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呢？我百思不得其解。

不久，从北京到上海，一些熟人先后“落难”的消息不断传来，使我更加茫然。

这年6月，我到南京参加人民日报驻上海、江苏、浙江三个省市记者站碰头会，大家互相交换情况，研究当前的报道问题。会间，我偶然看到一本新华社的“内参”，上面有一篇介绍南京大学反右派斗争的报道，说南大揪出了一个右派刘敬坤，是历史系助教。我看了不觉一惊。刘敬坤是在南京搞地下工作时入党的一个共产党员，解放前在中央大学读书，据说在学生运动中表现很不错。解放初期，他被分配到南京市委宣传部工作，曾和我共事一段日子。刘敬坤出生在苏北洪泽湖畔一个渔民家庭，从小生活很苦，因学习成绩优异，免费上了大学。他读书很用功，历史知识渊博，为人厚道，不善言辞，压根儿不会看风使舵、拍马溜须那一





1957年6月26日至7月15日,全国人大一届四次会议在京举行,图为人大代表在小组会上批判右派言论

套,为人处事方面是个“低能儿”。这个老实可靠又有些“书呆子”气的同志,怎么会成了右派?据“内参”说,他“恶毒攻击党的教育改革政策”。

读了这份“内参”,我对反右派斗争的“疑惑症”又发作了,用后来批判我的话说,就是“禁不住跳了出来”。我对旁边的几个人说:“内参上关于刘敬坤的介绍,不少都不符合事实,他明明是劳动人民家庭出身,却说他是地主子弟,还说他乱搞男女关系,他曾经在恋爱问题上遭受过挫折,这与乱搞男女关系是两回事。南京大学党委书记陈某,是我在部队时的一个熟人,我要去找他核实一下情况。”我强调说:“前两年我们在肃反中曾经搞错了一些好同志,可要吸取教训,这回不要再整错了人。”旁边一位好心的同志劝阻我说:“现在运动正在火头上,你可别去干这种蠢事,弄不好要犯错误。”

我听从了劝告没有去南大,可是心上的疙瘩没有解开。我回到上海后,不几天,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找我了解情况。我告诉他最近去江苏听到的一些事,谈话中禁不住又把南大刘敬坤的事捅了出来,复述了一遍。

柯庆施听了,“唔唔”几声,没有表态。

万万没有想到,我这次在南京和几位同事的随便议论,日后被人指责为“为右派鸣不平”,招来

了大祸。

## “向党交心”的陷阱

1958年春,全国狂风暴雨式的反右派斗争已经基本结束,党宣布继续整风。4月间,人民日报记者部电话通知我到北京参加记者会议,一是继续整风,主要是反对骄、娇二气;二是研究人民日报记者站与当地新华分社合并问题。我赶到北京。一天,记者部副主任汪×神秘地对我说:“新华社一个叫彭××的同志寄来一封检举信,揭发习平(我的妻子,和我同在上

海记者站任记者)在她面前散布过许多反党言论,问题相当严重。”汪×随即简要叙述了习平的所谓反党言论,什么农村在推行统购统销中征收粮食过了头,弄得农民成群拥到上海来买大饼;农村推广双轮双铧犁主观主义,强迫命令,大批犁积压销不出去;特别尖锐的是,认为胡风不能算是反革命,等等。

我听了惊得说不出一句话。这彭××是习平一个很要好的朋友,在苏北解放区时就在一个单位工作,过从甚密,无话不谈,形同一对亲姐妹。我心想,平时闲谈中信口说了些什么过头的话,理应当面提出,帮助纠正,为什么要等到政治运动来了才检举揭发,背后捅一刀呢?太可怕了!

我对汪×说:“习平这些错误言论,应当给予批评,正好这次记者部整风,不妨利用这个机会帮助她一下。”

记者会开始了,整风被放到一边,主要由习平作交待检讨。现在看来,习平上述议论都没有错,都是符合实际的,可是那时绝无辩解权,只能检讨。习平对彭××的揭发一概认账,但这没有用,人们认为她的检讨不深,态度不端正。

“习平应当向党交心,彻底交待自己的内心思想活动。”主持会议的汪×这样提出。

“向党交心!”这是多么神圣的字眼,对一个党

员来说,无话不可对党言,对组织是不应当有任何隐瞒的,这是党历来的教导。这天晚饭后,我和习平一起来到中山公园,边走边谈,帮助她逐年逐月回忆往事,鼓励她下决心向党交心,以取得同志们的理解。习平逐渐理出了一条思想脉络,认识到自己在这几年的政治风浪里思想上确实发生了动摇,对彭××的背后议论不是偶然的。我鼓励她把自己的思想活动在会上全盘托出,她同意了。我们这次谈话很愉快,几天来的沉重心情随之消失。

第二天会上,习平真诚地说出了自己的全部思想活动。她刚说完,汪×立即站起来大声说:“大家都听见了吧?这不是个道地的右派又是什么?她今天还在会上继续放毒!”

听了汪×的话,我真气极了——名为向党交心,实则设置圈套,这太卑鄙了!我起来发言说:“像汪×这样对待一个同志的思想检查,以后谁还敢再向党交心呢?”

我的发言,招来了一片反驳。从此,对习平的批斗升级,实际上已定性为右派分子。

不几天,斗争的矛头开始转向我。有人提出,季音是习平的黑后台,习平的反党言论肯定是从季音那里来的。我预感到厄运正在向我走来。

记者部的会议继续举行。一天,会议刚开始,浙江记者站的刘×站起来说:“我要揭发季音。”接着掏出一个本子念起来:“1957年6月某日,季音在三个记者站会议期间,为南京大学的右派分子刘敬坤鸣不平……”他声明这是记者站会议当天记下的日记。

我听了不觉心往下沉。在那个政治生活极不正常的年月,就是有那么一些人专门在背后记黑账以整人。但我并不慌张,我说,刚才刘×揭发的与事实有出入,我不是“为右派分子鸣不平”,我是看到批判材料中某些事实有出入,怕整错了人,出发点是为了维护党的利益。

我的说明遭到一片猛烈的谴责,说我至今还站在右派立场上,污蔑反右派运动过火,继续向党进攻。我当然不服气,于是与反右积极分子们处于尖锐对立状态。

一天,有人在会上又抛出一份揭发材料:“右派分子蒋元椿曾企图改组人民日报编委会,在背地里拟了一个新编委名单,其中就有季音,季音必须老实交待与蒋元椿的黑关系!”

好家伙,居然想改组人民日报编委会,篡夺报社的最高领导权,那还了得!

我听了不觉一愣,就如实回答:“我根本不知道这回事,蒋元椿要把我的名字列入新编委会名单,那有什么办法!”我当时还以为这个揭发确有其事呢。

“想不到季音的觉悟这么低,像这样一件大事,他竟然回答得那样轻松!”一位参加会议的报社领导说。领导人的话当然分量不同,于是又引起一片对我的声讨:“季音的态度太恶劣了!”

若干年后,我们的“右派”问题都已平反。我偶尔问起蒋元椿这件改组人民日报编委会的事,他苦笑着回答:“哪有这回事!全然是捏造。”他说,最后把他划为右派的罪名中,根本没有这一条。

以无中生有的手法吓唬被斗者,从对方嘴里套出一些所谓“交待材料”以整人,这就是当年一些“反右英雄”们的伎俩。

### “红皮白心萝卜”

真是阶级斗争出智慧。说那些反右积极分子毫无创造,那是冤枉了他们。对我的批斗,就充分表现出这些“英雄”们的创造性。由于我“态度恶劣”,不肯“主动交待”,加上我在反右斗争以来既未鸣放,也未在报刊上发表过任何“毒草”,实在抓不到多少“罪行”,何况在我的头上,两年前还刚戴上了一顶先进工作者的桂冠,所以批斗会往往处于对立僵持状态。如何把我批倒批臭呢?一天会上,显然是根据会前的安排,一个思维敏捷的人首先站起来发言:“我们不要被季音的表面现象所迷惑,他是个红皮白心萝卜,别看他皮是红的,内心是反革命修正主义!”

红皮白心萝卜,多么生动而形象的描述!在这位发言者的启发下,会议走出困境,对我的批斗又掀起了新的高潮,不但会上狠批,而且在办公室外的走廊两旁,贴满了大字报,中心内容是:季音是一个“红皮白心萝卜”,是一枚在人民日报社埋得很深的定时炸弹。

我平生没有经历过这种狂轰滥炸式的党内阶级斗争。人有脸,树有皮,面对一片大字报的声讨,我怎能无动于衷?

在那整人成风的年代,“整态度”也是一种被

普遍采用的手法。对方不肯就范，就扣上“态度恶劣”的帽子，声言如果态度不好，即使无实证也照样可以定罪，而且从重惩处。我就被斥责为“态度极端恶劣”。有些好心人劝我：“你不能与群众对立，还是端正态度，主动检查自己，争取同志们的



1957年国庆节时，举着“把反右派斗争进行到底”巨幅标语的游行队伍通过天安门

谅解。”也许是我软弱，也许是我政治上幼稚，在巨大的压力下我让步了，决心向党交心，写出一份份交待与思想检查，搜肠刮肚，寻思在头脑里曾经闪过的种种念头。我写道：“在胡风反党集团材料公布后，我思想上有过疑惑，觉得这是文艺思想之争，似乎不应列为反革命……”

我再次上当了！向党交心的思想检查，成了送上门去的现成“反党罪行”。把我定为右派的“罪行”，第一条是刘×揭发的“为右派分子鸣不平”，第二条便是“他认为胡风不是反革命”。写定案结论的人在这里耍了个花招，用了“他认为”这个含糊其辞的字句。我在哪里“认为”过？不交代，就从被整的党员向党交心的思想检查中掐头去尾，罗织罪名，如此整人，未免太缺德了吧！

记者部那几个为首整人者，也曾煞费苦心地搜集我的“罪行”，他们曾派专人乘飞机去上海调查，据说找了记者站若干人，但一无所获。他们心里有鬼，既不去找直接领导我工作的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石西民，也不去找市委书记柯庆施核对材料。30年后，即80年代中期，我在北京见到石西民同志。他说：“听到你被划为右派的消息，我们都大吃一惊，报社为什么不派人来听听市委的意见呢？”我无法回答他，这只能由当事人来回答。他们的调查，为什么绕过了最应当调查了解的对象？显然，他们明白，那样调查对他们整人不利。

那时候，满肚子委屈的我，多么希望党组织有人能听听我的申诉。但不幸，一切门都关上了。我找新调来的机关党委书记，他断然拒绝谈话；一切

熟人见了面都掉头而去。使我终生感激的是，曾在上饶集中营里共过患难的两个战友陈念橡和黄迪菲，这时闻讯前来看我。对着两位老战友，我惟有以泪洗面而已。在那“左”风狂吹的日子，他们也只能以“接受考验”这样的话来慰藉我。

处在绝境中的我，心头却依然存有一丝希望：也许理智会战胜邪恶，那些整人者最后会给我网开一面吧？

大约是6月的一个下午，报社在五楼大厅召开了批斗右派分子大会，说是批斗会，实际上是宣判会。我换上一套整洁的衣服，坐在第一排，恭听判处。奇怪的是，此时我既不沮丧，也不悲伤，心情反而出奇的平静。会场的讲台前悬挂了一长幅红布，上面写着：“批判右派分子季音、习平、高粮、杨建中大会”。我名列第一，显然是最严重的一个。上台批判我的是记者部的著名记者田×，他也是这次记者部反右斗争的主要领导成员，由他来批判我，想必他是我这个“专案”的关键人物。他在批判发言中说，季音是一个埋得很深的右派，把这个阶级敌人挖出来，是党领导的反右派斗争的伟大胜利。他在批判了我“为右派分子刘敬坤鸣不平，不信任党组织对刘的揭发和批判”等罪行之后，着重抨击了我在上海的工作。他说，季音被评为先进工作者，真是笑话！他根本就没写出一篇像样的文章（这是发言大意）。我听了感到奇怪，先进工作者头衔不是我伸手要来的，而是我在外地工作期间，由报社群众选出来的，你这样说，岂不是在批判群众？



1958年6月10日，人民日报社整风领导小组作出了“关于右派分子季音的政治结论”，决定划我为右派分子。8月27日，由上级党委正式批准。这中间，有一个小小的变化，最初报社给我定得相当重，据说是开除党籍，取消工资，每月只发50元生活费。中央直属机关党委批准时把我降为第四类，保留工资，但降五级，开除党籍。我的妻子习平也同时被划为右派分子，工资降两级。这样，家庭中工资收入减少了一半多。那时我们赡养着两位老人，五个一岁至八岁的孩子，全家九口人，每人每月平均生活费只有20元。幸亏那时物价低，还不至于挨饿。

当然，最痛苦的不是生活贫困，而是政治上的绝望。我从16岁走进革命队伍，包括最艰苦的战争年代，从没有离开过党，现在我却被赶出门外，沦为“阶级敌人”。

多年来，我始终不解，我既未参与鸣放，从未在公开场合发表过任何攻击党的言论，又未写过所谓“毒草”文章，再看我过去的整个政治表现，即使按照当时党中央颁发的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也是怎么都划不进去的。为什么非要把我置于死地而后快？何况，即使在鸣放会议上提过意见或者在报刊上发表过文章的人，他们也是响应党的号召，帮助党整风，理应采取真诚欢迎的态度，实践“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诺言，不应出尔反尔，把他们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曾担任过中央组织部长的宋任穷同志，在他写的题为《几个重大历史遗留问题的解决》一文中说，到1981年，全国共改正被错划为右派的人为54万，占原划右派55万人的98%以上。这是一个多么令人吃惊，又多么发人深思的数字啊！

我的右派冤案得到改正以后，不止一位当年曾参与整个批斗过程的老同志对我说了真心话：“季音呀，老实告诉你，那时把你整成右派，主要是有些人出于嫉妒，你那时太红啦，又是先进工作者，调到报社后工资连提三级，出足了风头。他们决心要整你，正好抓住了机会。”听了这些过来人的真话，我无话可说。嫉妒是条毒蛇，它会使人变得狠毒而残忍。不幸的是，有些名为共产党员的人，甚至是著名记者，竟也摆脱不了这种可鄙的心态，非把所嫉妒的人整倒才罢休。

不过，话说回来，我之所以遭此厄运，也并非全仗这少数几个人的能耐，最根本的还是当时“左”的大气候给他们提供了整人的机会。1957年9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严肃对待党内的右派分子》的社论，上边说：“必须指出，在反对党内右派分子的斗争中，也有一些同志存在着比较严重的温情主义……他们对于同党外右派分子的政治面貌完全相同的‘党员’，往往姑息宽容，不愿意把这些人划为右派分子，特别是对于一些应该划为右派分子的老党员，更加惋惜，心软，下不了手，这种情况已经妨碍了某些地方、某些单位反右派斗争的深入。……”这篇社论传达了9月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八届三中全会的精神，甚至某些句子也同三中全会的文件完全一样。“温情主义”这项意味着右倾的帽子，是谁都不愿意戴的。这样就使得当时已经扩大化的反右派斗争更加扩大，1958年又来了一个“补课”高潮，我就是在“补课”中被补进去的。

在这场斗争中，人民日报社共“挖”出右派分子29人（已全部改正），据说占职工总数的5%。若以编辑部人数计算，则将近10%，可谓“战果辉煌”。但编辑部各部划右派的情况很不一样。不少部一个右派都没有，记者部多达9人，占记者部总人数的1/6左右，为全报社各部之冠。由此可见，记者部主持运动者在反右派斗争中是立下了“丰功伟绩”的。

反右派运动是人民日报社编辑部知识分子的一场灾难，更是人民日报社记者队伍的一次浩劫。

1987年11月，我的右派问题得到彻底改正，一切污蔑不实之词被全部推翻，从此结束了长达20年的苦难。不过应当说，挨整的那些年我并未完全虚度，处在社会最底层，最能体察人生的世态炎凉，看到了过去看不到的众多社会现象，学到了许多在通常情况下难以学到的知识。从这个意义上说，不幸未必是灾难。美国作家海明威说得对：“每一个人在这世界上都受挫折，有许多人后来反而在折断的地方长得最结实。”

如今，一切都已成为过去了。如同滚滚长江东流水，历史在前进，社会在进步，这是最重要、最值得高兴的。

历史最公正。“历史本身就是审判官”。（马克思思）  
（责任编辑 李晨）

# 骇人听闻的云南沙甸惨案

周 康

最近见到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会编辑出版的《云南文化大革命运动大事纪实》，在“大事件”篇中有一节“沙甸事件”的记叙，读后引起我尘封了三十多年的回忆。我在“文革”后期，从下放的农村调回原单位不久的1975年7月下旬一天中午，所在单位的“革委会主任”突然来办公室找到我，告知要我代表单位去完成一项“紧急任务”。具体是参加“省级机关工作队”；要立刻乘车连夜奔赴离昆明200多公里的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蒙自县的鸡街公社沙甸生产大队“回民闹事”现场作善后工作。我们这30多个来自省直机关的工作队员，都是这样在单位负责人指派下毫无思想准备仓促来到沙甸，住在离沙甸数百米的鸡街糖厂等处一个多月，亲身经历了沙甸被枪炮袭击的整个过程，参与具体的善后工作，对遭受炮火之后满目疮痍、断垣残壁的沙甸进行重建的规划安排。

我们这个工作队是由当时云南省民族边疆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李长猛（回族）带队，他和我是在40年代云南大学时的同学，这次不期而遇碰在一起。他曾参加中共中央1975年1月在京召开由云南省委、省革委及有关州县负责人及群众组织代表组成的解决云南沙甸回民事件汇报会，对这次沙甸回民事件整个过程知之颇详，他在工作队会上或私下和我谈了一些事件经过及许多鲜为人知的情況。现结合史料，写成此文。

## 一、“文化大革命”埋下了祸根

沙甸地处从开远至个旧公路的中途，是昆明至个旧、蒙自的必经之地。它已有数百年历史，在云南是较大的一个回族聚居村寨，有1500多户、7200多人，在其相邻处还分布了大庄、茂克、新寨等几个较小的回族聚居村。

沙甸事件是从“文化大革命”中的“破四旧”、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血雨腥风里开始的。当时，造反派把沙甸回族群众的宗教信仰当作“四旧”破除，清真寺被当作“封建堡垒”加以封闭。群众礼拜活动被禁止，伊斯兰教经典被查抄焚毁，阿訇、教长和虔诚信仰宗教的群众被批斗。这些做法严重违反了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在政治上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整个事件的发展是随着“文革”的深入开展而不断加温并激化的。1968年3月，“云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其主要负责人谭甫仁积极推行了林彪“以人划线，层层站队”的错误路线，主观地将全省群众组织，分成誓不两立的“八派”（“八二三无产阶级派”）和“炮派”（“毛泽东主义炮兵团”）两派。省革委负责人公开声称“八派”是革命造反派，而“炮派”站错了队，是“保皇派”。此时沙甸的多数群众因倾向于“炮派”观点，被认为站错队而遭到打击、迫害。在与沙甸相邻的个旧、开远、蒙自等市县革委会对站错队的干部群众施行大事抓捕、揪斗、游街示众的“红色恐怖”。有的干部群众为避免遭受迫害，自发来到沙甸避难，多达500余人。与之对立的另一方个旧、蒙自等地的造反派组织，此时大量散发传单，四处粘贴大字报、大标语，散布“沙甸集聚着炮派武斗干将，有上万人枪及四部电台，准备武装暴动”的流言蜚语，将沙甸诬为“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反革命基地”；扬言是“马蜂窝要用捅马蜂窝的办法，以巩固文化大革命成果”。1968年12月上旬省革委会以“宣传毛泽东思想”为名，派出一个加强营编制的宣传队到沙甸“捅马蜂窝”。他们逐户搜查强行把外来避难的干部群众集中关押办“学习班”，进而把他们打成反革命的“滇南挺进纵队”。不久，开远、蒙自革委会派人到沙甸把避难群众押回单位，实行专政，挂上“滇南挺进纵队政治土匪”的牌子。沙甸的宣传队还把回族群众200多人集中起来进行吊打批斗，其中84人被扣上“反军乱军黑干将”罪名，使用种种刑罚，

造成 14 人被迫害致死, 160 人被打致残, 并采取极端恶劣手法, 强迫群众学猪叫, 学猪拱, 丢猪骨头到回族群众饮用的水井里, 严重违反民族风俗习惯, 极大伤害了民族宗教感情。那些“站错队”而被迫外出的群众被扣劳动工分, 致使受害者生活困难, 并在所谓“第二次土改”中查抄了 140 多户“地主”、“富农”及其子女的财物, 强行将一部分人迁往非回族村居住以进行“改造”。

## 二、瞒上欺下, 不断激化矛盾

1971 年“九一三”事件后, 中共云南省委按照中共中央指示, 从上到下逐级传达林彪外逃有关文件。通过学习, 许多干部群众强烈要求纠正“划线站队”错误。1972 年初, 沙甸一些群众写信或到北京上访, 要求落实民族宗教政策, 开放清真寺, 让群众进入寺内做礼拜, 为受害群众平反。并反映一些基层干部多记工分、多分粮食, 要求撤换这些基层干部。文山、玉溪等地的回族群众也不断向中共云南省委反映类似的问题, 但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1973 年 10 月, 沙甸群众为了做礼拜, 自行打开了被封闭的清真寺。消息传出后红河州和蒙自县的革委会立即派出由部队和地方干部组成的近百人的工作队进驻沙甸搞“反复辟”, 封锁道路, 不准回族群众到清真寺做礼拜。群众绕道进去, 工作队即用高音喇叭进行干扰, 并说“打开清真寺就是否定文化大革命”。1974 年 4 月“批林批孔”运动中, 工作队又扬言“批林批孔要结合批清真寺”, 并点了沙甸群众代表马伯华、马绍华、郑全书等人的名, 逼得他们上京告状。5 月 10 日, 他们到京后即写信给周恩来、邓小平, 希望中央责成云南省委撤走驻沙甸的工作队(宣传队), 落实民族宗教政策。中央办公厅信访局将此信摘报中央政治局, 5 月 14 日中共中央就沙甸问题对云南省委明确指示, 认为云南此类事件已多有发生; 为此, 提出应由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主任周兴亲自抓一下民族政策的落实, 并把有关情况报告中央。周兴即按照中央要求亲自到沙甸调查处理, 召开各种会议, 听取群众意见, 群众提出四个方面意见: 1、落实民族宗教政策, 打开被关闭的清真寺。2、纠正“划线站队”错误, 对被批斗群众给以平反。3、清理生产

队工分账目, 撤换多拿多占的基层干部。4、将沙甸改为经济作物区, 增加口粮供应, 解决群众生产生活中的困难。周兴对开放清真寺, 准许群众进入清真寺内做礼拜和纠正“划线站队”错误问题没有表态, 对另两个问题则表示可以解决。但在实际工作中对已答复可以解决的问题也未完全兑现。在此情况下周兴却向中央报告:“沙甸问题已经解决。”不仅如此, 1974 年 9 月云南省委还发出通知规定:“已经关闭或改作他用的清真寺不得再打开作宗教活动场所, 已经强行打开的清真寺, 要在作好工作的基础上, 由群众自行关闭。”这一通知传达下来, 回族群众不能接受。于是组织几百人到昆明上访, 继后又有红河、文山、玉溪等地回族群众 1000 多人到昆明游行, 并两次爬上开往北京的火车, 要求赴京告状。在这矛盾不断加深的情况下, 红河州革委会却在鸡街成立了主要针对回族群众的“鸡街地区民兵值勤指挥部”, 将矛盾推向极端。沙甸回族群众也成立了“沙甸回民兵团指挥部”与之对抗。从这两个“民兵指挥部”相继成立后, 双方都剑拔弩张, 大有决一死战之势。不到半个月就在开远、蒙自、建水等地发生群众抢夺军队枪支, 并出现严重武斗, 造成人员伤亡日益严重的动乱局面, 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

## 三、“性质变了”, 动用武力进行镇压

1974 年 12 月下旬, 中共中央发出通知指出: 在云南红河沙甸、玉溪、文山等地区发生的武斗事件是错误的, 中央决定通知沙甸的群众代表及红河州委、州革委、个旧、玉溪、建水、蒙自、文山、开远、通海等县市负责人以及省革委及其常委中的有关人员(指结合进省革委领导班子的造反派头头)等共 34 人于 1975 年 1 月 6 日到北京汇报, 重点讨论解决云南局势的是非问题。提出首先收缴武器, 停止武斗, 进而通过学习讨论提高思想, 增强团结, 恢复社会秩序。在此期间, 中共中央还发出《关于禁止抢夺武器的通知》, 指出利用民兵组织搞武斗是错误的, 不要成立“民兵指挥部”或“民兵团”之类的机构, 不要给民兵发枪。责成有关部门立即收缴被抢夺的武器。在京的云南省委常委对执行这一通知, 作出了“坚决



拥护，保证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的保证，提出六项措施以确保完成。但在实际工作中，在收缴武器时，又出现偏袒一方压另一方，引起回族群众更为不满，抢枪武斗事件仍然不断发生。为此，云南省委常委又在北京召开了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为时长达三个月之久（从1975年2月17日至5月27日）。当时的中央领导王洪文、陈锡联、纪登奎、华国锋、吴桂贤、吴德、苏振华等曾参加会议，并在会上讲了话。最后形成经中央审查批准的《中共云南省委常委扩大会议向中央的报告》，声称要纠正过去执行政策上的缺点错误，必须认真落实党的民族政策。据此，省委、省革委决定派出工作队，在解放军协助下进驻沙甸。文件传达到基层，沙甸回族群众鉴于1968年“捅马蜂窝”时被残酷打压的惨痛教训，不让工作队进村，要等去北京的回族代表带来解决问题的精神才让工作队进村。于是，省委、省革委又发出《关于解决沙甸问题的通知》的文件，检讨了曾在划线站队、清理阶级队伍中发生逼供信，对回族群众风俗习惯尊重不够等，但这些文件发出后并没有实际措施，回族群众与民兵的武斗仍不断发生，工作队仍进不了村。在接见时，王洪文一再说：“如再不让进村，就要打‘土围子’了。”

6月下旬，省委向中共中央汇报并提出“军事包围，政治解决”的方案，中共中央未同意。6月20日中央一些领导人又接见了省委和红河州委负责人，指出对回民问题要有一个基本估计，要做好面上的工作。同日也接见了沙甸群众代表马伯华等十余人，指出云南回民问题主要是执行政策有缺点错误，受阶级敌人所利用，要马伯华等人作好群众工作，欢迎工作队进村，要彻底收缴散发在民间的枪支弹药，并指出要解散武装组织，停止串连等。并且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一个经毛泽东圈阅的指示，强调要彻底收缴枪支弹药及武斗凶器，拆除武斗工事，不准在基层夺权，基层干部要回村抓革命促生产，回族群众应欢迎解放军及工作队进村。回族代表马伯华等人知悉这一指示后，向中共中央及毛泽东主席写了保证书，翌日即从京返回沙甸等各村寨。对工作队进村的问题，马伯华等人提出只能进少而精的工作队，进入村内不要抓人等，这些要求和省里安排出现分歧并发生争执。马伯华等人及时向中共中

央写了报告，批评省委向中央反映问题“不符合实际情况”。此时省委向中央也写报告，强调马伯华等人的错误是抵制对抗中央指示，还积极进行武斗准备。因此认为沙甸问题“性质变了”，甚至具体说回族群众组织公开发出请帖，要在8月1日到沙甸附近的大庄过“圣诞节”。“这可能是进行暴动”，由此作出“政治解决已无可能”的错误结论，向中共中央提出应采取军事解决的请示。经中共中央批准，在省委书记周兴的亲自坐阵下，于7月29日凌晨开始调动驻于邻近的解放军部队，对沙甸以及附近大庄、新寨、田心、茂克、车白尼等回族聚居村实行军事包围。黎明时分，开始用榴弹炮轰击，其中沙甸、茂克两村遭到非常严重的损害，大部分房屋被毁，并造成包括马伯华等人在内130余人死亡的严重后果。

我们工作队是在部队清理了被炮击现场之后才进入沙甸的，此时明确工作队的任务是，为被毁坏的房屋进行实际勘测，作出恢复重建规划，由原来各家各户分散式建筑改为相连式分户建筑，其中清真寺等公共建筑则在原址按原面积恢复重建，计算出所需材料及费用后由省财政等有关部门落实实施。这些工作都是由分批来到沙甸的工作队具体实施的，直至一年以后才建成结束。

由于整个“沙甸事件”是被定性为“反革命武装叛乱”，当作敌我矛盾处理，因而采取了如此严厉的武力解决的办法。虽然在事后派出的工作队采取及时修复被毁房屋，安抚伤残人员等措施以缓解敌对情绪，但终因混淆了矛盾性质，严重破坏了党群关系和军民关系，加深了民族隔阂，在政治上造成的损失无法估量。粉碎“四人帮”后，中共云南省委和昆明军区党委才于1979年2月根据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报经中央批准联合发出通知为“沙甸事件”平反，检讨了执行民族宗教政策上的错误，彻底推翻一切污蔑不实之词。

现在虽然已事隔30多年，但当年进入沙甸时看到的断垣残壁、血迹斑斑的情景仍历历在目；死伤者的家属哀哀痛哭的声音仍在耳际回响。我心中在问，这到底为什么？为什么在好端端的地方，在没有外国入侵的和平岁月，却被人多地制造出这样的大惨案、大悲剧？

（责任编辑 李晨）

# 情系国殇墓园

秦伯益

祖国西南边陲“极边第一城”云南省腾冲县的西南郊，在四季葱翠的来凤山下，在长流不息的叠水河畔坐落着已有整整60年历史的国殇墓园。这里埋葬着1944年中国远征军第二十集团军光复腾冲时壮烈牺牲的8000英灵。这是1945年为纪念这些抗日阵亡将士而建立的我国第一座烈士陵园。它建立最早，规模宏大。60年间，几度兴废，几度修复，至今气势恢宏，庄严肃穆。虽然墓园地处滇西边远，却每年总有世界各地数万人士前来凭吊，前来缅怀。人们不忘历史，不忘英烈，向抗日阵亡长眠于此的将士们表达自己浓浓

的情，深深的敬。

走近墓园就见正门上方原云贵监察使李根源先生的园名题词“国殇墓园”，进门后穿过30米左右两侧耸立着森森翠柏的林荫甬道，就正对大殿“英烈祠”。“英烈祠”殿基有蒋中正题、李根源隶书石刻“碧血千秋”，字体凝重含悲，催人情涌。殿前和殿内有于右任、孙科、卫立煌、龙云、黄琪翔、霍揆彰、周福臣、阙汉骞等国民党要人题写的多幅匾额和楹联。如陈诚题：“冲锋陷阵慷慨成仁；光复汉物万民欢腾”。何应钦题：“气壮山河成仁取义；光昭日月生荣死哀”。殿正中是孙中山像，上悬“天下为公”，下刻“总理遗嘱”，两侧题“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外侧悬当时的国旗和国民党党旗。殿后即墓地“小团坡”。坡前正中石刻是于右任题“天地正气”，书法大气磅礴，豪情洋溢。两侧安置“盟军阵亡将士纪念碑”和“远征军第二十集团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再往前，就登上约30米高的“小团坡”墓地。墓地底面西南狭，东北宽，呈“钟”形，寓意“木铎警世”、“警钟长鸣”，毋忘国耻。坡顶矗立着“远征军第二十集团军光复腾冲阵亡将士纪念塔”。塔基四面刻“民族英雄”、“还我河山”及碑文等。最令人难忘的是纪念塔四周密密齐齐的小块墓碑。小团坡整个均分为8块扇形墓地，每块墓地自上而下依原作战部队序列和职衔高低整齐地排列着9行上圆下方的墓碑，碑上镌刻着烈士的军衔和姓名，共72行，3346块，下面埋有烈士的骨灰。身临此境的人，见景思情，无不肃然起敬，怦然心动。正怀着万分激动的心情步出墓园时，蓦见墙角处还有一矮小的坟头，坟碑上书“倭”二字，使人联想到杭州岳王坟前跪着的秦桧夫妇，而“倭”的处理方式似乎更寓深意。

腾冲是抗战后期我军收复的第一座被日军



国殇墓园



占领的城市，是沟通中国抗战后方与东南亚，尤其是缅甸的重要战略要冲。日军占领它，既是为了打通滇缅公路，以便驱军南下，实现“大东亚共荣圈”的梦想；也是为了切断我大后方与国际间保存的惟一通道，以便阻绝国际对我抗日物资的补给。为此，日军在腾冲重兵驻守，高沟深垒，意欲长久占领。为攻打腾冲，国军以卫立煌将军为集团军司令，动用了两个军、六个师的兵力，历时四个月，大小四十余战，强渡怒江，仰攻高黎贡山，力克腾冲日寇守军。破城后，又经激烈巷战，肉搏厮杀，硬是将据守城内的3000顽寇全部歼灭，无一漏网。我方的代价当然也十分巨大，死伤军民18000人，收复后的腾冲，已是一片废墟。正是这样的代价，赢来了腾冲的光复，破灭了日军挺进东南亚的迷梦，保证了国际物资补给线的畅通，鼓舞了全国抗日军民的士气，标志着战略反攻的开始。

抗日战争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惨烈的一场战争，也是中国人民作出了最大牺牲的一场战争。同时，抗日战争也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取得最大胜利的一场战争。这一胜利是国共两党通力合作，共赴国难，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同仇敌忾，前赴后继，英勇杀敌的结果。这一胜利使中国人民从此摆脱了列强的欺侮，开始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全国人民的胜利，是全中华民族的胜利。

由于国共两党意识形态和建国主张上的分歧，抗战胜利后没有能够共同分享胜利的果实而开始了又一回合的国共斗争。对于抗战胜利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诠释和宣传自然也就各执一词，甚至相互诋毁。关于国民党的反共宣传，全国解放后在大陆已经澄清，本文想说的是国民党抗日的一面。这是我，一名老共产党员，对国民党抗日的真诚认同，也是对过去我们片面认识的由衷反思。

“只反共，不抗日”，这是解放后长期以来我们对国民党在抗战中表现的基本评价，事实上这评价是片面的。国民党当时是执政党，国民党军队驻守全国各地，负责正面战场的全面防御，守土有责。国民党军队与日军的关系是，国军在明



英烈们的墓碑

处，日军在暗处，日军主动。日军可以有选择地重点进攻，国民党无法回避，打得赢要打，打不赢也只好打，打败了只好退。共产党军队和日军的关系不同，日军在明处，共产党军队在暗处，共产党主动。共产党没有自己的领地，没有固定的驻军，没有守土的直接责任，而是深入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正是国民党负责的正面战场和共产党建立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两者的良好结合，构成了这一波澜壮阔、气势恢宏的中华民族全民抗战的壮美画卷。没有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抗击，共产党很难抓住战机，深入敌后，有力地牵制日军；同样，没有共产党深入敌后，牵制日军，国民党在正面战场上将遭遇日军更大的攻击，导致更多的失败。正是国共两党当时的合作，才有力地打击了日寇，才能以弱而穷的古老国家最终战胜强而富的新兴帝国。再从国际范围来看，正是国共合作后牵制了几百万日军，才使日本没有力量再北上攻击苏联，或南下攻击东南亚、西印度洋，直至中东和澳洲，这才保证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对中国抗日战争的重大国际贡献，当时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都曾充分肯定过。

可是，60年前，抗战胜利后的喜庆焰火尚未消散，中华大地上的内战烽烟再度燃起。当然，天无二日，国无二主，以当时形势来看，国共之间必有一战，最后共产党胜利了，这也是当时国共两党民心向背的必然结果。历史总是胜利者的历



史,于是解放后我们一直按照我们自己的观点述说着抗日战争的历史。如果史实果真就如我方过去所述,那么,国殇墓园中埋葬着的几千名英烈到底为谁而战?为谁而死?国殇墓园外,全国还有多少抗日阵亡的忠魂散落在历史以外?我是2005年5月初寻访国殇墓园的,回京后,以上沉重的历史疑问久久萦绕心头。什么时候才能还历史以真实?

2005年7月7日,北京卢沟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经重新布展后正式对公众开放。3天后我去参观,大喜过望。这次改版后的展览内容凸显了“国共合作,共赴国难”的重大主题。从“九一八事变”后的“嫩江桥抗战”、“长城抗战”、“察哈尔抗战”到“卢沟桥事变”后的“淞沪会战”、“忻口、太原战役”、“台儿庄血战”、“武汉会战”、“长沙战役”、“滇西大反攻”等国民党军队进行的著名战役和“平型关战役”、“百团大战”等共产党军队进行的著名战役在展版中都同样得到了反映。国统区广大知识分子和国家干部及敌占区工农大众的抗日活动也都同样得到了反映。马占山、蒋光鼐、蔡廷锴、傅作义、卫立煌、张自忠、佟麟阁、李宗仁、邓宝珊、杜聿明、赵登禹、戴安澜、冯玉祥、薛岳、张学良、杨虎城、郑洞国等国民党抗日将领和众多共产党的抗日将领、工农群众中的抗日英雄、爱国华侨中的抗日英雄和来华支援中国抗日的国际友人的照片一起都同样高悬展版,供人瞻仰。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展示着伟大战略家毛泽东在整个抗日战争中高屋建瓴地起着战略指挥作用。展厅中同时展示了1937年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他说:“再没有妥协的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时便只有拼民族的生命,求我们最后的胜利。”指出“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有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说明卢沟桥事变后,蒋介石确实也有决心抗战的一面。我注意到很多观众在看到国民党军队抗战事迹时连连点头,还有人在那张台儿庄车站上李宗仁的全身照相前留影。我则在滇西

战役的展版前驻足良久。当看到远征军滇西大反攻、强渡怒江、攻克腾冲等图片时,一股难以名状的欣慰涌上心头。尤其令人信服的是最后一张统计表记载着抗战期间共歼灭日军154万余人,其中东北抗日军民歼灭日军17万余人,敌后战场歼灭日军52.7万人,正面战场歼灭日军85万余人,国民党的贡献得到了如实反映。人民群众从历史的真实中感知,国共两党合作,其利断金。

我为国殇墓园中抗日英烈们的事迹得到了历史的如实肯定而高兴,我也为国殇墓园外千万抗日英烈的事迹得到了历史的如实肯定而高兴。历史最终是人民写的,只有被人民的历史所肯定的胜利者才是真正的胜利者。

(责任编辑 李晨)

## 书屋 2007年第6期目录

书屋讲坛	我们怎样做母亲 三岁的宝宝懂多少 为自己的心灵寻找一个家 珍贵而难与评说的子尤 ——读《谁的青春有我狂》	魏泉 摩罗 张宝明
学界新论	“小胖子”克林顿的成材之路 《道德经》与中国式宗教意识 何谓“霸权主义”?	樊百华 陈伟 王蒙 邓晓芒 景凯旋
史海钩沉	人类是一个整体 高宗武华盛顿隐居遗事(二) ——傅斯年的斥骂引出的一段故事	夏侯叙五
裁书刀下	历史学家的浪漫 ——话说雷海宗	张晓唯 吴润凯
灯下随笔	谒明孝陵:萧条异代不同悲 谁遗文章四海传 ——李时珍与《本草纲目》	王成启 傅光明 刘畅 黄霞 余斌 狄马 邵建 孙康宜
域外传真	“城记”下的历史面影 《时代》年度人物与“网民议程设置” 孙中山的公仆意识 梁启超何以不配? 人质是怎样爱上绑匪的 胡鲁眼中的尼采 与芦苇谈《图雅的婚事》 在鹿港发现历史 ——施叔青《行过洛津》读后	钱南秀 杨帆
说长论短	换偶现象的人类学解释	
书屋品茗	现代困惑与乡村悲情——张鸣教授《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读后 “袴下之辱”何以成为大丈夫行为 ——读《史记·淮阴侯列传》 闲览杂书病自愈 ——病中读《我的笔名》	董国强 雷建军 赵普光 季红真
流年碎影	汪曾祺与“样板戏”	

邮发代号:42-150 月刊 每月6日出版 定价:5.00元  
地址:长沙市韶山北路443号《书屋》杂志 邮编:410007  
电话:0731-5791300 5486812 传真:0731-5790197  
邮箱:nlh5314@263.net

# 三代人的宿命

王宏任

在我的收藏物中保存着三件珍品：一个往来收支簿、一张证明书和一个带罩的煤油灯。这三件物品是我们家族历史的见证，也是我们党和国家历史的一个缩影。



## 爷爷的收支簿

这是一个 128 开的粉红色布面硬皮的小册子，上面有银色的“工作与学习”字样，下面用工整的小楷写着爷爷的名字：王振伯。扉页上是“社员王振伯往来凭证”，上面盖着“香河县孙家止务胜利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圆形印章，下署日期“1954年3月12日”。这个至今已经五十多年的小本子被我家三代人保存的完好无缺，蓝黑墨水写的每笔账目都非常清晰，这是我们村合作化时入社的账目凭证。

爷爷是个热心公共事业的农村社会活动家，在周围几十个村子里都是个办事的能人，人称“半官府”。解放前夕，爷爷曾救过一个被伪军追赶的人，这个人正是解放后的香河县第一任县委书记张子明。新政权建立后，张书记第二天就带人拜访爷爷，爷爷当时成了个红透天的人物。那时新政权的村长、村支部书记和他们的下属天天在我家办公。爷爷有极强的协调能力和组织能力，给新政权出了不少好主意。土地改革中，我家定为中农成分。那时的爷爷坚决听共产党的话，党说啥就是啥。

1954年村里成立合作社时，爷爷作为铁杆儿革命派把所有家产都入到社里。这个小本的第一笔账是：驴一头，折价 200 万元（合现在人民币 200 元，下同），车一辆，折价 120 万元……连大型农具如水车、犁、耙等，我家入社物资总折价是 450 万元，在全乡是最多的。他受到县委书记张子明的表扬，说他推动了合作化运动的进展。

入社后，爷爷当了半年副社长，后来强调要贫下中农掌权，爷爷自动退下来（他不退也会让他退的），成了普通社员。他那时经常生病，奶奶也有病，想从社里支点钱看病，总是回答没钱。那时我们全家八口人，只有妈妈一个青壮劳力，爸爸在外工作每月工资三十多元，四个孩子，三个老人，困难可想而知。很快，由初级社转为高级社，入社物资打破村与村的界限，我家入的那头大草驴分到别的村去了，爷爷哭着去找高级社长要他那头驴，新社长根本不听爷爷的话，反而质问爷爷什么成分，是否有变天思想。爷爷长叹一声，悔之晚矣，他成了落后社员。

随着公社化的“一平二调”，各户入社的资产都“平调”了，爷爷的车没有了，水车早坏了，他说那水车要自家用能用 20 年；没入社前，全村有 40 部水车，入社后到 1958 年，全县的水车全都毁坏，机械化程度严重倒退。爷爷一生的劳动成果都贡献给合作化了，他自己成了不受欢迎的穷光蛋。当时我家三个人劳动养不活七口人，每年欠社里的钱，欠钱就从入社物资里扣，扣到 1958 年不许再扣了，因为爸爸有工资，得交现钱了，于是爸爸的工资就成了全家的活命钱。

1959 年冬天，全家挨饿，爷爷拿着小本子找公社干部要钱，被训了一顿，说他配合“帝、修、反”向人民公社进攻。爷爷一病不起，到 1960 年春天，他和两个奶奶饥饿而死，死时还攥着那个小本子。爷爷死后还被划为地主，张子明也被打成“叛徒”，他们都遭到了恶毒的批判。如今这本子上还欠我爷爷 389 块 5 角 6 分钱，但是没人再提这笔钱，也没人对爷爷这些真心拥护共产党而受到挫折、委屈的人道一声歉。



## 爸爸的证明书

爸爸前年去世，临终时还念叨着他的《证明

书》。

《证明书》上写着：“王春林同志响应党的号召支援农业第一线，回乡参加农业生产，特此证明。1962年7月15日”。下面有参加工作时间：1946年7月。原任职务：教师（其实父亲是小学校长）。备注：生产补助费和其他费用已发给本人。骑马缝中有半个“香河县人民委员会”的带着国徽的印章。爸爸17年工龄只领回来不足七百元的补助费。

爸爸是高中毕业即参加革命的热血青年，他在历次运动中“一心听从党召唤”。1962年的下放运动，是国家为了调整国民经济而做的不得已的退步，把大跃进前后过热发展的经济冷却一下，其下放重点应是解放后扩招的工人干部。可是工作难做，谁都不愿下放，于是他们就做爸爸这批解放前参加革命的干部的工作。领导让爸爸当带头人，说让他先写申请带动大家，最后可以考虑爸爸的情况，不作下放处理。于是爸爸就真的写了申请，还真心劝他的几个朋友写申请，结果是他们都被下放了。爸爸体弱多病，本是不能下放的。但这时领导的谈话口气变了：你已经写了申请，是你自己的笔迹，你还能欺骗党和人民吗？不过他们应许：过两三年经济一好转，立即把爸爸招回来重新工作。于是爸爸就回到农村参加农业生产了。可悲的是爸爸身单体弱，不能干重活。所以，他从来没有挣过满分。

爸爸希望国家形势好转，他在劳动之余还给村里办板报，给农民读报讲时势。有人劝他别再这样“积极”，爸爸还反过来作对方的思想工作，苦口婆心地劝对方端正认识，正确对待党。

不久“四清运动”开始，工作队把爸爸当积极分子，让他带头学文件，带头批判“四不清干部”。爸爸当积极分子当得赤诚无比，他带头按文件要求给一个“四不清干部”上纲上线（这个干部确实鱼肉乡里，在三年困难时期大发“饥饿财”）。但没有几天，“四不清干部”解放下楼，他纠集几个被爸爸批判过的“四不清干部”，合伙陷害我家，异口同声地说给我家扛过长工，说我爷爷是漏划地主（其实土改时我家只有七亩半地，是土改的分地户），并逼着爸爸承认，承认可以不戴“地主分子”帽子，不承认就是“反动地主分子”。过于相信党的爸爸只好委屈地承认了，于是我们全家被

逐出革命阵营，成了改造对象。

“文革”中爸爸被打成“国民党残渣余孽”，据说是爸爸上高中时，当地国民党部把所有高中生都写在国民党员的名单中，这叫“集体入党”，入党者大多不知道。不知道也不行，入了名单就是反动国民党分子。爸爸老实忠厚，没有被游街，可是挨了几次斗争，他站在台上挨斗时，许多人在下面叹气。划成地主的我家终于被扫地出门，全家六口人被从我家三间正房、三间厢房的小院赶到两间霉烂潮湿、摇摇欲坠的长工屋中，过起了被专政的“地主”生活。爸爸此时开始后悔不及了：假如自己不听那个领导的话，不写申请，不会下放农村；假如自己不听工作队的话，不当积极分子，不批判“四不清干部”，能有这个下场吗？千错万错，都是自己“积极听党的话”惹的祸。爸爸很长时间陷于忏悔之中，深感自己给家里带来灾难，给爷爷带来恶名，有时甚至想自杀。多亏那张“证明书”给他些许的希望，他隐忍地活下来了。

改革开放后，我到县政府办公室工作，我向县长反映了我父亲的情况，县长指示让有关部门解决，那个部门领导找我父亲谈话，问我父亲是否犯过错误，父亲说没有；问是否和当时领导有矛盾，属于被打击报复？善良的父亲也说没有。领导无奈地说：“那您的问题现在暂时无法解决，因为对于自愿申请下放农村的干部我们没有招回的政策。”爸爸说：“不是说经济一好转就让我们回去吗？”领导说：“现在北京、天津的下放人员有了极少数的补助费，咱们河北还没有，我想会有吧。您耐心等待吧！”于是爸爸真的耐心等待，但直到去世也没等来结果，爸爸死不瞑目！

## 妈妈的煤油灯

我保存的那盏煤油灯是五十多年前几乎家家都有的那种带玻璃罩的煤油灯，我保存它是因为我妈妈当年曾在这个灯下努力学习、刻苦识字。

共和国初建的那两三年，农村兴起“扫除文盲”运动。妈妈当时正是二十四五岁的青春年华，又是干部家属，于是带头上“识字班”学习，带头



妈妈当年用过的煤油灯



参加共青团，还当了团小组长。每天中午，妈妈和她的姐妹们结伴去识字班学习文化，一路上说说笑笑、打打闹闹。那是洒满阳光、给人希望的年代。

傍晚，妈妈从田野回来，洗把脸就叫几个团员去村公所最高的房上去喊“广播”，她们用马粪纸卷成的喇叭，把报纸上的新闻“喊”出去。为了这半小时的广播，妈妈每天晚上要在油灯下反复熟悉两个小时。所以让妈妈牵头作这个工作，因为爸爸是中学教师，他有字典，那时候字典可是贵重的东西。为了这本字典，许多青年女子到我家来找妈妈学习文化。

随着我渐渐长大，妈妈的伙伴们不再相聚，也不再学习。因为“合作化”使人们天天一块儿劳动，话都在地里说完了，而劳动的结果与宣传的有很大距离；“统购统销”后的农村，几乎家家缺粮，吃不饱饭了，还谈什么主义；“反右”波及到农村，看到几个在外边工作的人被打成“右派”，受到犯人一样的待遇，人们的心冷了，相互提防着对方；尤其是“三面红旗”狂舞时，所有人都形同囚犯，整日苦累在田间，夫妻分居，子女难顾，吹牛皮说大话，从吃没滋没味的大锅饭，到收去每家的铁钉铁锅去大炼钢铁，人们不再对未来抱什么希望，昔日的青春蓬勃、蒸蒸日上的豪情和力量都枯萎了。

灾难还在继续，饥饿的年代来了，妈妈的伙伴们有的饿死了，有的出外要饭被人奸污致死，有的因为偷了一把麦子被戴上坏分子帽子，每天干完活儿后还要和“四类分子”一块扫大街……妈妈则拖着病弱的身体每天下地劳动，疲惫不堪、满脸愁容。

“四清运动”来了，一个当年和妈妈结拜姐妹的女人当了分团政委，她听信了某些“贫雇农”的意见，把我家定为地主，扫地出门，接受改造。妈妈虽是贫农出身，可是已经嫁给了地主家，也只能和地主一起接受改造。阶级斗争的急风暴雨使人与人之间成为仇敌。妈妈对新中国的热忱向往，对党的一片忠心，都被抹杀、埋没于那莫须有的“阶级斗争和群众运动”里。漫长的十四年，妈妈在痛苦委屈中苟活，形同在狱中服刑，没有欢笑，没有希冀。

改革开放后，妈妈已经六十多岁了，她看到

一个个久被压抑的儿女走出农村进入大学、机关、企业，她笑了，她把那盏煤油灯交给我，要我好好保存它、珍惜它。

## 我自己的经历

我在这个拥护革命的家庭中成长，父亲让我从小就作个革命者。我小时的玩具是宣传新思想的“小人书”和革命领袖像：马、恩、列、斯、毛、刘、周、“十大元帅”和金日成、马林科夫、布尔加宁、伏罗希洛夫、基洛夫等等，还有反映他们生平的书藉。我从小学二年级到六年级始终是班长、中队委、大队委，我以优异成绩考上县一中仍然是好学生，我雄心勃勃的想上“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复旦大学”这些名校，可是，家庭成分使我理想破灭，“地主子弟”使我成了贱民。我努力自拔，想凭写作来创造前途，我真心实意地歌颂领袖、党、社会主义。我有一篇歌颂家乡的散文《运河放歌》，我充分发挥想象力，把家乡写得如诗如画。文章发表在《河北日报》上，地委宣传部长看了，心情愉快地到县里来参观美丽的运河，县委书记领他找到我，问我写的是哪里的风光。我说是过去的运河，是未来的想像。县委书记把我狠批一气，说我作假。我违心地承认了错误，发誓再也不写文学作品了。从此开始画画，写小评论，天天说社会主义好，即使这样，在“文革”中我还是被打成了“反党集团成员”，剪头发、抹黑脸、挂黑帮牌、戴无常纸帽、沿街游斗。我心中非常委屈：我是从小到大、从里到外都拥护革命、党、社会主义和毛主席呀！这是我应得的待遇吗？我们三代人真心革命，却遭此厄运，这革命还叫革命吗？

所幸赶上“改革开放”，我和弟、妹后来凭考试出来参加工作，当了干部，家里落实政策，父母算享了十几年改革开放带来的幸福。只是我亲爱的爷爷、奶奶受尽了饥饿、劳累、精神的磨难而没能赶上好日子。在中国有千千万万像我家一样的遭遇者，我们都不会容许历史的悲剧重演。我完全同意巴金先生的意见：如实地建“文革博物馆”，把这种“史无前例”的罪行毫无隐瞒地昭示给后来者，让善良的人们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和谐社会。

(责任编辑 李晨)

# 父亲梁蔼然的地下工作经历

梁福申

我的父亲梁蔼然解放前长期从事地下工作，是我党派在冯玉祥、鹿钟麟总部的情报小组组长，给党提供过有重要价值的情报，特别是军事战略情报，受到过周恩来、董必武的多次表扬和毛泽东的接见。但我对父亲的经历，过去知道的甚少。“文革”结束后，特别是我离休后，在我的要求下父亲才详细地给我谈了他的过去。父亲在旧中国坐过国民党的牢房，解放后也曾长期受到不公正待遇，十年动乱期间更是蹲过牛棚，受到严重迫害。但他始终信念如一，无怨无悔。父亲逝世已十六年有余，他在解放前的许多经历，尽管至今鲜为人知，却与许多尽人皆知的大事相关联。

## 亲历西安事变

1931年7月，父亲经当时在中共党员、陕西省政府秘书长南汉宸领导下从事情报和高层联络工作的申伯纯介绍来到西安，入陕西省民政厅，三年后被派往南京杨虎城的办事处工作。1936年春天，被时任西安绥署交际处长的申伯纯调任交际处上校总务科长。自此，父亲在申伯纯的引导和影响下投身革命，并身历和目睹了西安事变前后一些事情的细节。

东北军奉蒋介石之命在陕北“剿共”失利后，全军发生了动摇，要求停止内战、打回东北老家去的呼声高涨。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处境更为困难，不仅人数少，装备也差。东北军的入陕使西北的局面更加复杂化，让杨虎城产生了危机感。而蒋介石利用这种矛盾，使张、杨互相猜忌牵制，以达操控目的。杨虎城为摆脱困境，与张学良共存共处，决定把东北救亡总会负责人高崇民（当时被国民党当局通缉）从天津接到陕西做张学良的工作，共商联共抗日大计。申伯纯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父亲，而父亲当时并不认识高崇民其人。申对父亲说：“你

到天津要住最阔气的交通旅馆，然后到法租界某处找他，不要带任何信件，全凭口说。”父亲到天津在交通旅馆住下后，即按地址找到高崇民的住处不遇，留下了姓名和住址。当天下午三点，高崇民偕同袁晓轩（父亲后来的入党介绍人，抗战初期曾在八路军总部工作，1941年在洛阳叛变）来了，邀父亲到他的住处。寒暄过后，父亲说：我是申伯纯先生派来的，接您到西安去。高问：为什么这个时候接我去？父亲答：这个我不知道，只是派我来接您。高随即把话题岔开，问起了西安各方面的情况。谈到下午五点，高崇民邀父亲到旅馆吃饭，饭后问道：你是不是还要在这里住几天？父亲答：依高先生的意见而定。高说：好！我现在还不能答复你去不去，一两天内会答复的。高崇民后来告诉父亲，他和袁晓轩回去后详加分析，都认为我父亲诚实可信，并推断此乃杨虎城授意申伯纯所为。第二天中午，高崇民又与父亲闲谈中问了一些到西安后住哪里之类的问题，并说：我去不去，明天答复你。到了第三天中午，高直截了当地说：我可以去西安，但我们不能一起走，你可以先回去，8月某日在潼关黄河边上接我。

父亲回到西安，向申伯纯作了汇报。申说：你在潼关接到高先生，就直接把他送到三原东里堡杨虎城公馆。届时，父亲如约在潼关接到高崇民。

几天后，父亲还曾接受申伯纯交给的任务，接送中共派往第十七路军的代表张文彬到杨公馆与高崇民多次秘密长谈。张文彬曾任两广党委书记，西安事变时陪同周恩来和杨虎城会谈。据父亲回忆，张行踪甚密，戴着口罩，途中很少讲话。

1936年11月，蒋介石抵达西安，进驻临潼华清池。蒋的将领陈诚、蒋鼎文、卫立煌、关麟徵等及国民党要人邵元冲等也纷纷前来，住在西京招待所。西安一时车水马龙、冠盖云集。父亲所在的交际处自然要忙上加忙。蒋在新城大楼举行过不少

次大规模的宴会,都由交际处承办。发请柬,摆席次,排坐位,甚至还要五洲大药厂制造蒸馏水,因为蒋请客从不备酒,以蒸馏水替代,每次派一个副官和交际处的人同去监制。交际处的副官向父亲请示说:“他们要的蒸馏水太多,五洲大药厂赶制不出来,如果掺点假是可以的,那就得在蒋手下的副官身上下点功夫。”父亲问:“怎么下功夫?”答说:“那好办,你就不用管了。”后来父亲去五洲大药厂,见到交际处的副官正陪蒋派来的副官吸鸦片,旁边有妓女陪同。蒋的随员们还提出买狐皮大衣的要求,交际处也应付了好几件。此外,每天晚上,交际处都用十来部汽车接蒋的随员进城看易俗社演出的秦腔戏。杨虎城下了口头命令,要满足这些人的所有要求。

12月12日深夜,父亲从戏园里应酬回来,将汽车送入车场。杨场长叫住父亲问道:“你知道出了什么事?为什么将所有大汽车全调走了?”父亲答:“不知道。”随后匆匆步行回到新城机关。值班的副官告诉父亲:“张副总司令现在在新城,和杨主任在一起,他的卫队进来四五十人,不晓得了什么事。”父亲出去看了看,未见异常,就回去睡了。到了凌晨两点多,值班副官将父亲叫醒,说:“今晚一定有事,你起来看看吧。”父亲赶紧起身穿衣出门,见赵寿山旅长正从外面走来,父亲与赵熟悉,便上前打听,赵说:“你回房睡觉吧,不要问。”说罢便向杨公馆走去。父亲正纳闷间,忽见手枪兵都上房了,开始严加警戒,任何人不准出门。到早晨6点,警察局方向响起枪声,进而宪兵团方向也响起枪声,后来枪声大作,几乎遍布全城,足足响了一个多钟头。到早晨8点,枪声渐绝。

父亲走出办公室,看到一些警卫奔走呼号,手里拿着“兵谏书”,见人就发。父亲要了一张,读后甚感兴奋。此时,忽见新城大楼门前停下一辆汽车,车门打开后,几个人将蒋介石架进了大楼。早晨8点多,父亲乘汽车到申伯纯家,申正在房门口走动,显得十分焦急。见到父亲,急问究竟。父亲将那张“兵谏书”给他看,申读后也激动得几近落泪。他不假思索地问:“现在能出去吗?”父亲说:“可以出去。”两人随即

同车进新城。

事后高崇民告诉我父亲:“这场严重的斗争,只有张、杨两人知道,谁也没有参加。在事变后的夜间,我被找去,研究捉蒋后如何处理。我提出‘兵谏’这个古典名词,结果被他们采纳了。”

## 彭德怀点名入党

抗战爆发后,1938年6月,鹿钟麟出任河北省政府主席,冀察战区总司令兼国民党河北省党部主任委员。申伯纯任冀察战区政治部代主任。父亲也随鹿进入敌后,任省政府秘书,后因工作得力,甚得鹿钟麟的赏识,年底被鹿提升为河北省政府主任秘书。

此期间,蒋介石颁发了所谓《限制异党活动办法》,挑起国共两党间的政治摩擦,进而在一些地区发展为军事对抗。鹿钟麟也想借机扩充实力,开始频繁活动。他的实力得到扩充后,便坚定了在河北排除异己的决心。他采取一系列措施,在冀南地区和八路军争地盘,抢夺政权。父亲作为申伯纯的助手周旋其间,注意团结进步势力,孤立顽固分子,并很快就和鹿左右的实力派人物结为好友,用以抵制鹿身边的顽固派。他配合中共地下党员和八路军代表不断同国民党方面破坏抗日的行为进行了机智勇敢的斗争。1939年2月,日军发动九路兵力围攻鹿钟麟部所在地——冀县。鹿率党、



邓颖超会见梁蕩然



政、军三方面人员突围而走，奔波二十多天。完全摆脱敌人后，鹿钟麟亲自集合下属，清点人数。省党部人员已全部丢光，省政府也仅存梁蔼然一人。父亲还随身保管着省主席大印，由此更得鹿的信任。

后鹿钟麟进入太行山，落脚贺家坪与天门关一带。3月，八路军129师师长刘伯承路过附近，鹿前往会见。刘伯承以诚恳的态度相劝，晓以团结抗日的大义，鹿钟麟唯唯而应。

1939年5月，彭德怀邀鹿钟麟在山西辽县下庄开会，谈判解决河北地区“磨擦”问题。随鹿前往的有八九人，父亲作为鹿的秘书参加了这次会议。会前申伯纯同父亲分析情况，两人共同认为鹿钟麟周围的顽固派不会当着彭德怀的面公开提出反共主张，申让我父亲把那些顽固分子攻击我党我军的言论综合成若干问题，在会议时相机提出，以配合彭德怀驳斥顽固派的谬论。会前鹿钟麟派申伯纯去迎接彭德怀。

会议开始后，鹿钟麟先讲了几句开场白，随后韩梅岑（国民党河北省党部书记长）讲了一段客气话，未涉及政治问题。彭德怀点名请王孝绪（省政府秘书长）、王钊志（教育厅长）谈谈。二王不是口吃就是谈不出什么实质问题，致冷场约一刻钟。鹿钟麟急得不行。父亲于是请示鹿钟麟要求发言，鹿当即允许并作了介绍。彭德怀也应允。父亲在发言中把二王等平时说过的指责八路军的话综合为五点和盘端出：一、游而不击，阴谋夺权；二、敌来我走，敌去我来；三、保存实力，壮大自己；四、名为抗战，实是篡权；五、苦了百姓，富了自己等等。彭德怀在父亲讲完第一个问题时马上说：“请你等一等。”他拿出笔来记录并向父亲核实后，再让父亲讲第二个问题。父亲发言后，彭德怀即根据父亲提出的问题一一作了回答，并对抗战前途、要打持久战、应作长期艰苦的打算等等问题作了详细全面的阐述，一共讲了四个小时。会后彭回到住处，问申伯纯（申此时已离开鹿钟麟到八路军总部任秘书长）：“今天这个‘小顽固分子’是个什么人？”申告诉彭：“是我久共患难的老弟梁蔼然。”彭又问：“他入了党没有？”申答：“尚未。”彭说：“应该立即吸收他入党。”当年9月申伯纯派袁晓轩到贺家坪约见鹿钟麟，而其任务则是吸收父亲加入中国共产党。

## 情报生涯——重庆

父亲于1939年9月成为中共秘密党员。年底被鹿钟麟从河北派往重庆国民党中央训练团受训。次年3月，鹿钟麟也由河北只身来到重庆，住在巴县冯玉祥公馆，并邀我父亲一同住闲，以待岁月。父亲随后和冯的秘书如赖亚力、王治秋等人也渐渐熟悉起来。

1940年5月底，父亲到曾家岩50号八路军办事处找到以前的熟人王梓木，告诉他自已已于去年在贺家坪加入中国共产党，是申伯纯和袁晓轩介绍的，特来接洽组织关系。王梓木随后打电话向彭德怀询问。7月得到回电后，即约父亲来曾家岩50号，通知他已接到证实其为中共党员的复电，并带他去见周恩来和董必武。周恩来对我父亲说：“我的意见你就在鹿先生处工作好了，不必再回前方了，具体的事，以后王梓木同志会和你谈的。”又说：“你可以帮助鹿先生认识当前的国际和国内形势，你自己也要在这方面多下点功夫，加深对客观事物的了解。”

1941年1月，王梓木告诉我父亲，已将他和冯公馆的参谋周茂藩、副官赵力钧编成一个党小组，由父亲任组长。这成为父亲情报生涯的起点。

1941年1、2月间，国民党召开中央全会，鹿钟麟等均出席。其间所发的国民党中央机密文件，大部分和“反共”相关。鹿每次开会回来，都将文件交父亲替他保存收藏，这对于父亲的工作相当有利。紧跟着周茂藩于3月份到国民党军令部第五厅当中校科员，主管国际情报。那里出版一种秘密文件，每周一期。周先拿给冯玉祥看，冯阅后交给父亲，父亲即设法抄送周恩来。父亲的工作量逐渐增多，经常忙到后半夜。这样的状况持续了一年多后，因“国际情报”降临了一场生死攸关的危机。

1942年8月的一个星期天，父亲到歌乐山看望鹿钟麟。中午，赵力钧的夫人石联玉匆忙找到我父亲说：“周茂藩今天十点前被特务逮捕了。”原来，早上军令部集合突然检查文件，周找不见父亲，只得亲自到曾家岩五十号找到王梓木取回文件。不料，特务们紧随其后，当他返回军令部大门时便被逮捕了。父亲问清情况，立即叫石速归，协助暂住父亲寓所的中共党员张韵波、张玉芝夫妇

掩藏寓所的文件，同时与王倬如商议对策。他们分析，如果父亲离开，会暴露许多破绽，使我党的工作蒙受很大损失，而且周茂藩也无人能够张罗搭救了。如果父亲不走，只要周不供出实情，局面就有回旋余地。于是，父亲决定留下即返住地，一切仍如往常。事发的第四天晚上，父亲接到了一人送来的小纸条，上写：“特园廿四号梁蔼然速救我，给送信人一百万元。藩”。父亲立即付钱，并因此判断自己没有暴露，可以放心大胆地开展营救工作了。父亲思之再三，决定请鹿钟麟亲自出面找军事委员会负责人何应钦。因为何与冯玉祥是冤家对头，利用他们的矛盾设法解救周茂藩。果然，据鹿钟麟回来讲，何一见鹿就说：冯先生那里的周茂藩出了问题，被逮捕了，你知道吗？鹿表示唯唯。何又说：这是极为严重的泄密问题，恐不能宽恕！鹿说：你跟冯先生关系一向不和，现在又出了周茂藩这件事，如果如此你们二人的僵局不是更严重了吗？何尚坚持己见。鹿说：这个问题请何先生从长斟酌一下，为了解除你和冯先生的误会，我希望你借周茂藩这件事给冯先生点儿情面，请三思。后经鹿钟麟的再次说情斡旋，何终于免了周的死罪，1944年初周茂藩获释，仍继续跟随冯玉祥工作。

1941年6月，经王梓木介绍，父亲又结识了在军令部任职的几个军官，与他们时有过往。这些人经常走动，只要遇到重要新闻或者新的军事变化，就会私下交流，引为茶余酒后的话题，从无忌讳。其中一个叫刘杜的中校科员家里孩子多，生活很困难，父亲便经常给他送些钱去。他也经常把主管的几个战区军事情报资料拿出来给我父亲看。通过这个渠道，父亲获悉并传递了不少有价值的情报。

这期间还有一个有意思的插曲。1941年底，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赵守钰将军从西安来重庆，住在鹿宅，临走时提出要父亲担任他的驻渝办事处主任，并择日专门请鹿钟麟吃饭，提出此事，鹿表认可。赵于是说：“今天我很高兴！这些年我的第一个秘书是吴黎平，这个人很有才干，不想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早就走了。我的第二个秘书吴波，跟了我好几年，日子较久，人极精明勤谨，但未料到他又是中国共产党，于1936年到延安去了。现在又请了梁蔼然同志来，担任我的驻渝办事处主任，我很高兴！希望你总不是共产党了吧？”鹿钟

麟及同席的秦德纯、余心清等听后都哈哈大笑。

1942年，父亲曾获悉德军将进攻斯大林格勒的行动情报，随即报送给周恩来，后又按周恩来的指示，转告了苏联驻华使馆武官处。苏联驻华使馆武官安德烈夫马上找到父亲，认为这个情报非常重要，对父亲的情报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不久，德军便向斯大林格勒发动了空前猛烈的进攻。

1944年，鹿钟麟被蒋介石任命为兵役部长，父亲经请示董必武后，随鹿上任，充当他的机要秘书，名义为少将部附。父亲所管的文件主要有全国各部队的实力人数统计表册及驻防变动情况，每月至少变换一次，此外还有鹿钟麟参加军委会议的重要文件等等。所有这些，父亲都照抄一份，秘密送到曾家岩50号。直接领导父亲工作的是薛子正。紧要的时候，几乎天天都送，持续了近一年。

抗战胜利后，毛泽东与蒋介石在重庆举行国共谈判期间，有一天兵役部的同事简柏找到父亲说：“我听陈诚的秘书对我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陈诚说：‘我们现在的复员就是动员。’这句话就是：不管谈判如何，中央军肯定要向北推进！”父亲意识到问题的严重，马上写成材料转到曾家岩周恩来处。第二天王炳南便来找父亲，核实这句话的出处，表示这句话“太重要了”。同时邀父亲直接去张治中公馆见毛泽东。不久之后的事实，就验证了这个情报的重要性。

1945年10月初，十一战区参谋长宋肯堂及新八军军长高树勋、四十军军长马法五来重庆面见蒋介石后，将带兵开赴北平。鹿钟麟曾设宴招待他们，父亲是陪客之一。席间父亲感到这些人都气焰冲天，有人问及八路军会让你们过去吗？他们都一笑置之，根本不放在心上。席间，父亲得悉北上的还有三十军鲁崇义部和三十二军唐元良部总共四个军北上，即把这些情况一一写出，报周恩来处。后来，这些部队在行至邯郸附近时，被我八路军打得落花流水，高树勋便是这一战起义的。马法五军长被俘，其他两军也大败而遁。这是和谈后国共对垒的第一战，父亲的情报工作无疑起了关键作用。

## 情报生涯——北平

抗战胜利后，全国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父亲

所在的情报小组也面临着何去何从的问题。他与王倬如（冯玉祥的机要秘书）等同志言及此事，共同认为北平已成为极为重要的战略要地，应转赴北平开展工作。父亲把这个想法和董必武谈了，董必武当即表示：“你们的想法很好，要再认真考虑到北平开展工作的计划。”

父亲和王倬如随后制定了一个详细的计划，包括利用冯玉祥、鹿钟麟和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的旧关系，在十一战区司令长官部谋得适当职务，作为工作掩护；在北平创办一个印刷厂，作为据点开展工作等等。这个计划得到了董必武同志的同意，并作了如下口头指示：“一、到北平后，要先站稳脚跟，然后再和党联系。你把工厂先办起来，有个立脚点，党组织会主动找你的。二、要踏踏实实埋入地下，不要冒出来。不要把自己搞得红彤彤的，还是灰色的好，但是有些同志做不到这点。三、要多和党外人士交朋友。要钻到国民党内部去，不要把自己的人集中在一起议论不休，这样意义不大而且有害。”

父亲等人决定，自筹资金建厂，不要组织出钱。同时商定，梁蔼然暂留重庆负责筹措资金，王倬如则带着两人十多年的宦囊所得及临时凑的一些钱（总计黄金250余两）先到北平筹建印刷厂。最后定名“长城印刷厂”，开业后梁蔼然任董事长，王倬如任厂长。

父亲根据当时的形势和实际情况，先找了冯玉祥和鹿钟麟两人，冯对出版印刷事业很感兴趣，当即应允出资100万法币，鹿出于对梁的信任和支持，出资600万法币，投资额最高。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在参谋长张知行的劝说下，不仅出资200万法币，还题写了“长城印刷厂”的匾额，这对于父亲等人的情报工作也是一种有力的掩护。张知行是父亲的结义兄弟，他自然知道父亲等人并非买卖人，办印刷厂也并非为了赚钱，一定另有所图，但仍大力相助，出资200万元法币，并对营业状况不加过问。父亲的筹资进展顺利，事先开列的筹资对象名单无一人拒绝，共筹得2380万法币。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数目。现在的北京胶印二厂，其前身就是父亲等筹资创建的长城印刷厂。当时的股东，除去了台湾的外，只有父亲和鹿钟麟先生始终没有提取分毫股金，全部捐献给了国家。

1946年7月，父亲离开重庆飞往南京。周恩

来在梅园新村听取了父亲的汇报，他对父亲的工作颇多称许并给予鼓励，最后嘱咐父亲到北平后，有事可找徐冰、薛子正两同志。11月，父亲与王冶秋从南京来到北平，两人都在十一战区长官部挂了少将参议的名义。

不久，徐冰在王倬如家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参加者有梁蔼然、丁行之、王冶秋、朱艾江、王倬如等五人。徐冰把这五人编成一个情报小组，梁任组长。这个小组的任务是为党做情报和统战工作，直属党中央，和地方党组织不发生关系。就在这次会议上，由梁蔼然、王冶秋介绍王倬如、丁行之两同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这个情报小组利用长城印刷厂作掩护，利用孙连仲等人作“后台”，卓有成效地开展了一系列的地下情报和统战工作。此前父亲和王倬如已设法将韩梅岑和张知行的儿子送往解放区参加革命，后来赵寿山（曾任第一野战军副司令员）、温朋久（曾任驻瑞士使馆参赞）、姚警世（曾任军委二部办公厅副主任）等三同志秘密来北平，经父亲和王倬如的安排，全部安全进入解放区。

1947年2月，国共谈判破裂。徐冰在王倬如家召开最后一次秘密会议，五位情报小组成员全部到齐。徐冰说，内战已不可避免，中共代表团将撤离。你们这个小组要留在北平，要更深地埋入地下，以后通过党的秘密电台联系，过些时候派人和你们接头。军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团撤离前，薛子正曾带父亲去见叶剑英，听取对情报小组如何开展工作的指示。一个月以后，一个自称姓白的同志到西砖胡同找王倬如，奉党的命令来和小组联系，并向王介绍一位住在西城的叫董秋明的女同志，有情报通过她传递，并叮嘱除董外，小组其他同志不要去秘密电台。后来，董秋明和我父亲及小组其他同志也取得直接联系，他们有了情报均直接交董。董还和王倬如约定，每星期二上午到印刷厂和王见面，如因故未到，次日一定在王家中见面。

1947年9月底，董秋明突然失去联系，第二天小组成员朱艾江得到消息：余心清（党外人士）已被捕，特务去抓王冶秋，王已逃离，王妻被捕。父亲和王倬如分析，电台一定出了问题，他们意识到自己的处境已很危险。父亲原打算回家略作安置后逃离，哪知特务早已守候在家门口，随即被捕入狱。事后获悉，9月下旬的一天深夜，我方电台正



在工作,被敌人监听,在突袭之下,电稿未能销毁,加之电台台长叛变,我地下情报小组遭到破坏。包括余心清和父亲等人在内的100多人被捕,打入敌人军队内部的丁行之等五位同志在雨花台被杀害。此事还牵连到上海、南京、沈阳、天津、兰州、热河等地,被捕同志达800人之多。这就是当时轰动全国的“共谍案”。

父亲被捕后,于当年11月解送南京,关进国

民党国防部监狱,其间鹿钟麟和中共地下党曾多方设法营救。1949年初蒋介石“引退”,李宗仁代理总统后释放政治犯时获释,1949年3月经香港回到北平。住在翠明庄期间,周恩来、董必武、李维汉曾来看望或宴请父亲。随后,父亲被任命为新政协筹委会秘书处处长,全身心地投入到新政协的筹备工作中。

(责任编辑 徐庆全)

## 代购代邮

历史是一面镜子。读史可解惑,可益智。本社对读者函询较多的有关图书,开展代购、代邮服务。

《沧桑十年》在中国历史上的那场空前灾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今天的年青人已难以置信,那些曾受过迫害的人有的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作者真实、公正、客观地写下了当年的遭遇,给后人留下宝贵的教训,目的是杜绝惨绝人寰的悲剧重演。

《赫鲁晓夫回忆录》赫鲁晓夫的政治生涯涵盖了从十月革命到20世纪60年代苏联几个重要历史时期,自1964年失去党和国家的一切职务后开始写自己回忆录。他在晚年撰写的回忆录中披露了长期以来讳莫如深的苏联最高层的重要活动,介绍了某些政治事件的始末。是一份不可多得的重要文献。

《西北军演义》此书系《桂系演义》、《少帅传奇》之后,又一部介绍国民党非中央系武装力量的历史小说。作者根据自己家世、拜访众多的西北军后人,在查阅、考证了大量海内外出版的军事、历史、人物传记基础上,以中国近代重大历史事件为背景,翔实地向广大读者介绍了“西北军”整整20年的战斗历程,填补了中国近代军事史的一段空白。

《命运与使命》继《走出个人崇拜》后,这是一部系统研究中国知识分子问题的力作,一个敏感却又不能回避的历史和现实研究课题。作者以求真务实的精神,探求了近百年中国知识分子在实现社会变革、追求现代化历程中的艰难与曲折,提出了许多发人深省的观点。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编:100045 收款人:炎黄春秋杂志社

(注:邮购三本书以上,可按总书价的10%付邮费)

书 名	作者或主编	定价	邮费
恍若隔世——回眸夹边沟	邢同义	24.80	6.00
师哲口述——中苏关系见证录	李海文	25.00	6.00
唐山大地震	钱 钢	28.00	6.00
庐山会议实录	李 锐	18.00	5.00
赫鲁晓夫回忆录 (俄)尼基塔·谢·赫鲁晓夫		29.00	6.00
天堂实验——人民公社化运动始末	罗平汉	32.00	7.00
沧桑十年——1966—1976 共和国内乱的年代	马识途	38.00	7.00
刘太医谈养生	刘弘章	35.00	7.00
病是自家生	刘弘章	38.00	7.00
是药三分毒	刘弘章	38.00	7.00
蒋介石日记揭密 上、下)	张秀章	88.00	8.00
风雨彭门	滕叙究	35.00	7.00
命运与使命——中国知识分子问题世纪回眸	冯建辉	29.80	6.00
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	张素华	38.00	7.00
风云侧记——我在人民日报副刊的岁月	袁 鹰	26.00	6.00
西北军演义 上下)	骏 声	68.00	8.00
冷石斋沉思录	吴 江	16.00	5.00
斗室中的天下	资中筠	30.00	6.00
季羨林谈读书治学	季羨林	19.00	5.00
季羨林谈人生	季羨林	19.00	5.00
走进怀仁堂 上下)	董保存	55.00	7.00
红墙大事——共和国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 上下)	张树德	69.80	8.00
周扬与冯雪峰	徐庆全	28.00	6.00
大突破——新中国私营经济风云录	马立诚	36.00	7.00
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	朱元石整理	26.00	6.00
高岗、饶漱石事件始末	马畏安	32.00	7.00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季羨林	22.00	5.00
共和国大审判 ——			
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亲历记	沈国凡	26.00	6.00
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	汪东兴	23.00	5.00
从“董怀周”到审江青	汪文凤	18.00	5.00
刷盘子还是读书? ——反思中日强国之路	钟 庆	28.00	6.00
家书抵万金	抢救民间家书项目组委会	23.80	5.00

# 北欧四国社会模式的见闻与思考

关山文图

2004年,我赴芬兰、瑞典、丹麦、挪威学习考察。北欧的民主社会主义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认为,北欧的社会模式,可以为我国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改革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迪。

## 富足、和谐、文明的北欧

直觉比理论更重要、更可靠。民主社会主义是不是社会主义,好不好,到北欧走一走、看一看,就一目了然、一清二楚了。虽然这次考察时间不长,甚至可以说是走马观花,但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廓清了我多年的疑惑。

### 1. 共同富裕,社会公平

北欧最震撼我心灵的感受就是没有穷人。在北欧考察期间,我没看到一个乞丐和流浪汉(卖艺者倒是,但非常文明和敬业,更不会主动问你要钱)。北欧是一个经济高度发达的高福利地区,劳动力人均年收入折合人民币值25万元左右,其中挪威最高,劳动力人均年收入约30万元人民币,大部分家庭人人有汽车,家家有游艇,而且社会公平,收入差额小。由于采取强有力的高税收、高比例的公共开支和“从摇篮到坟墓”的普遍福利制度,北欧各国均形成庞大的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结构,基本消灭了穷人。安徒生《卖火柴的小女孩》所描述的那种悲惨生活在当今北欧是绝对不会出现的。

北欧的富裕和公平不仅体现在物质层面,而且是渗透到“骨髓”里面去了,体现到精神层面,体现到制度、教育、文化和社会风气中去了。在北欧,社会和谐安定,风气很好,监狱很少,犯罪率很低,基本上没有盗窃行为。人们非常敬业,精神可嘉,首相、王储这些达官贵人出门上街一般都不带保镖。

### 2. 重视环保,环境优美

北欧的环境保护得很好,城乡富丽幽美,蓝天白云,碧水青山,空气清新。大街小巷(除了人行道有烟头和狗粪之外)十分整洁、窗明几净,极少见废纸片、废塑料袋等垃圾;城市河道河水清澈,水鸟成群,堪比九寨沟的海子。在北欧,视野之内,所到之处,都没有发现冒黑烟的大烟囱,也没有发现有哪条河道小溪被污染。自来水是可以直接饮用的。为了环保,丹麦大力提倡人们使用自行车,哥本哈根市政府还为此投放了几百辆自行车免费供市民、游客使用。在哥本哈根,我们目睹着这些车手“大爷”在自行车专用道上飞驰,行人和汽车都为他们让路。北欧的绿化很好,芬兰的森林覆盖率为69%,瑞典为54%,我们乘车从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到丹麦的哥本哈根,再到挪威的奥斯陆,沿途所见,都是茂密的森林和草地。城市绿化也很好,挪威的奥斯陆、芬兰的赫尔辛基、丹麦的哥本哈根,都可以说是建立在森林中的城市。芬兰的赫尔辛基,海边不少房子的屋顶也绿草如茵,这种草皮屋顶造价是普通屋顶造价的三倍。

### 3. 基础雄厚,资源丰富

所历四国,经济、教育、文化的硬件设施都非常完善、先进。供电、供水、供气等市政设施先进完备且全走地下管道。机场、港口、车站都非常现代化,道路宽阔,四通八达;城市规划布局合理,建筑典雅古朴,风格各异,内部装修豪华且富有艺术品位;网络普及,甚至一些只有十几户人家的小村庄也有网站,连士多店都可刷卡;大学、图书馆、博物馆、艺术馆、音乐厅、剧场戏

院众多,设备现代化。北欧地广人稀,矿产、海洋和森林资源极为丰富。

4. 重视教育,国民文化水平高,素质好

北欧政府十分重视教育,早在十九世纪初就实行了义务教育,现在从小学到大学(私立的除外)都是免费教育,对符合入学条件的外国留学生

也不例外。只有2500多万人口的北欧,现有近400所高校,还有众多的在职培训和成人学习机构,50%以上的成年人接受过高等教育。北欧各国政府和高校十分重视高等教育的国际化,每年资助大约4万名北欧学生前往国外学习,同时接纳3万国外留学生。北欧人热爱学习,追求知识,公园、地铁、公共汽车、机场、候车室随处可见埋头看书的人们。只有517万人口的芬兰拥有各类图书馆3000家,人均图书占有率居世界前列,科技论文产出率超过美国和英国。文化水平高,素质自然就高。北欧人待人接物热情大方,乐于助人,彬彬有礼,谈吐不凡。在斯德哥尔摩的一间普通商店,我想为妻子买件衣服,当我结结巴巴、连比带划用英语告知店员我妻子的身高体型后,这位店员竟然到街道上找了一位体形身高与我妻子差不多的小姐来当模特。这位小姐非常热情大方地穿上这件衣服在我面前来回走了几回。成交后我也没看到店员给她小费。这种乐于助人和敬业的精神令人感动。

#### 5. 政治清明

北欧国家是世界上公认的最廉洁国家。自1995年起,“透明国际”每年发布世界各国清廉状况排名,北欧国家其清廉指数一直名列前茅,芬兰已连续五年被透明国际评为全球最廉洁政府。这些国家都实行“三权分立”政治体制,行政透明和公开,舆论监督到位,所以权力得到了有效的制约和监督,极少公务员滥用职权、以权谋私现象。芬兰、瑞典、丹麦、挪威腐败案件每年仅有几十件。北



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市中心河上的野生天鹅和水鸟

欧的公共部门一切开支和每个人的收入都是公开的,所有档案都对公众开放,接受市民和媒体监督。如果你有兴趣,你可以在有关网站上找到官员们公务宴请的费用和出差的报销清单。虽然瑞典、丹麦、挪威这些国家实行君主立宪制,保留国王,但早已有名无实,经过近一个世纪的改良演化,这些国王和王亲国戚都已平民化。皇宫和首相府(住所和办公室除外)也免费对公众开放。我们参观瑞典斯德哥尔摩市政厅时,恰逢市长在此宴请外国来宾,但并不拒绝我们参观。

#### 6. 尊重历史,保护文物

一个民族的发展居然以劫掠开始,这大概不是什么光彩的历史吧!北欧的斯堪的纳维亚(维京人),包括瑞典、挪威和丹麦人恰恰就是这样一个民族。但他们并不讳言这段历史,还为此建起了众多的“北欧海盗时代”(公元793年至1066年)博物馆,如哥本哈根的海盗船博物馆、斯德哥尔摩的历史博物馆、奥斯陆的维京海盗船博物馆。我们参观了维京海盗船博物馆,一条只有一千余年历史的维京海盗船被当作国宝精心保护起来,向人诉说这段不堪回首的历史。至于芬兰,其正视历史的理性更让人感慨万端。在我们参观的赫尔辛基首相府前的市中心广场(按我们的理解,其政治地位相当于我们的天安门广场),耸立的不是芬兰的民族英雄雕像,而是俄皇亚历山大二世的青铜雕像。在俄国殖民统治结束后仍然在首都的中心广场保留原殖民统治者的雕像,足以证明芬兰人正视历史的气度和理性(亚历山大二世的确对芬兰的发



展起过积极作用),不因人而废物,不因人而废言。

当然,北欧也并非尽善尽美,由于激励不足,我总感到有点吃大锅饭的味道;由于人们过分追求自由和享受,以致离婚率很高(60%左右),星期六、星期天不少商店关门,以致于我们找餐馆吃饭都成问题。这些也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 独特的经济社会制度

北欧国家由于地理位置、历史、传统、文化等方面接近,并在经济社会制度选择方面有许多相似性和共同的特征,因而形成了独特的北欧模式。其主要特征是:

### 1.私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体制

北欧各国都是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和主体的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工业、农业、金融、外贸等部门,基本上都掌握在私人手里,生产和流通几乎完全依靠市场机制。北欧的经济不仅是私人的,而且是垄断资本主义的。瑞典、挪威、丹麦和芬兰都是资本高度集中的国家。在瑞典,占总人口不到0.2%的资本集团,占有全国公司股票的2/3。国有经济的比重不高,且主要集中在提供其服务的国有公共部门,如教育、医疗、铁路、航空和能源等。电话、电信等领域都已实现充分竞争,政府在这些领域只规定一定的原则,以保证普遍服务的实现。

### 2.高福利

北欧国家是早已闻名于世的福利国家,各种福利补助内容复杂、体系庞大、名目繁多,涵盖了

儿童津贴、病假补助、医疗保障、住房补贴、失业救济、养老保险等各项内容。公民从娘胎开始直到进入坟墓,几乎样样都由国家“包起来”。以瑞典为例,孕妇除了分娩住院有补助外,坐出租车到医院分娩,不论多少次都可获得政府三分之二车费的补助。小孩出生后每月可领取约1000元人民币左右的补助,一直领到18岁;16岁以前补助费由父母支配,16岁以后可由本人自立账户,自行支配。除了幼儿园要视家长经济情况酌情收费外,读小学、中学、大学都免费,只收书本费和住宿费,每月还可领取约800元人民币补助。生一个小孩,母亲有一年有薪假期(原工资的80%),父亲有一个月全薪产假呆在家中带小孩做家务(芬兰两个月,挪威是女权国家,有四个月)。对于社会上的所有弱势群体,如失业者和病人都有全面的照顾政策。生病超过一个月,雇主给85%的工资,超一年即由国家支付75%的工资,每次看病只需支付挂号费,治疗和药费由雇主和国家支付。失业者领上年平均工资的75%,一年后领失业救济金,与中等收入的职员工资差不多。如此政策,要是没有社会公德,还不如多生孩子不工作。总而言之,北欧国家都切实做到了幼有所托,学有所教,病有所治,老有所养,劳动者和所有弱势群体生活有保障。

### 3.高税收

“羊毛出在羊身上”。实行高福利政策的资源,其实都来自劳动者创造的财富,只是通过高税收由国家实施再分配罢了。这些国家的个人所得税,征收率一般都达到30%-50%,高收入者的纳税率甚至达到70%-80%,也就是说,劳动者的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甚至四分之三的收入都交了税。瑞典的遗产税最高达98%,也就是说上一代留给子女的财产,最少时只剩下2%,几乎等于没有。芬兰连信教也要征收百分之一的宗教税。这些国家的税收大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40%-55%。与我們不同的是,这些税收绝大多数都用于国民的福利,而不是用在公款吃喝、公车消费、公费旅游等行政费用上。

### 4.共同富裕



丹麦首都哥本哈根街头的安徒生铜像

北欧国家普遍实行“收入均等化”政策，就是利用累进所得税和转移性支付，使社会各个阶级之间的收入与消费水平通过再分配趋于均等化。这种高福利、高税收的结果必然是共同富裕。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公布的人类发展指数，北欧诸国的基尼系数近年来都排在工业化国家的前列，都在 0.25 至 0.26 之间，均属于收入差距最小的国家。有关资料表明，北欧这些国家最高收入阶层与最低收入



芬兰首都赫尔辛基首相府前的广场，广场中心耸立着俄皇亚历山大的青铜雕像

阶层税前相差 17 倍，税后只相差 3 倍多一点，因此贫富不悬殊。而在法国则达 7 倍，英国、意大利更多。据统计，北欧的贫困率很低。如在瑞典，贫困人口大致占 3.5%，这些“穷人”年收入也在 10 万人民币左右，对我们而言，早已是富裕的小康。

北欧模式最大特色就是把私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制度与高福利高税收的均贫富制度有机地结合起来。这确实很有意思，一方面，北欧坚持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大力发展和保留了私有制；另一方面，它又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不同，建立了庞大的公共财政和福利部门，实施宏伟的贫富拉平计划，大大拉平了贫富差距。不强调在生产领域的集中，但在收入再分配领域实行集中。这是北欧的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这样做，同时拥有了经济上的财富与效率和社会上的公正与权利，避免了传统社会主义和传统资本主义各自的缺陷。

北欧国家选择这种独特的经济社会制度，与长期执政的社会民主党的指导思想不无关系。近百年来，北欧国家大部分时间都是由社会民主党单独执政或者与其它党派联合执政。社会民主党的指导思想的纲领是政治、经济、社会、国际四大民主，主张用改良渐进的办法“和平长入”社会主义，核心是力图以平等和公正的分配把经济增长与私人所有制相结合，“通过实行社会的经济民主，消除阶级差别和一切社会和经济不平等的现象”，“让平等、关心、合作和互助”精神贯穿于整个社会。实践证明，他们是成功的，北欧的民主社会主义社会和谐、民主、和平、公正、稳定、繁荣、文

明。

## 几点重要的启示

百闻不如一见。这次出访，确实让人开阔眼界，发人深省，体会颇多。

启迪之一：世界是丰富多彩的，文明是多样的，社会主义模式也是多元的，我们的理论和实践都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

长期以来，在我们的话语中，民主社会主义就不是个好东西，我们把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伯恩斯坦、考茨基这些人）视为马克思主义的叛逆，称之为修正主义。而恰恰正是这种修正主义，得到了北欧广大人民的支持拥护。近百年来，北欧各国的社会民主党等左翼政党长期执政（如瑞典的社会民主党，自 1920 年至今 83 年中执政了 75 年），他们信奉的就是民主社会主义。他们认为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不适合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主张用民主的手段，通过投票选举、议会斗争的方式执政，用改良、渐进的“和平长入”方式，逐步改造资本主义，以实现经济民主、共同富裕的民主社会主义。实践证明，民主社会主义成功地化解了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不共戴天的仇恨，融合了传统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各自的优点，成功地使资本主义在民主的制度下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创造了一种新的社会主义模式。邓小平曾完整地阐述了社会主义本质：“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按此标准，北欧无疑是社会主义。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事实胜于雄辩。一个主义、一个制度好不好，本质上不是理论问题，而是实践问题。实践是检验主义、制度好不好的唯一标准。如果一个主义、制度不能给人民带来利益、财富和幸福，不能给社会带来和谐、公平和正义，这样的主义和制度人民终究会抛弃它。因此，我们应该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和陈腐的理论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坚持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立足于新的实践，立足于时代的前列，深入研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兼容性，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不断吸取本国和外国一切科学的具有人类社会普适性的新经验、新思想、新成果。

应承认世界多样性的现实。要尊重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世界各种文明和社会制度，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中国要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使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社会和谐，关键是要从中国国情出发，抓住机遇，学习和借鉴人类创造的一切政治文明、经济文明和社会文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启迪之二：中国必须坚持走循序渐进的改革改良的道路，在改革过程中始终保持社会稳定，在大力发展生产力的同时不断完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建设和谐社会。

发展离不开稳定的环境。北欧基础设施雄厚、社会富裕，关键在于他们近百年来坚持走改良的道路，政策没有大起大落，保持了社会稳定，在社会发展中没有对基础设施和生产力造成大的破坏。我们所到北欧四国，少见现代化的高楼大厦，大部分的公共设施是几十年前的，有不少还是上世纪初的。和北欧相比，虽然我们在基础设施、生态环境、人均资源、公民素质、人均GDP等方面还有很大的差距，但我们的经济有很强的活力。从我们的收入水平和人民币的实际购买力方面衡量，我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与他们相比虽有差距但还是不错的，真正的差距是制度和公民的素质。回过头来看，我国改革开放近三十年，政治经济文化确实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取得了辉煌的

成就。这说明我们循序渐进的改革路子走对了，改革的取向、步伐、措施是正确的。北欧坚持走改良社会而不是暴力革命的道路，较好地实现了在稳定中推进政治、经济、文化全面发展。试问，连皇帝都可改造成为虚君，演化成公民，还有什么不可以改造的呢？这种循序渐进的改良主义确实很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借鉴。

要稳定就必须关注弱势群体，缩小贫富差距。列宁曾说过革命的主要原因是贫富悬殊，贫苦阶层无法忍受。北欧的基尼系数在0.25-0.26之间，是世界上最公平、公正的地区。而目前中国的基尼系数已达0.45，超过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这应引起我们深思和反省，切实采取有力措施解决地区之间和社会阶层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着力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逐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调节过高收入，坚决取缔非法收入，促进共同富裕。否则，稳定将成大问题。

启迪之三，要大胆学习借鉴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学习民主社会主义好的东西。

在信息化、全球化时代，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离不开学习外部先进的东西。据世界经济论坛公布的全球竞争力报告，北欧是世界上最发达、共同富裕而又最具竞争力的地区，北欧是世界上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地区；北欧是世界上环境保护得最好的地区，被世界认同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就是由挪威女首相布伦特率领的联合国工作组制定的；北欧国家是给发展中国家的援助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最高的国家……所有这一切都说明，北欧已经成为世界上文明程度最高的地区，有很多值得我们中国学习借鉴的东西。当然，由于国情不同，我们绝不能照搬北欧模式。例如，他们鼓励生育的国策，中国就万万学不得。但是，他们有更多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人类文明。如循序渐进的改良策略，权力制衡的民主制度，公开透明的廉政制度，重视环保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教育兴国、人才立国的基本国策，关注弱势群体、消除两极分化的措施，尽职尽责的敬业精神，尊重历史、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态度……总之，我们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抛开那些不合时宜的政治成见，虚心学习借鉴他们那些先进的制度、思想和文化，只有这样，中国才能在全球化时代真正汇入人类文明的大潮。

(责任编辑 李 晨)



# 欢迎订阅2007年《炎黄春秋》

实事求是 秉笔直书 以史为鉴 与时俱进

《炎黄春秋》是以史为主的综合性纪实月刊。对古今中外、特别是当代革命和建设的重大事件、重要人物的是非功过，依据翔实的史料秉笔直书，不增美、不溢恶、不媚俗，不唯书，不唯上，求实存真，以史为鉴，以史资治。在林林总总的期刊之林中具有鲜明特色。

《炎黄春秋》拥有一大批高水平作者。他们有的是资深的革命家，是革命和建设重大事件的亲历者；有的是专家学者，对重大历史事件和人物有深入研究。他们的文章具有较高的权威性和史料价值，在海内外读者中享有很高声誉。

本刊国内外公开发行，国内总发行：北京市报刊发行局

国内邮发代号：82-507 国内各地邮政局(所)均可订阅

国外总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北京399信箱)

国外发行代号：1274M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政编码：100045

电话：(010) 68532048

传真：(010) 68532569

近年来《炎黄春秋》订户逐月上升，希望广大读者继续支持本刊，订阅本刊。

每期定价：5.80元

全年定价：69.60元

如在当地邮政局(所)订阅有困难，可直接向本刊发行部订阅，免付邮费。



## 《炎黄春秋》创刊15周年 精品书系(第一编)再版隆重推出

1998年推出的《炎黄春秋》精品书系，系从1995年以前45期650万字中精心筛选出150万字的文章，分类编辑为：《政坛高层动态》、《重大决策幕后》、《历史迷案揭秘》、《名流写真》、《血荐轩辕》。书系出版一年后，即脱销。在纪念《炎黄春秋》创刊15周年之际，应广大读者的要求，书系再版发行，以弥补本刊早期合订本销罄之不足。

本书系全套5本，定价125元；另加邮挂费12元(因存书不多，恕不分卷出售)。





**刘国光：坚持基本路线必须澄清错误思潮**

**何方：我看社会主义**

**我的极左经历**

**萧克将军谈“三次站错队”**

**华尔街上的中共大亨**

**情系国殇墓园**

ISSN 1003-1170



9 771003 117002

国内统一刊号：CN11-2817/K

国内邮发代号：82-507

定价：5.80元